

日本石丸藤太 著
吳世漢邢必信 譯

蔣
介
石
評
傳

經世半月刊社出版
正中書局發行



日本石丸藤太 著
吳世漢邢必信 譯

蔣 介 石 評 傳

經世半月刊社出版
正中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月初版

蔣介石評傳

定價 每冊：普及本六角 精印本壹元

著者 石丸藤太

翻譯者 吳世必

校閱者 王楊文龍

出版者 經世半月刊社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所 正中書局及各省分局

南京漢口路七十五號

電話三二六五九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

蔣介石評傳

蔣 委 員 長 玉 照



王序

我們從去年九月十四日多田司令的「宣言」裏，可知道日本軍部充滿着打倒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空氣。他們認爲如欲打倒國民黨或國民政府，必先打倒蔣介石先生。日本軍部此種心理，無非想使中國失去國家權力之中心與人民信仰之對象，重演紛擾，以便趁火打劫，屈服中國。甚至著名的日本外交時報，亦以袁世凱與蔣先生相提並論。這種錯誤觀念，實爲遠東和平的障礙。所幸近數月來，日本人士對於中國及其領袖人物，逐漸有清楚的認識了。例如宇垣一成在本年一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上撰述中國的蔣介石一文，說：「蔣介石先生是可敬佩的人物……當羣雄割據之際，他且暮不停的在中國南北奔走，真是難中又難的事，無論中國怎樣脫出軌道，可是十年中間，他已把統一的形式制定起來……試展閱歷史，中國統一局面的造成，總得數十乃至數百年。可是他却祇須幾分手腕，於短時間內完成理想中的偉業，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宮崎龍介在蔣介石論一

文中亦說：「蔣氏生平不坐而言，而起而行，行後再加以解釋。每當確定方針之前，他總以精明果斷之才，爲萬全的準備。這便是他成爲實際政治家的特徵，及負有常勝將軍之名的原因」。又曰：「蔣氏的銳利的目光，精幹的軀體，都予人以非凡的印象。若是中國沒有複雜的國際關係，他早就會把中國統一了。」最近，日本雜誌復提出「現代世界上的十大政治家是誰」的問題，徵求答案。在十一個答案中間，有九位列舉「中國的蔣介石」。這九位都是知名之士，如貴族院議員德富豬一郎，法學博士高用早苗，政治學博士五來欣造，法律博士松波仁一郎，法學博士米田實，法學博士蜷川新，經濟學博士服部文四郎，東京日日新聞政治部長岸井壽郎，及評論家石濱知行等。就各人的答案看來，蔣先生的名次平均總在第三四名左右，而石濱知行且把他列作現代世界上的第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以上所述，尙僅係日本人士在報章雜誌上零星發表的言論。至於比較詳細而有系統的專著，要算石丸藤太最近出版的蔣介石評傳。我們從這本書裏，的確可以見到日本有識之士對於中國領袖人

物的新評價。他們似已認清蔣先生的偉大，以及蔣先生領導下的政府與人民乎確與前不同。著者曾任日本海軍少校，乃日本著名之軍事政論家，近幾年以來，所著時論頗多，例如戰雲彌漫的太平洋，（新光社版）日英必戰論（春秋社版）第二次世界大戰（春秋社版）等皆是。他的論調，比日本的陸軍軍人富於國際眼光。他不肯隨聲附和日本軍部對蔣先生肆無忌憚的批評，而能以客觀的態度分析事實，這可說是他的特點。著者在序言裏說：『蔣介石是偉大啊！在他那種難處的環境之下，尚且能把左右的外國壓迫打開，並將一般認爲不可能的中國統一，在大體上也算被他實現了。這在傍觀者看來，如何能不佩服呢？所以西安事變斷不能倒翻他。他仍然是中國的救星，崇拜的對象啊！』又說：『我們如欲重新認識中國，則非特要知道領導者蔣介石的個人，同時對於他所領導的中國，在這幾年與日本的關係，也應該有回顧必要。』從這種見地來撰述蔣先生的評傳，自不會被先入之見所蒙蔽。要研究蔣先生的爲人，就不能不論及新興的中國，要研究新興的中國，亦不能不論及蔣先生。蔣先生的生平與新興中國的歷史，實具有不可分的關係。本書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第

九等五章敘述蔣先生的個人生活，其餘各章記載蔣先生參加革命的經過，及其近年來努力復興中國的成績。著者的態度，大體上可說是客觀的，不過有很多地方（特別是關於中日外交問題方面的）他的言論仍不免爲愛國思想所支配。例如關於濟南事件的責任，幾乎完全推在中國人肩卜，而對於田中內閣的專斷與野心，却反表示同情。濟南事件以後，日本復有『維持東三省治安的宣言』，這個宣言無疑是暴露出田中內閣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預爲掠奪東三省的張本，嗣後張作霖於回瀋途中，田中果然下了毒手。關於這件事，著者亦却輕描淡寫的說：『忽然炸彈爆發，列車顛覆，張氏等都同歸於盡』。中國民衆願與日本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企圖和平；中國政府亦決意在保全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與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希望與日本攜手，以冀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兩國得以共存共榮。這種顯明的立場，凡有識之士均不能否認。著者對此却說：『現在謀「滿洲國」健全的發展，與日滿兩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既是日本的國策，那麼無論中國怎樣拿親善來作交換條件，日本也決不會輕易地把滿洲放棄罷！』日本如果不放棄滿洲，或不準備以合理的方法，及坦白的態

度來解決東北問題，那麼中日兩國間永久的和平又豈能實現？我們誠然希望和平，但我們的和平政策却須以恢復及保全領土主權之完整爲基本條件。在中國未恢復領土主權完整以前，一切枝節的談判與交涉，至多不過作到暫時相安，斷不能語於久遠之計。即就日本立場而言，數年來英日，美日，俄日間衝突之原素，亦無一不因日本佔領東北而起。蓋日本既有侵略中國及獨霸亞洲之雄圖，則英美蘇聯等國自不能不有所戒備。於是日本國際環境便因之惡化。現在日本一面須與世界大陸軍國之蘇俄對抗於陸地，一面復須與世界大海軍國之英美競爭於海上，國內則橫征暴斂，儘量擴張軍備，表面上雖標榜榮譽的孤立，而衷心仍不能免於恐懼。從我們看來，與其如此，何不釜底抽薪，根本放棄侵略政策，與中國攜手，共同創造遠東和平，以自拔於國際嫉妒與疑懼之境地？著者不從遠處大處着眼，而斤斤於維繫『滿洲偽國』，殊可惋惜！我們很希望著者能本着他的客觀態度，於本書再版時，將前述各點，加以更正，庶幾可稱完璧。

我們想：日本一般人士讀了此書之後，一定會對中國及其領袖人物發生新的認識。換言之，即

對於日本人士所謂『改善對華觀念』一層，定有若干供獻。但同時，本書所給予日本軍人的警勵，亦必非常深刻。他們或許要覺得這個中國睡獅既已夢醒，將來難保不會咆哮？他們或許會因此更認識蔣先生領導下的政府具有巨大的力量，從而更加處心積慮的企圖打倒這種新興的力量。日本軍人從前說過，『昭和時代之青年，今既跨駿馬，以雄偉之英姿，向大陸一角之滿洲進發矣。雖欲止之，不可得也。』近幾天來日本軍人對於佐藤外相在貴族院所發表的對華外交演說，亦相率表示反感。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日本軍人自爲一種特殊階級，把持國政。進步的輿論，實不易抑制彼輩之橫暴與跋扈。而本書之刊發，其適足以反激日本軍人之野心者，亦未可逆料。

著者在本書結語中說：『蔣介石氏實在是偉大！他不但是東洋的偉人，而且是世界的偉人啊！』此種判斷出諸鄰邦人士之口，我們自然表示欣幸。蔣先生自北伐以來，方將十年。他以十年繼續不斷的艱苦奮鬥，將分崩離析已有二十餘年的國家，置於統一的境地，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著者以鄰邦人士的資格，尚且如此熱烈的崇拜蔣先生，則本國民衆對於蔣先生的愛戴，自

更非可言喻。將先生堅苦卓絕，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爲國爲民，他真是一位不世出的領袖，中華民族的英雄。但我們愛戴蔣先生却不應僅止於言論，言論並不能增損他的偉大。我們愛戴蔣先生最好的方法，當莫過於效法他的精神，闡發他的思想：擁護他的主張，追步他的後塵，全國一致，致力於國家復興之業。我們希望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能以蔣先生爲模範，事無大小，都能表現蔣先生所表現的精神。全國軍民如能有蔣先生的精神，各個擔負應當擔負的責任，則國家前途，庶不致再演歷史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悲劇。我們更應當幫助蔣先生披荆斬棘，克服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以冀臻於自強不息的境界。這才是愛戴蔣先生最好的方法，同時亦是國人閱讀本書後應有的感奮。

本書由經世半月刊社吳世漢邢必信兩君合譯。他們利用公餘閒暇，謹慎將事，故譯文流暢馴雅，而又不失原作所特有的氣韻。作傳記本非易事，作當代偉人傳記更難。本書著者以鄰邦人士的地位，見聞材料，均極有限，關於蔣先生的生平事蹟，自未能盡知底蘊，其間傳聞失實之處，因亦

難免。例如（一）原書第十二頁稱奉化之隣縣爲「臨海」，實係甯海之誤；（二）原書第十三頁稱蔣先生幼名「端泰」，實係「周泰」二字之誤，蓋甯波風俗，素有譜名及小名之分，周泰是蔣先生的譜名，小名爲瑞元，是他的祖父給他起的；（三）原書第三十頁以下所云「鳳麓學堂」，應改爲「鳳麓學堂」，鳳麓學堂是中學，蔣先生進該校時已年屆十七，適當遜清光緒二十九年；（四）原書第三十四頁以下與王正廷城壁之盟一節，全非事實；（五）原書第三十九頁稱蔣先生入保定軍官學校時爲十八歲，其實此時蔣先生已經二十歲了。（六）原書第五十五頁「買賣證券致富」，及第五十八頁向 總理貢獻軍資一百萬元等事，亦與事實不甚相符；（七）原書第六十二頁敘述 總理由總統府出險事，謂係由於蔣先生的策劃，其實叛軍圍攻總統府時，蔣先生尙未到粵，直到後來才隨護於兵艦。（八）原書第一四二頁關於蔣先生在政府內部的勢力的敘述，頗多揣測之辭，殊欠翔實；（九）原書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亦好多與當時的事實不符，如蔣先生事變以前原即駐節華清池，並非先赴西安；蔣先生被劫持後係住在綏靖公署之西城大樓，後復移居高培五宅，並未住過

楊虎城私邸等等。

上述數項，都是隨便列舉的幾點，此外事實方面，言論方面的瑕疵，當復不少。譯者不及一一校正。姑就原文照譯，以存其真。此書祇可視為鄰邦人士對於蔣先生生平事蹟之觀察，而不當視為可靠之傳記。目前最可靠的傳記，當推毛思成君所編的蔣先生年譜（截至四十歲為止）。至於西安事變，則蔣先生親著的西安半月記自為最珍貴的信史。此外本書中所述中日間種種事件，著者多根據日人片面的理論，譯者為存真起見，亦多未加修正尚希讀者隨時注意。本書出版得王捷三，楊兆龍及黃瀛等諸君之幫助不少，誌此代申謝忱。

王文山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

蔣介石評傳序

著者序

蔣介石氏是偉大啊！

這幾年來我的結論是如此。

但是關於他比較正確的傳記，現在日本還沒有這麼一本，縱然有之，亦不過是片斷的，或不正確的一類東西。因此我纔決心要寫一本他的傳記，竭力的收集在中日兩國與他有關係的材料。

恰巧，正在這個時候，中日交涉的事件發生，春秋社主人神田豐穗總是催促我寫他的傳記。後來等我寫到全書的三分之二的時候，那時西安事變又發生了。

這樣一來，果然全世界的耳目，都集中在蔣氏一人的身上，同時中國對他的聲望，也更加高起來了。

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正在寫蔣介石評傳的時候，政府的某高級官，忽然笑着拍我的肩膀

說：

「在這個時候，讚揚蔣介石，莫非你被南京政府收買了麼？」

蔣氏竟被日本人誤解到這種地步。

「蔣介石可惡！他的親日，完全是假的呀！」

對於普通這般觀察，我倒並不反對。不過，我覺得對於寫那篇「敵乎？友乎？」的著者徐道鄰氏所說的「日本外交時報用同一的標準，以蔣介石來比較袁世凱及李鴻章，這乃是他們不知道時代的變遷。日本人常說認識不足，這怎不是認識不足之一呢？」這種話，也應該玩味一下罷？

我自然不能因此作筆。如果我們真正要爲中日兩國親善着想，決不應該這樣始終的譴責蔣氏一人，而應該對於中華民國的國民，鼓勵他們努力上進。並且也祇有這樣纔能够表示出日本大國民的襟度，以及裨益於東洋的和平。

照這樣看來，這時讓我們脫離一切的誤解與過去的關係，不致受感情的支配，以客觀的態度，

來研究現在的蔣氏，這的確是一件很必要的事。

從這種見地，再來看蔣氏的人物，我們便要不由自主的要發出這樣的感嘆：

『蔣介石氏は偉大啊！』

在他那種難處的環境之下，尙且能把左右的外國壓迫打開，并將一般認爲不可能的中國統一，在大體上也算實現了。這在旁觀者看來，如何能不佩服呢？所以西安事變斷不能推翻他，他仍然是中國的救星，崇拜的對像啊！

我們日本人，能說對於他所領導的中國，就沒有重新認識的必要麼？

我們爲重新認識中國，不但要知道領導者蔣介石的個人，同時對於他所領導的中國，在這幾年來與日本的關係，也應該有回顧的必要。

著者在本書裏面，所以特別的論到「滿洲」事件後以蔣介石氏爲中心的中日關係，也就是由於上述的理由。同時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中日交涉失敗的原因，也可以從這裏面發見出來。

本書是完全根據上面的意旨寫成的。

在執筆寫本書的時候，除掉日本的文獻外，我曾竭力的參考過中國方面的文獻。在這一點上，我須感謝十幾年來在東京朝日新聞社工作的賴貴富君，因為他這次給了我不少中國文的材料。

同時，著者也曾盡量的傾聽過日本朝野人士，對於蔣介石氏無忌憚的批評。在這裏不能把他們的芳名一一的列出，實在深感遺憾。

本書的完成，全藉助以上諸位的大力。但是不學無識的著者，言不達意的地方很多，尚請諸位原諒。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讀蔣介石氏釋放電報時

著者識。

蔣介石評傳

目錄

王文山序

著者序

第一章 今日之蔣介石

(一) 張學良的兵變

(二) 三個正月

一

五

(三) 獻機祝壽大會

七

第二章 幼年時代

(一) 環境的恩惠

一二

(二) 父母的感化

一八

(三) 惡作劇

二八

第三章 鳳農學堂時代

(一) 鳳農學堂與武嶺學校

三〇

(二) 與王正廷城壁之盟

三四

第四章 軍官學校時代

(一) 保定軍官學校

三七

(二) 日本留學時代

四二

(三) 對於掃馬房的反感

四七

(四) 中國同盟會的產生

四九

第五章 第一、第二次革命時代

(一) 第一次革命爆發

五〇

(二) 從日本急速返國

五二

(三) 放浪生活

五三

(四) 買賣證券致富

五五

(五) 向孫中山先生貢獻軍資

五七

第六章 陳炯明之叛變

(一) 叛變的開端

六〇

(二) 蔣氏的智謀

六一

(三) 討伐陳炯明

六五

第七章 北伐進軍

(一) 譚延闓之北伐前哨戰

六七

(二) 第一次北伐宣言

六九

(三) 軍閥的混戰

七二

(四) 黃埔軍官學校

七五

(五) 國民黨的發展

七九

(六) 蔣介石的北伐進軍

八〇

第八章 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

(一) 武漢、南京兩派的對立

八六

(二) 南京事件

九〇

(三) 共產黨的過激行動

九五

(四) 武漢南京兩政府的合併

九七

(五) 蔣氏的下野宣言

九九

(六) 赴日遊歷

一〇一

第九章 五年來之戀愛史

(一) 與宋美齡女士的結婚

一〇三

(二) 我們的今日

一〇五

(三) 宋美齡夫人

一〇七

第十章 北伐的完成

(一) 北伐軍的新陣容

一一一

(二) 濟南事件

一一五

(三) 日本的「滿洲」治安維持宣言

一二一

(四) 北伐的完成

一一二

(五) 南北妥協

一三五

第十一章 蔣介石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一) 掌握實權的蔣介石

一二七

(二) 國民黨的指導原理

一三〇

(三) 黨治與政府的組織

一三七

(四) 蔣介石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一四一

第十二章 反蔣陣營的沒落

(一) 蔣馮的衝突

一四八

(二) 廣東及廣西派

一五二

第十三章 紅軍的討伐

(一) 中國共產黨的發達

一五九

(二) 蔣氏討伐紅軍

一六四

第十四章 中國之醒悟

(一) 「滿洲」事變的失敗

一七三

(二) 自力更生

一八九

第十五章 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一) 新生活運動

一九七

(二)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二〇九

(三) 如何救國？

二一一

第十六章 調整中日國交

(一) 敵乎？友乎？

二二六

(二) 中日親善

二四九

(三) 波瀾重重的華北事件

二五六

(四) 三原則對三原則

二六一

(五) 最近的中日交涉

二六七

第十七章 西安事件

(一) 蔣介石與張學良

二七四

(二) 劫持蔣氏

二八〇

第十八章 中國之統一與復興

(一) 中國的統一與建設

二八六

(二) 外人對於中國復興的觀察

二九一

第十九章 蔣介石之偉大

(一) 蔣介石與希特勒及墨索里尼

二九五

(二) 蔣介石的人物

三〇五

第一章 今日之蔣介石

(一) 張學良的兵變

「十二月十二日午前，陝西省城西安，張學良部下三千名叛變，蔣介石氏被劫持。」

「因接蔣氏電招，集合西安之南京政府要人，蔣作賓、錢大鈞、陳誠、邵力子、蔣鼎文等，均或被暗殺，或被監禁。」

「據南京中國方面消息，在西安被張學良劫持之蔣介石氏，因用強硬態度，申斥張學良之威脅，於十二日夜有被學良部下殺害說。」

十三日清晨，東京各報用頭號大字，登出這樣如青天霹靂的重大消息的時候，一般日本人都好像觸電似的，全身震動起來。

恰巧，這一樁事件的發生，在日本方面，正因為中日外交失敗，鬧得很利害，而國內關於「日

本是否還有外父呀？」以及「糾彈廣田首相」等問題，簡直是層出不窮。日本外交的失敗，換言之，自然也就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了。所以當時一般人都想像蔣介石必定充滿着成功的快感，從華北飛到陝西。因為如此，在接到上海的這種電報時候，自然愈覺得驚訝了。

霞關的外務省因為十三日那天是星期日，不但平日專門辦理關於中日方面事情的東亞局，連情報部裏的人們，也都從十二日的正午，到伊豆溫泉出席什麼有味的中日交涉慰勞會去了，所以當時這兩部分，都是很空虛的。

十二日的那天夜裏大約在十二點鐘左右，喜歡喝酒的人，喝得正在興頭上，不喜歡喝酒的人，已預備休息的時候，忽然從東京打來的一個電話說：

「蔣介石被監禁了！」

當時在長岡溫泉的東亞局長桑島，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神情煥發，在眉宇之間，現出一種很有決心的表情，說：

「噓！幹了！」

同時，在伊東溫泉的情報部長天羽，聽到這個消息，雖只說了一句：

「到底幹了！」

但是他的話裏，却好像說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一樣。

三宅坂的陸軍省，雖說十三日是星期日，那天秦新聞班長，石本軍務科長，岡本軍事科科員等人，從早晨就在那裏開會，一直討論下面這種題目：

「蔣介石被監禁後的南京政府，到底是敵乎？友乎呢？」

從前在倫敦會議席上，提出指導的軍縮案，與英美周旋的永野大將，那天在海軍省發表意見說：

「對於中國的混亂，日本帝國不可玩弄乘火打劫的小策。」

這到底是受國民輿論信望的海軍省，牠的態度是何等的堂皇！一般國民聽到這種適合時宜的有力量言論時候，該是怎樣的覺得安慰啊！

至於一般輿論的傾向，也沒有不憎惡張學良，尊敬蔣介石氏的。原來日本人最恨的是叛徒，所以這大概也很有關係罷？

到了十七日的那一天，雖說南京政府業已公佈：

「蔣介石氏健在，目下中央已與張學良進行妥協中。」

但是大多數的日本人，還是愁眉不展，因為他們恐怕那帶殘忍性的張學良，不一定什麼時候會殺害蔣氏的。

比起日本人的顧惜蔣氏，他們本國人，還不知要拿出幾十倍的崇敬心，在那裏爲他的生死擔憂啊！

蔣介石氏在西安被劫持的一個半月以前，即十月三十一日的那一天，因爲是蔣氏的五十歲生日，中國舉國上下，特別要爲他祝壽，並祝中國的統一。這種祝壽，在本身上固然沒有多大的意義，但由此也可以知道中國民衆，是怎樣的對於蔣氏感戴啊！所以要談蔣介石氏，必須先從祝壽講起。

(二)三個正月

新興的中國，原來有兩個正月！

這種話，或者有许多人要覺得奇怪，但這的確是事實。

第一個正月是陽曆一月一日，這是新近在中國代替了舊曆年的新正月。

第二個正月是國慶日，何以國慶日是正月呢？因為從這一天起，中國的男女老幼，才開始有中華民國的國籍。在一年之中，這當然是最值得慶賀的中華民國的誕生日。

中國的鄉下，到現在還沒有放棄舊年，因此新曆年在中國還沒有怎樣普及，不過國慶紀念日則不然了。這一天連文盲也都知道，所以四萬萬人都一齊慶祝。這在事實上可說是「全國的了。」

國慶日又稱爲雙十節，第一次的雙十節是在二十五年前（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今年的雙十節是第二十五次的雙十節。特別今年，因為中央政府統一了全國，所以這次的慶祝也特別的盛大。

但是，今年（一九三六）與往年不同，大多數的中國人，尤其是蔣介石氏自身，在第一與第二

的兩個正月之外，又過了另外的一個新正月。

這次的慶祝典禮，比任何的典禮，都要盛大。這天是雙十節以後第三個星期的十月三十一日。這天中華民國的國民，不分上下，爲慶祝蔣氏的五秩生日，共計獻機七十多架，來充實國防。

某一家報紙，當時指這一天爲「蔣介石慶祝日」。這一天完全是爲慶祝蔣氏的一天。

蔣介石的五秩生日被人知道之後，他的知己與部下們自不用說，當時連一般人都都集合起來，一方面商議如何贈送禮物，一方面派人去探聽他的意思，然而蔣氏的回答，却很出人意外，他說：

「這種事情絕對的不可！」

依蔣氏的意思，以爲祝壽是私事，自己決不能因爲私事，來接受同志或同胞們的任何一點禮物。後來經過幾個人的商議結果，認爲這種禮物，如果同時可供國家或公衆的使用時，那總該可以罷！於是大家決定了獻給他國防用的飛機。

這原來祇是他幾個友人的計劃，照當初的預想，以爲最多祇能送到一兩架飛機。然而事實上，

自從這個消息傳出以後，當地的南京固不用說，就是上海，廣東，北平，天津，漢口，安徽，浙江也都聞風響應。甚至連南洋的華僑，也都響應起來了。因此結果成功這樣一件國民偉大的壯舉！

國民獻他的飛機，價值在二百萬元以上。這怎能不算是一件大事呢？

(三) 獻機祝壽大會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九時，新獻的飛機六十八架（其餘數架尙未成功），排列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上，舉行極壯嚴的獻機典禮。商人，工人，軍人，學生以及一般民衆，參加者共計二十餘萬人。在中國報紙上說這是南京空前未有的盛況。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氏以下，國民黨，政府，軍界各要人，均先後到場，由上海市長吳鐵城氏任獻機團的主席，講演全國獻機狀況及生日獻機的意義。主席講演之後，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氏代表蔣氏接受飛機（蔣氏因爲華北問題，當時在河南省的洛陽），並表明將原機轉獻國民政府。於是國民政府林主席，即起立致接受謝禮。禮畢，由音樂隊奏樂，到會者數萬人合唱「祝壽歌」，歌

聲震動全市。

蔣氏的祝壽歌，是事先在各學校練習的。這歌裏的意思希望中國的民衆熱心航空救國及表示信仰蔣介石氏爲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這歌裏面有一節說：

軍閥內爭，干戈擾攘，

國勢危殆，生民塗炭，

唯我蔣公，總理信徒，

領導革命武力，

掃除障礙，統一中國，

蔣公蔣公，是同胞的救星，

願我蔣公，萬壽無疆。

這個歌裏面，共含着三個意思：就是讚揚蔣介石氏的統一中國，說他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復興民族的偉人，維持正義和平的同胞救星。

隨後，大概有七十架左右的飛機，發出很雄壯的聲音，盤旋在天空。不久，這些飛機忽然排出「中正」兩個大字出來。

這「中正」兩個字，就是蔣先生的本名。在排過「中正」以後，又排出一個「五」字出來，「五」字的意思，自然是指着五秩壽辰了。據中國報紙的記載，當時立在地上的觀眾們，都一齊歡聲雷動。繼此以後，飛機還在空中忽高忽低的表演絕技。

在慶祝獻機典禮的席上，大會主席吳鐵城氏（上海市長），致開會詞說：

「今天蔣先生五秩壽辰，全國各地代表，暨首都數十萬民衆，舉行此盛大熱烈的獻機典禮，我們躬與其盛，都感到十分榮幸。

蔣先生追隨總理，致力革命數十年，其對黨國助勞，已爲舉世共知，無庸我們來詳細敘

迹，祇就十五年誓師北伐以來，迄今十年間，如掃蕩軍閥，驅除赤匪，完成統一，支持國難，可謂無刻不在艱苦奮鬥中，爲世人之所不克爲，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任勞任怨，百折不撓。在內憂外患重重包圍之中，卒奠定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今當其五秩壽辰，全國同胞獻機祝壽，舉此非常禮物，以致其非常崇敬，實爲空前之盛舉。

蔣先生在國民政府主席領導之下，精勤惕厲，要復興我們民族，革新我們的精神，爲我們國家造成鞏固堅實的基礎，無疑的是我們全國同胞所心悅誠服的領袖。我們要對這位領袖，表示最高的敬意，自然須仰體他的苦心，助成他的工作。所以全國同胞，不分內地邊疆，不分國內與國外，一致釀金納款，貢獻於他，以充實他的國防的目的，我們以蔣先生愛護國家，是中國的柱石，我們用這樣方法爲其祝壽，同時即爲國家共同努力。

先生是中華民國的柱石，我們獻他飛機，同時達到航空救國的目的。航空救國，本是我們國父 總理的遺訓，這次獻機祝壽，可以說是中國航空史上空前的紀錄。』

以上是吳氏的演說。

當時飛機場上，固不必說，南京全市，各家各戶，皆高懸國旗。「祝壽獻機」的字樣，到處可以看見。全市繁華的街上，人山人海，在夜間舉行的提燈大會，把南京裝點得光怪陸離。

南京中央攝影所（國民政府經營的影片公司，也乘着這天舉行盛儀的機會，把蔣氏的生涯攝成電影，拿到各處去公開表演。同時，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當日廣播「黨歌」，及蔣氏自著的「五十年生日的感言」，「國民革命軍歌」，「建國二十五年進行曲」。戴傳賢先生講「關於蔣先生成就大業的根本」，「新生活運動歌」，「民族英雄歌」，「精忠報國歌」，王正廷講「蔣介石先生十年來建國偉業」等節目。

娛樂時間的廣播節目，完全是與祝壽及獻機有關係的歌曲，例如「凱旋曲」，「娛樂昇平」，「華胄英雄」，「虞舜薰風曲」，「滿堂紅」，「戲水鴛鴦」，「太平天」，「樂太平」，「雙飛蝴蝶」。最後以「民族英雄歌」及「總理紀念歌」結束了該日的廣播節目。

同時，上海及全國各大都市，電影戲院裏面，也都是些與祝壽戲機有關係的節目。公園及遊藝場中，那天人特別的多。假如照中國的報紙上講起來，那裏簡直可說是「人山人海」了。

這樣，蔣介石氏，就完全成爲中國的第一人了。

第二章 幼年時代

(一) 環境的恩惠

浙江省東部，有一小縣，名叫奉化縣，位置在刻川（又名奉化江）與殺虎嶺之間。西南是高原地帶，北部是平原，土地適宜於耕種。隣縣裏面有臨海縣，新昌，嵊縣，及甯波，距離象山港，大約有一百華里。

要看很精密的地圖纔可以知道：鄰縣的人口，要比較的多些。那裏除農業及商業之外，還經營小規模的手工業。這些物產，大概都要經過奉化，運到象山港，或者甯波，上海等處去。由此我們

可以知道奉化縣應該很熱鬧，而且是交通上的要道。

因此，這裏所住的人口，自然也很多。現在奉化一縣的人口，共計有三十萬。奉化人的特質是勤苦，耐勞，儉樸，好學。

目下中華民國的第二人，而且事實上居中國元首地位的蔣介石氏，就在距今五十年以前，西歷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於奉化縣錦錦溪的溪口鎮出生的。

這個地方，周圍有山，有河，有海，也有平原。不但交通方便，而且物產豐富，人民也很勤勉。因為受這樣環境的影響，奉化縣的人民，從來對於人生，比較的思想中庸，綜合，而堅實。

蔣介石氏的天性，大概也是繼承這地方人的特性。他幼名端泰，後由其母改爲中正，字介石。父名佚，號肅庵，母王氏，係奉化縣商家的女兒。

奉化縣在中國有名的物產是竹工，那裏出的竹盒，竹篩，竹籬，竹籠，不但品質堅固美觀，而且很合實用。雖不是裝飾品，但用時漸漸會發生美感。這就是奉化竹工所以有名的道理。假如拿來

與江蘇，福建比較，那麼奉化的竹工玩具，要實用得多了。此外，奉化出茶，米，及魚鹽等物也很多。

奉化地方在前清時代，屢次遭貪官污吏的擄取，以後又經太平天國軍隊的蹂躪，所以一時地方上非常荒廢。但到蔣氏出世的時候，因為清朝勢力已衰，同時地方人的團結力也強盛起來，農村的元氣纔漸漸的恢復，田園五穀豐熟，港灣的大小船舶的出入，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

蔣氏每次遇到同鄉來訪問他的時候，常常的問人家說：

「我離家鄉很久，那裏的情形已經不大知道了。家鄉的風景，有那些地方，與從前不同了昵？」他回想故鄉的時候，總是現出一種感懷無量的樣子。

事實上奉化有很多的名勝，是可以使蔣氏回想到從前的。奉化的四圍是山海，西南有一個雪竇寺，巍然屹立在連山的最高頂上，保佑着鄉民。在寺的附近，又突起許多的奇峯怪巖，好似羅漢及和尚一般的，環繞在四圍。春夏時分，那裏的草木非常茂盛，花香撲鼻，而山間的林泉，像圖畫一

般的清雅。不但名勝古跡很多，而且天象也異常清淨，不啻是地上的桃源仙境。西山的「千丈岩」爲瀑布的名勝地。這裏的瀑布，遠勝過日光華嚴瀧的那樣澎湃的聲勢，好像是萬馬的飛奔。當飛沫照在陽光的裏面時候，那種銀色的輝煌，是任何有名畫家所不能描寫的。再等到聽見山上寺裏的曉鐘或晚鐘的時分，那更要使人會覺得這是地上的樂園了。

此外，錦屏山上有一個佛塔亭。這也在連峯的高處，古木參天，其幽靜典雅，爲天下第一。山麓到處竹林叢生，綠葉徧地。奉化竹工所以有名，也就是因爲有這種竹林。

奉化除環境良好之外，教育非常普及。同時，市政非常良好，近年工業也漸漸發達起來，各處的黑煙濛濛，可爲證明。這樣看來，奉化的和平鄉，最近受着產業革命的洗禮，不久也要變成工業的都市了。

依現在的狀態，奉化縣無論在名勝方面，或者行政產業方面，皆在浙江省內，出類拔粹，所以無怪乎往往有人嘆賞「美哉奉化」啊！

蔣介石那樣富於睿智的眼睛，或者就在這種優美的山水裏面育成的罷？假如我們以奇峯來象徵他的果斷力，那麼他的奮鬥進取的精神，應該是因爲受了千丈岩的熏陶罷？他在少年的時候，朝夕眺望的連山最高峯上的雪竇寺的雄姿，怎不就是造成他今日所以能做四萬萬人的「民族英雄」的那種綜合的政治能力，遠觀，以及悟性呢？

蔣介石出生的溪口鎮，又叫畬孝鄉，是在剡川上流的一個商業區。大凡內地的物產運出去的時候，一定都要經過這裏。所以這裏的商業非常發達。據說溪口鎮因爲大店家很多，街道很寬闊，在奉化可稱第一。

奉化的人民，大半從事農業與商業。農家分散在各地，約占總人口的二、三成。商家大部分集中在錦溪的溪口鎮（畬孝鄉）一帶。其中有些大商人發展到外省。商家人數，亦約占全縣的二、三成。此外，從事船業的約占四五成。在長江內河裏航行的有限的船舶，那些船主的戶籍，大都是奉化人，尤其畬孝鄉是這種船業的根據地。縣裏的物產，幾乎完全由船舶運往外省，從早至午，在

這個船舶根據地的人聲，嘈雜不堪，苦力們往來不絕。

蔣介石氏幼年時候常喜歡伴着家裏人去看這種船舶的牛活，有時向苦力招呼，互相談笑。等到有人突然吹起螺號的時候，船上的人們，便一齊丟開蔣氏，向海面出發。

每天夜裏，街上的茶館，滿是些從船上回來的船夫。他們都赤着腳，頭也不梳，面上髒得好像印第安人一樣。不過他們却一點也不在乎，照常的高聲談笑。

蔣氏少年時候，就很願意和這些人接近，而且也很受他們的歡迎。因為這種緣故，他往往受家裏人的責備及隣人同輩等的嘲笑。但是他對於這些事情，却並不介意，仍然和勞動的人們嬉戲。照這樣看來，他在以後所以要代表大多數的貧民勞動者，起來反抗滿清政府，以及造成今日的中華民國，也決不是偶然的啊！

他一方面在清淨高雅風光明媚的環境裏長大，而另一方面，又從很小就看慣粗野獷俗的船夫牛活。這兩種完全相反的環境，對於蔣氏，都給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無怪乎蔣氏後來，無論在自己的

生活上，或者建國的才略上，都能够那樣隨機應變，緩急寬嚴，運用得宜，而結果造成他現在這種地位。

總之，蔣氏是一位實行家，現實主義者，同時他的人生觀，是綜合的人生觀。

(二) 父母的感化

偉大完全是由於環境和遺傳造成的。就是蔣氏也不能例外。

他在幼年時候，不但受環境的影響，同時在他的人格上，受父母感化的地方也很多。

他的父親名佚，字肅庵，爲人好學，謙讓，而重禮義，平常很受人尊敬。

肅庵先生的父親，即蔣介石氏的祖父，稱爲玉表公。到他的時候，纔放棄了先祖代代的農業

改做商業。因爲住在山海之間的關係，所以經營這兩方面的特產，鹽和茶的批發交易，積蓄了相當的財產。他平生最好做社會事業及慈善事業，在地方上的公共事業，尤其願意率先幫忙及督監。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先生說：

「玉表公是一位樂善好施的長者，凡是親戚朋友婚喪或緩急之事請他幫助，都能够予以接濟。對於地方的公益，如修路，補堤等事，統統盡力贊助，而且親身督理，力求完善。其所居附近錦溪的地方，爲甯波，紹興，臺州三府之連界，爲三府人民往來必經之通路，因爲地形荒僻，人煙稀少，並無茶館飲食之處，玉表公乃在嶺上佛院，預備乾糧茶水，供給行人，許多年沒有間斷，行人非常感激。」

玉表公又通醫理，常爲人診治，也喜歡研究佛學，因此發揮其仁慈博愛的精神，以濟人度世。治家雖嚴，而對人則極親厚。」

蔣介石氏，似乎從對他祖父的印象裏面，受到的影響很深。

蔣家到蔣介石氏的父親這一代時候，浙江省一帶，因爲做了太平天國反抗清朝的惡政及苛稅的戰場，以致地方上完全荒廢，同時蔣氏的一家，也受害不淺，幾乎陷於破產。戰事平定之後，肅庵

公竭力挽回家運，不到幾年工夫，家運也就恢復了。這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肅庵公生性好強與勤勉的結果。

邵元冲先生，關於肅庵公，曾經這樣說過：

「介石先生的父君肅庵公，性情剛直，處事公正，待人誠摯，自持勤儉，容貌毅重，較王表公的性格更富於陽剛一方面：：。

在鄉間好排難解紛，主持公道，對於公益事業，極爲努力，地方教育亦盡力興辦。凡無資求學者多予以資助，因此造就的極多，常對介石先生兄弟曰：

「我因少時繼承了先人的遺業，不能爲國盡力，但我還仍願對於地方上的公益和教育及改良風俗方面，盡相當努力，使地方安甯，親族和睦，你們可以專心讀書，將來如果有所成就，也可彌補我的缺憾」。

肅庵公到晚年時雖然愛子很切，但仍教督很嚴，期望也愈深，因此介石先生後來對求學與國事

方面的努力，實在與肅庵公的家教有重大關係。」

蔣介石氏，對於祖父的慈愛心與物施於人的精神，及父親的剛毅耐勞與挽回家運的努力，當時都受着很深的感化。

蔣介石氏九歲時候，父年五十三歲，便不幸壽終。於是一切皆要靠寡母支撐，她守護幼子的成長，爲生活奮鬥的勞苦，自然也非普通可比。

她的出身，是奉化商家的女兒，娘家雖不十分富裕，但也是小康的中產人家。她從不染奢侈的氣習，也不浪費一物，而祇知整天的工作，講求儉樸，貯蓄。

自蔣氏的父親病歿以後，她因爲悲傷過度，辦完喪事，便想殉節。但是對於孤兒介石難以捨棄，況且這時又想起古人說的「死節易立孤難」，所以決心爲故夫料理後事，以待幼子成長。當時她想人生在世，須盡到做人的義務。因此，她總鼓起精神，守着孤兒，盡心的扶養。

她因爲長於刺繡，所以就開始這種工作。從此在家教養介石，出外與親戚和好，這樣維持一家

生計。結果遺產但未動，而且反有增加。

她素日信仰佛教，也懂得佛經。鄉下的婦人，雖大都不識字，但她却非文盲，這在四五十年以前，的確是很難得的。

她時常以先夫的家訓，教誨介石。當介石少時，萬一不聽教誨，她雖決不放過，但同時對於介石，始終是愛撫備至。

這樣教與愛，嚴與寬的雙方面的訓導方針，從介石年少時候，便養成他的處世能力。而且聰明的蔣氏，也很能領會母親的期望，所以也竭力的想往好的地方去做。

不過，年少的蔣氏，也有他自己的見解及主觀的地方。因此他的意見，往往與母親之間發生衝突。但是在這個時候，到底社會經驗比起少年的蔣氏豐富些的母親，總是先聽了介石的意見，然後再指點他的錯處，而再拿出一個綜合的意見，來解釋給他細聽。

現在蔣介石氏，每想起當時的這種情形，便時常要說：

「母親真偉大！」

她從前對蔣介石氏常說：

「自從你九歲的時候，喪父以後，我嘗盡辛苦，來教你成人。但母親並不希望你將來發財享福，而祇希望你既爲男子，就爲國捐軀！」

她又有時說：

「無論什麼事情，不要靠人。母親希望你凡事自己去做，責備自己，而對於社會，要有貢獻。」

中國革命的時候，鄉間的親戚朋友，因爲聽說蔣氏也在裏面担任指揮，於是都前來勸阻。但是王太夫人（蔣母）却不以爲然，反而對蔣氏加以鼓勵。

以後江蘇、浙江兩省，歸到革命政府管轄之下的時候，這種勝利消息，傳到家鄉，但蔣母也並不覺得驚喜，仍然一如平時，而且還時常在信上告戒蔣氏說：

「爲國家效勞，始終勿懈！」

蔣氏在上海時，常想迎接母親養老，但是每次母親來時，祇住了幾天，便要回去，仍過她那淡泊的生活。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蔣氏亡命海外，他時常寫信給老母，說他公私多忙。每次接到來信，王太夫人總不忘拿出鼓勵他的一番話，來寫回信，周圍的人，雖都勸她小心，但她並不理會。因此她的勇氣與果斷，反使人非常佩服。

孫中山先生，因為佩服蔣母，在民國五年時候，特別爲王太夫人題贈一塊橫額，讚揚她說：

『教子有方』

蔣氏直到現在，每逢得空，便要回到奉化謁靈。他對於母親的這種恩澤，怎樣的感謝，從他在五秩生日的那天，親自在全國報紙上，發表的那篇「敘述我母」的文章上就可以看出來了。現在在這裏讓我把其中一節介紹如下：

『其間形象最深刻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肖孤露之身，自鞠育教誨以至於成年，胥唯母氏劬勞

之賜爲獨多。迄今吾母之墓木已拱，而並慈闈所望於藐孤以報國淑世不辱其先者，乃蹉跎而無所成就。黨國多艱，民生日瘁，復興之業，前路方遙，維歲月之不居，媿天職之未盡，撫茲時序，尤爲旁皇悚息。爰述吾母夙昔保家教子之道，藉明孤苦成立之艱，且願以刻苦自強之義，與吾同胞同志相共勉於報國之業焉。中正生長鄉僻，家僅溫飽，吾祖父數世耕讀，勤儉節，薄有資蓄，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貧，孑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寅緣爲虐，吾家門祈既單，遂爲覬覦之的，欺凌脅逼，靡日而甯。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茶粟之苦，不足以喻。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慈，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強，保護稚弱，內而揖和族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謹慎將事，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之道，督令躬親傭保猥賤之工

作，以勵其身心，夜寢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中正幼生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及年稍長，立志出國學習軍旅，鄰里譁異，輒相尼阻，其力排羣議，拮据籌維，以成其學者，吾母也。既聞革命大義，許身黨國，備歷艱危，戚族相戒，莫敢通問，其篤信不疑，多方委曲，以壯其行，辛苦持家以堅其志者，吾母也。民國紀元，中正始有致菽水之養，而稍慰倚閭之望，然吾年於茲已荏苒二十有五矣。以軍閥竊國，主義未行，革命事業屢遭挫折，其剴切申戒，最以勿緩勿輟貫徹始終者，又罔非吾母聖善之教也。溯自中正九歲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遽遭。及中正二十六歲以後，又常以亡命生活，勞吾母之顧念，吾母唯一秉自信之堅，以再造吾家唯一之責任，嘗語中正，謂吾以孱孱弱嫠，歷人世難堪之境，當其孤苦，曾不知何以自全，所確信而不疑者，則惟孤子必須教養，方可有成，與吾家之必當有後，宜使之努力自助，以母墜家聲而已。又嘗謂艱困厄，世所恆有，而自立自強，必當盡其在我，故家世愈艱而禮法不可不飭，門所愈

薄，而志氣不可不堅，孤寡弱小之賴以自存，舍奮勉自立刻苦自強更無他道。及中正矢志革命，吾母又常勉以大孝報國之義，謂追念吾家往昔，岌岌不保之苦狀，即當推而廣之，俾人世無復有嗚凌衆暴之慘史。故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凡茲警言，皆吾母示中正所以立身之道。中正雖勉思繼述，而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原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蔣介石氏，目下在中國，恐怕要算對於責任觀念最強的一人。他平時極願意在大衆面前講演，勸導人遵守紀律，注重組織統制。凡受到他的影響的中國青年，現在不知有幾千百萬人。這原來也是他在少年時代，受他母親訓育的結果。他的母親使他守紀律，注重組織，以副國民的期望，現在總算未辜負他母親的一番教育和希望了。

他現在已成爲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同時在大體上，也總使將一般認爲不可能的中國統一實現

了。他在地下的母親，如果知道，想必也禁不住要微笑罷？

(三) 惡作劇

普通兒童總喜歡頑皮。對於頑皮的兒童，因為教導的得法與否，能使他將來變好變壞。少年時代的蔣介石氏，也是一個頑皮的兒童，他最喜歡的是惡作劇。

有一天，年少的蔣氏在草場上和許多兒童作跳板遊戲，大家先用猜拳的方法決定了次序，分出兩人一組，交換着遊戲。這樣輪到年少的蔣氏時候，突然從別處來了兩個粗壯的惡童，說要讓他們來玩。蔣氏那時雖然人小，但是胆子很大，向那兩個惡童硬說不行，因此蔣氏和一班兒童都被這兩個惡童用武力趕開。

起初年少的蔣氏，本想動武，但是因為其餘的兒童都很胆怯，沒有人敢出來幫忙。於是當時蔣氏在忍氣之下，運用他的智謀，和另一個孩子跑回家去，把洗衣用的木盆拿出兩個，裏面盛着冷水，暗中藏在跳板下面。沒有注意的那兩個惡童，在跳板下降的時候，便都一齊落到水裏，全身

盡溼。

當時年少的蔣氏，看了這種情形，便與其他的兒童，都大聲叫好，而一齊逃回家去。

又有一天，王太夫人（蔣母）到親戚家去，晚間沒有回家，祇留介石和他的妹妹在家。附近一個兒童，因想乘這機會，來欺侮年少的介石，於是在蔣家的牆外，裝做鬼叫。本來鄉下人都很迷信，但是年少的介石，却不相信有什麼鬼神。他細細的聽時，覺得這是平常聽過的人聲，結果判斷這是附近的某少年的惡作劇。因此他先把這種假鬼，告訴妹妹，故意使她放聲的假哭，騙得那個少年得意揚揚。

就在這個時候，蔣氏趕快找出一個平常盛着豆子的竹籠，在上面蓋起一張白布，戴在頭上，暗中從後門跑到那個少年回家的路旁，藏在一株大樹底下。

過了不久，那個附近的少年，滿以為嚇够了蔣氏兄妹，正在極高興的回家時候，一走到樹旁，忽然出現了一個白頭的妖怪，遠看起來，不知是野獸或是妖精，於是嚇得那個少年聲淚齊出，飛快

的往家裏便跑。蔣氏點點頭，隨後驅逐。結果那個少年，因為不堪恐嚇，便倒在地下，放聲大哭。後來等到鄉下人聽到哭聲，出來看時，蔣氏已經回到家裏，對妹妹訴說一切，兩人爲之大笑一場。

蔣母每聽到這種頑皮事情，總是嘆氣。她到底是一位賢惠的母親，對於蔣氏，表面上雖不責罰，然而時常拿出故事作爲比方，用來警戒蔣氏，使他自己覺悟。同時，她常想到如果照蔣氏這樣聰明，完全用在學問上面，將來一定會很有成就，所以竭力教他用功。果然，蔣氏漸漸的知道用功，從此以後，成績也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

第三章 鳳農學堂時代

(一) 鳳農學堂與武嶺學堂

浙江省教育視學官，視察全省教育回來的時候，大都在報告書裏，總要說：「奉化縣的教育，在省內最爲發達」。其中特別是錦溪中學，比較的辦理得最完善。

錦溪中學，第一引人注目的，便是牠那寬宏的校舍。至於設備的完整，教師的優秀，也都在省內極其有名。在學校的學生，大概有一千人左右。到底因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所以直到現在，那個學校畢業出來的人材，已有數千人之多。

該校原名「鳳農學堂」，現在的蔣介石氏就是從這裏畢業的。

鳳農學堂，本來規模很小，還不到現在的錦溪中學的十分之一。自然那時的教師及設備，也不能和現在比較。蔣氏時代的鳳農學堂，還是鄉下的一個小學堂，裏面的教育方針，可說和私塾一樣，而且那時的學生也不算多。

農村的兒童，到了十歲或十五歲的時候，仍然很少有人進學堂讀書，這乃是因爲他們父母不許的緣故。如果學堂的學生去勸他們入學，他們的父母中有的便要說：「農家的孩子，與船夫的孩

子，都用不着什麼學問。」也有的說：「讀書不必着急！」大概個個都是這樣的頑固。對於這種人，鄉下的先生在勸導上所費的苦心，實在非尋常可比。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學堂的學生，都年齡很

大。十五歲的一年級生，十八歲的二年級生，甚至廿幾歲的小學生，也不算稀奇。由於年齡的關係，各人的智力，思考力，及記憶能力，都參差不齊。如想一律的教育，那簡直絕對不可能。所以結果，也祇有改成私塾式的教育。

蔣氏進這樣私塾的時候，那時還祇有九歲。因為他當時很小，同學們都叫他「小家伙」。蔣氏的母親與別人不同，很早就把介石送進學校。她平常就覺得兒童們很富於智慧，若是留在家裏，反會學壞，所以要把他們送進學校，愈早愈好。這樣，蔣氏比一般人都早進了學校。

鳳農學堂離蔣氏家裏很遠，不能走讀。因此蔣氏少時，寄居在學校附近的親戚人家。介石年齡雖小，但很好學，他並且覺得做學生也很值得高興。當時學校裏的課程，仍然以國文（四書五經）為主，每天學生都是在那裏大聲的背誦國文，至於書裏的意思，他們却很少能懂。介石從小就與人不同，而喜歡追求字義。一一的拿來請問先生，當時教授的方法，本不注重講解，所以使先生都覺得有點討厭，對他很不和善。然而好奇心盛的蔣氏，並不介意，仍然繼續追問，結果使這私塾式

的先生們，看見他的母親來時，不免要說：

「府上的學生，太好問了。」

蔣氏在鳳農學堂，五六年的讀書時間，每天都要練習寫楷書，行書及草書，所以現在蔣介石將軍的字，也很有風格。

後來鳳農學堂，雖說內容一新，設備重新整頓，改名爲錦溪中學，但這已經是在蔣氏成名之後，由他命令鄉里的當局，從事改建的。此外，蔣氏在故鄉的近旁，建築一座學校，命名爲「武嶺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可以說是一個綜合的學園。學校的位置，因爲在武嶺山麓，所以叫做武嶺學校。蔣氏在成名之後，所以創辦這個學校的緣故，完全由於從前他母親的意旨，同時，這樣也可以拿來紀念他的亡母。

一般中國婦人，大都是不出閨門，除裁縫與炊事之外，很少有人讀書，所以識字的婦人，當時很少。然而蔣氏的母親，却解讀文字，並且通曉佛經。她自幼學習佛典，由於研究佛學，而通文

字。從前蔣氏的母親總覺得把兒女送到幾里之外，遠方的學校讀書，實在是一件苦事，所以在生前時常對蔣氏說要爲附近學童，辦理這麼一個學校。由於蔣母當時的這種誓願，現在成立起來的就是這個武嶺學校。

武嶺學校，規模很宏大，內部的設備也很完全。現在中學部的學生，大約有一百多人，小學約二百八十人，幼稚園約一百人，都不收學費。此外，學校還經營一個武嶺公園，裏面有農場，樹木，供學生實習，以實施一種實際的教育。學校的一年經費，約四萬餘元，一部份由本縣負擔，一部份由蔣氏自己捐助。

照這樣看來，將來的武嶺學校，總該可以造就出蔣氏所希望的人材。同時，也可知蔣氏並不是一般所謂一介的「將軍」啊！

(二) 與王正廷城壁之盟

在鳳農學校讀書時代，蔣氏有這樣一段插話：

蔣氏當時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王。一天這位姓王的少年，在放學之後，與許多兒童登上城牆，大家在城牆上跳着的時候，忽然這位王姓少年沒有小心，就從城牆上滑將下來，幸虧在中間被圍牆上葛藤的樹枝掛着，身體倒懸在空中，而沒有喪掉性命。

在這時候，同伴的兒童，都嚇得變色，不但不敢去救，而且一齊都逃走了。王少年後來大聲求救，纔被通過的行路人救下，拾了一條生命。

第二天，王少年將這件事情告訴蔣氏時候，蔣氏聽了，怒氣衝天，舉起拳頭，便望外跑，而口裏說着：

『這些東西，原來要想害你。好！讓我去收拾他們去！』

王少年看見情形不對，於是趕快制止他說：

『何必這樣生氣？這與他們何關，都是城牆的罪過啊！』

假如沒有城牆，我決不會有這樣災難。那座可惡的城牆，將來我不成名則已，如果成名，一定

「要把奉化的城牆毀去！」

蔣氏聽了這話，覺得也很有道理，隨即向王少年發誓說：

「好罷！你和我，無論那一個，如果有了地位，就先把這座可恨的城牆拆去！」

王少年後來先於介石少年得志，早就做了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現在他又做駐美大使。但是今日的蔣介石氏，地位已經在王氏的位置之上。他們二人既是同學，而又是同鄉啊！

那麼，這位在介石少年之先得志的王正廷博士，他把從前發誓要拆毀的奉化城牆，果然拆去了麼？沒有，他以後政務多忙，在政界東奔西走，所以總也沒有實現。

但是蔣介石氏，後來興師北伐，掃蕩蟠踞在浙江一帶的軍閥時候，忽然想起與王正廷的盟約，便即刻命令部下把奉化的城牆拆掉。中國有一句古話說：「城下之盟」，這種意思，原來是說在敵人兵臨城下的時候，不得已的屈服，與敵人在城下議和。蔣介石將軍，從來就沒有訂過這樣「城下之盟」。然而他所訂過的盟約，在這一生裏面恐怕祇有這次的一字相差的「城牆之盟」，也就是拆

毀奉化城牆的盟約。

奉化的城牆，是被拆毀了。但是從這裏出來的兩位人物，却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大人物啊！

第四章 軍官學校時代

(一) 保定軍官學校

西歷一九〇六年是前清光緒三十三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從中日戰爭計算起來大約有十二年，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第二年。

當時被日本戰敗的滿清政府，到這一年纔開始感覺改革軍備的必要，著手在直隸省（現在的河北省）的保定，創辦一個軍官學校。政府創辦這個學校，是由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奏請，根據他的計劃，從各省選拔青年，經過考試之後，分出陸軍，海軍兩部，將來造就一般新式軍隊裏的軍官。因此滿清政府非常關心，每年的經費支出不下十數萬元，可知學校的規模之大了。不過當時的中國

人，缺少組織及科學能力，雖然從歐美及日本請了很多的優秀教官，但是仍然沒有什麼成績，不久學校也就停辦了。

蔣介石從鳳凰學堂畢業之後，他的叔父常勸他經商，但是蔣氏總說自己不會去奉承他人，所以對於經商根本就不相宜，這樣拒絕了不聽。在他母親，也覺得既然如此，也不必勉強，所以就這樣的留在家裏。大概過了半年之後，蔣氏偶然聽說北方保定成立軍官學校，要從浙江選考四十名的學生。蔣氏聽到這事，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應該做個軍人，立刻向他母親商議這事。

中國有句古話，『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軍隊與劫取良民財物的盜賊，沒有多大區別，所以年青的人，萬不可去當兵。當然，現在中國的情形已經是大不相同了，譬如從前的募兵制度，現在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已經改爲徵兵制度了。同時對於兵士的教育，也注重到使他們在受外國侵略或者壓迫的時候，要爲國家犧牲的上面。雖說現在外國還有嘲笑中國軍隊張傘打仗，但這已經不是實際情形了。不過在蔣氏少年時代，軍隊的確被人討厭，所以當時村裏人聽

說蔣氏要去當兵，一齊都說他「不成器」，對他輕視。

但是蔣氏的母親却不同鄉下人一樣想法，她以為如果要為國家，應該造就一般好軍人出來。

浙江省投考的學生，共計有六十多人，都是年紀很大，其中因經商失敗的占據多數，而品性不端者也不算少。但是在這當中，祇有蔣中正一人，年少英俊。主考官先問他年紀，他回答說：

『十八歲！』

主考官聽說祇有十八，於是大家互相看看說：

『這太年輕，恐怕不能收罷？』

但是蔣少年隨即起立，慨然向他們說：

『男兒既有我這樣年齡身軀，當然可以為國家効力。我久已想進這個學校，所以請不要為我的年齡擔心！』

當時主考官們，大家都覺得這個少年的年紀雖輕，但精神很值得欽佩，並且體格上發育得也很

健全，所以就決定准他入學。

在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樣發達，從奉化到保定，共計要走一個月的路程。蔣介石臨走聽了不少母親的訓話，開始向保定進發。這樣忽然的離開母親膝下，無論在什麼人，自然都要感覺悲傷寂寞，但是對於前程抱着極大希望與想上進的蔣氏，倒也並不怎樣。

途中，蔣氏在各處看到許多情況，心裏很感不平。譬如在通商大埠，外國人與中國人所受的待遇，簡直有天地之差。不但如此，外國人還遇事侮辱壓迫中國勞動者及下層階級，把他們當作奴隸看待，完全輕視他們的人格。這種情形，刺激蔣氏極深。滿清政府，祇知榨取人民，絲毫不知顧及人民的痛苦與他們受外人的虐待。「是的，國家不強，自然要受外人的侮辱！」當時蔣氏發生出這樣沉痛的思想。從這以後，蔣氏開始懷抱打倒資本的「帝國主義」，剷除人民痛苦，及從事改造國家的一種革命思想。他的革命思想，可說是萌芽在這個時期。

保定軍官學校，在表面上雖說是為改革中國軍隊及防禦外侮而設的，但在實際上，祇是供野心

勃勃的袁世凱個人養成一班私人的軍隊。所以他對於這個學校，的確非常熱心，聘請來的中外教官，也大都是斯道的專家。學生們因為祇看表面，都頌揚袁世凱的恩德。

但是，蔣氏入學以後，沒有多時便窺破袁世凱的野心。他在起初雖不免發生憎惡，但後來想想，覺得袁世凱縱可以養成人材，但這些人材究竟能否爲他利用，這却全在各人自己。所以他仍舊一心讀書，希望自己將來能够尊重民意，來真正爲國家效勞。

蔣氏在學校的教官指導之下，先受到軍事的基礎教育，因爲平時日本語文的成績很好，所以一年之後，在袁世凱派遣日本留學生時，就被派到日本留學。袁世凱當時派遣留學生的意思，原來想在日本造就出一般優秀軍官來爲己用。然而蔣氏却很知道袁世凱的這種野心，因爲他深明大義，所以自始即反對袁氏。

而且這時滿清政府與袁世凱的政權，極其橫暴，幾乎臨到最後關頭。況且國民對於這種破壞人民生活基礎的政府，也早已失掉信仰。所以蔣氏看到這種情形，他的革命思想，也日益加深。

他結果來到日本度留學的生活。由現在想起來，如果蔣氏那時不來日本，或者在學識上及愛國精神上都沒有這樣充分，那麼，現在能不能做出如今這般偉大的事業，也就不得而知了。假若照從前人寫春秋的那種筆法，我們可以說：「因為有當年的袁世凱，纔有今日的蔣介石氏啊！」

(二) 日本留學時代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夏，蔣介石氏由故鄉與慈母作別，偕同學友三人，東渡日本。在這些學友裏面，其中二人是袁世凱的親戚，另外一人又是保定軍官學校主任的親戚。祇有蔣氏一人，完全沒有關係，由此可見他當時在學校的成績，是如何的出類拔粹了。

蔣氏乘的是日本船。因為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能與日本通航的輪船。他們所乘的船上，船員工役都是日本人，中國人最多不過二三人。蔣氏對於這種情形，不禁長嘆，覺得日本國土雖小，且偏在東方的一隅，但是數十年來，竭力吸收西洋科學的結果，無論在產業上，交通上，或文化上，都有很大的進步。從這隻橫渡海洋的輪船看來，也可以知道。然而在另一方面，從來號稱「地大物博」

文化最古的中國，無論在那一點上，也都不能與日本相比。

他想到這裏，覺得自己國家的國民，真羞愧死。同時他開始追究這種原因，於是自問自答，他最後得到的結論，認為這是因爲本國政府多年腐敗與積弱的結果。

於是，他對於改造國家的決心，愈加堅固。

到東京以後的蔣氏，再看見日本帝都的近代建築，蜘蛛網一般的交通路線，任民衆遊逛的公園，摩天的工廠煙筒，及培養知識的近代教育機關，學校，圖書館等，無一不使他驚嘆。

蔣氏自在日本士官學校將學科告一段落之後，便被派到新潟縣的高田聯隊，與另外的十五名中國學生在軍隊裏服務。當時的師長，就是以後有名的「長鬚將軍」，已故的長岡外史氏。這還是在如今二十五年以前，即一九〇九年的事情了。

從那時算起，二十五年以後，蔣介石氏受任國民政府主席。關於他的人物，世界上都在那裏注意的時候，長岡外史蔣軍，在東京的朝日新聞上，發表回憶如下：

「當時從士官學校出來的中國學生，大約有十五六人，分發在高田聯隊。如今做南京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君也在裏面。那時候的炮兵聯隊長是飛松上校。

不久以後，黎元洪等人的軍隊，在武昌起義，中國發生了第一次的革命，那時候正是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一年）的十月，高田地方已經下過很大的雪。蔣氏等聽說故國的風雲緊急，趕緊想回去，所以我爲他們送別，在宴會席上我說：

「諸位恐怕不能喝酒，那麼可以喝水。喝水在日本是武士決心不再生還時候的臨別表示」。當我敬他們的水時，敬到蔣氏，他便一口把杯裏的水喝乾，來向我說：

「閣下！我一定拚命的去幹啊！」

說這話時，蔣君的面上非常的精神，但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位蔣君，以後會做到那樣偉大的人物。現在再問飛松上校時候，他也是說：

「我知道是知道的，但也決沒有想到那位蔣君，將來會做到歷史上的偉人。」

留學時代的蔣君，不見得就有什麼特殊的才能或膽略。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平凡的蔣君，後來何以會做到那樣偉大的人物呢？我想了很久，後來纔偶然的有所發見。

前年（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蔣君因爲一時失意，通電下野，打算出國遊歷，途中首先來到素極熟悉的日本。到東京之後，當天的晚上（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便從帝國飯店打電話給我說：

「師長閣下麼？本想就來拜訪，但現在因爲腰痛，須要到溫泉休養。等我腰痛好後，立刻就來問候。飛松聯隊長，他也好麼？」

過了幾天，蔣君已從溫泉回來，於是我招待飛松君與蔣君二人，一共三人在我家開了一個極親密的茶話會。

這個時候我再看蔣君，他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身上穿的是燕尾服，在表面看來，與其說他是大軍人或大政治家，真倒不如說他像一位年輕的外交官了。再不好一點說，或者要使人覺得

他好像是一位新進的明星了。在我和他互相說話的時候，他仍然稱呼我爲「師長閣下！」，同時對於飛松君，也是稱呼爲「聯隊長殿」。這在蔣君，何嘗不知道我已經不是什麼師長，不過他還是要這樣稱呼，我想這莫非因爲他未忘在高田時代，我們的那次飲水作別麼？

後來我也漸漸的回想到那從前的光景，因此，在我們之間，就用起「閣下」與「你」的稱呼了。

他在要回去的時候，特別爲我寫了「不負師教」的四個字，並且在旁邊題上「蔣中正」的名字。我直到現在，所幫忙的中國人，總算不少，但是還沒一個人能像蔣君這樣，對於他人的一點恩義，至今難忘，所以那時我纔想到在留學時代，沒有放出什麼異彩的蔣君，他所以能有今日，大概也就是因爲他有這種美德的緣故罷。

昭和二年，蔣君來日本的時候，正是他失意時代，不過他當時仍然懷着很大的抱負與高遠的希望，在那裏伺候機會。

我對於這位很重恩義的蔣君，始終要來表示我的敬意。」

(三) 對於掃馬房的反感

——高田時代的蔣氏——

關於蔣介石氏的日本軍隊生活，現在還有一段插話。

蔣氏在高田第十九聯隊時候的同隊士兵，野砲上等兵新潟縣刈羽郡的霜田藤次郎氏，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對東京日日新聞的新潟版記者，敘述的內容，大致如下：

霜田氏自從入高田十三師野砲第十九聯隊後的第三年，即明治四十四年的春天，該年有五名的中國留學軍官，派遣到第十九聯隊，被編在霜田上等兵的第五中隊裏面。

但是在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未來的率領全國軍隊擔當對日外交的蔣介石氏也在裏面。所以被選出來做內藤中尉教官的助教霜田上等兵，也並不覺得這有什麼意義。

祇是當時這般人，想不到都是些中國很優秀的份子，他們關於大砲的構造及附屬品等，個個都

問得十二分詳細。霜田上等兵因此覺得有點害怕起來，便私自向內藤致官借讀內容有三百七十種的砲身附屬品的說明書，在前一天的晚間看後，到第二天再一一的加以說明。但是關於軍機秘密的事項，從來沒有洩漏。

在這些中國的青年軍官裏面，那時最優秀的要算是閻聚珍氏，他當時甚至連日本的俗歌，也都會唱。

至於蔣氏，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要讓他與普通的兵卒一樣，派去掃馬房時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現出一種悲憤的顏色，那種氣慨，幾乎無人敢當。然而因為軍隊裏的軍規關係，一切皆要遵照長官的命令，譬如有時讓他們跑步，跑得十分疲倦時候，仍然要大聲的責備他們「沒用」。

不久以後，孫逸仙先生的革命軍興。在這五名軍官裏面，當時分成「革命」與「反革命」兩派，互相時常的論爭。蔣氏與閻氏二人，似乎是相互站在反對的立場。

有一天，蔣氏忽然接到一封電報，立刻向陸部請求退隊，乘着夜蔭離開了部隊。

從此以後，一共接到過蔣氏寫給我的「嚴格的上等兵」字樣的兩封信後，就再沒有通信，這大約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最近蔣介石氏的名字，到處都可以看見。因此霜田氏回憶起來時候，總說：

「往日我們時常一塊去吃燒賣，那時因為我是上官，很容易和他做朋友的交際。而現在他登上了國際舞台，尤其關係中日問題，這實在令人感慨無量啊！」

（四）中國同盟會的產生

「鬥志」與「理想」！

這乃是青年的特徵。蔣氏對於這兩方面，可說雙方俱全。他拿袁世凱的學資，來日本讀書，照理本應該盡忠於袁氏及北京政府。不過當時的中國情形，已不再能容人感情用事。北京政府，對於中國人民，早已失掉權威信仰，同時政府內部，綱紀不振，內訌日盛，在當時已急需另建政府。況且蔣氏出身南方，他在少年時代，本不知北京政府的稅政，因為可以官費讀書，所以纔投考了保定

軍官學校。入學以後，漸漸的窺破袁世凱的野心，所以他反對政府及袁氏，也可說很有道理。

當時孫中山、汪兆銘、胡漢民、陳其美、張繼等革命志士，以東京橫濱爲策源地，在「興漢滅滿」的旗幟之下，糾合同志，從事革命。「中國同盟會」就是在這般人裏面產生的政治團體。

他們當初革命的目的，祇在發展民族主義，並沒有現在所主張的經濟革命的意義（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因此在他們之間，這時有不少浪漫派的文學青年及「志士」份子，所以與當時的日本志士，倒非常意氣相投。頭山滿，犬養毅，寺尾享博士，宮崎滔天等人，與這些人都很有往來。

中國同盟會，可說是當時要打倒清朝三百年的專制政治的唯一的原動力。

第五章 第一第二次革命時代

（一）第一次革命爆發

蔣介石在士官學校求學的時候，就與同盟會的同志相接近。由革命先賢陳其美張繼等的介

紹，得認識 孫中山先生。一九一〇年（二十三歲時）就加入了同盟會。從此以後，他的思想，更爲堅固，對推倒滿清政府的暴虐的專制政體來解放中國民衆，已下了很大的決心。

在這樣空氣之下，自一九一一年初起，中國各地到處都有部分的反抗滿人的兵變。滿清政府這時知道對於傾向共和的趨勢，難以抵抗，於是自動的下詔宣布立憲，同時又與南方派商議妥協。但結局不能爲南方派承認，各地仍然有暴動發生。到十月時候，暴動已達到最高峯。十月十日，黎元洪的部隊，舉兵佔領武昌城，於是成立中華民國。所以中國每年以十月十日爲國慶紀念日，所謂雙十節就是由於上述的原因。

武昌陷落之後，各地也發生獨立運動，宣布獨立，隨後又逐漸的互相取得聯絡，於是新中國的共和國家，就從此開始了。

中國對佔領武昌稱爲「武昌革命」，又稱爲「辛亥革命」。若是照歐美的說法，可稱爲「一九一一年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這次革命戰爭的結果，過去三百年滿清專制政體完全崩壞，自從翌年

一九二二年二月宣統發出退位宣言後，就正式壽終了。

佔領武昌城的是黎元洪的部隊，黎元洪爲留學法國的新人物。當時替滿清政府守衛武昌的是張彪，他部下一萬六千人中，受過新知識的兵士，據他自己說至少有三成，但實際上有六七成以上。這類兵士，都對革命軍表同情，所以一經發動，武昌就毫無困難的落到革命軍的手裏。

佔領武昌的消息，刺戟了各地的革命軍，於是各地都與清軍發生或大或小的戰爭，不久南京被革命軍佔領。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以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及黎元洪爲副總統，黃興爲大元帥的非常時期的軍政府。

(二) 從日本急速返國

宣統退位之後，滿清政府雖然已經滅亡，但北京政府的實力，仍然未能根絕，那裏還有一代梟雄的袁世凱。他在北京竟假稱共和，組織新政府，於是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兩個政權，都各自稱爲中央政府。外國勢力也乘機加入，於是釀成一種極複雜的狀態。

蔣介石氏在日本聽到第一次革命發動的消息後，就離開了所入的新潟縣的聯隊，急速的回到上海，參加他同鄉前輩陳其美氏的革命軍，擔任第五團長和教練官的職務。

他所訓練的勇猛的部隊，佔領了許多浙江省的重要縣市，並且驅逐了盤踞上海的大部份北方勢力，又擔任進攻南京的一翼。北京政府因為已經失掉民心，担任守衛南方各地的都督們都不堪革命軍的一擊，革命軍的氣勢，於是盛極一時。

但是大運不袒護革命軍，不久就發生了重大的悲劇，這就是第二次革命的前因。當時想把北京政府的軍權政權永久獨攬的袁世凱，認為南京政府是他的障礙，不得不想法排除。因此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三月，派遣密使到上海，暗殺了南方重要國民黨員宋教仁。宋教仁是孫中山先生的同輩，為極有力量的政治家。他原來預備到北京說服袁世凱的，但在上海車站，竟被用手槍刺死。

暗殺事件的發生，使南京派非常的憤慨，立刻組織了討袁軍，六月就任命李烈鈞為江西討袁總司令，黃興為南京討袁總司令，開始出兵，這就是第二次革命。

但是結果歸於失敗，七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的段芝貴軍打敗了上海及江西等處革命軍，張勳軍又攻入了南京，於是革命軍勢力大衰。

蔣介石和他的長官陳其美氏所統率的上海部隊，聲勢也爲之銳減，蔣氏一時不得不潛伏起來。

第二次革命何以失敗了呢？史家舉出如此的原因：

- 一、第一次革命以來，軍隊元氣還未恢復。
- 二、民衆厭惡戰亂，輿論希望和乎，不對革命軍援助。
- 三、最重大的原因，是袁世凱利用外國勢力，得到巨額的借款，軍需充足。反之，革命軍則極缺乏軍資。

(三) 放浪生活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的勢力，彼此常有消長，一起一伏的繼續了十年。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氏和其他許多同志，都意氣消沉，似乎已經失掉將來的希望。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先生招他到廣東去後，因為與陳炯明意見不合，不能在廣東久居，失意之中，又回到上海。於是有一年多的光陰，過着不拘小節的生活。

他由陳其美氏處供給生活費，常常出入娛樂場所，雖然身為政練官，但是每月很難出席一次，所以訓練兵卒等事，完全不可能。陳氏自然非常憤慨，一再的勸告，也終無效果。

後來他辭去職務，徹底做一個放浪的人，並且有許多的遊友，終日的聚飲招宴，流連於燈紅酒綠之中。那時他正在二十六七歲，也正是思想變化得最甚的時期。

本來照理因為革命失敗，應當更加奮鬥，何以他反消極的走入了「夜間世界」裏去了呢？這完全是因為他的性格非常剛強，既不易容納他人的意見，同時自己的意見，也不容易為他人容納，所以感覺着懊惱。尤其是在廣東和陳炯明的衝突，使他的心境更為憂鬱。

（四）買賣證券致富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蔣氏潛居上海，毫無所事。一般同鄉人，都認他是應當有作爲的人，勸他找點職業，可是他一點也不動心。但是最後有一個使他發生了興趣的，就是投機的證券交易。當時有同鄉趙某，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相當發了一點財，看見蔣氏非常失意，勸他去幫忙做生意。蔣氏認爲這是致富的機會，對前途發展不爲無宜，於是就答應了他。所以從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民國八—九年）止，蔣氏就處身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中。

他在爲人幫忙的當中，對於投機的奧妙，了解得非常透徹。於是自己也開始做起買賣。因爲他是軍人出身，對於國內的軍情政情知道很詳細，更知道這對於證券會發生如何的影響。於是他把軍事上的戰術用在證券上面，今日有點損失，明日必須加倍的取還。就在重重疊疊的證券起落的波浪當中，經過了一年之久，結局賺了一百萬元的巨款。後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氏，固然是一位常勝將軍，但是我們還要知道他在投機事業上，也是一位常勝將軍。

在證券交易所賺的錢，一部份是給了失意的朋友作爲生活費，或者是幫助了他人，但是大部分

却投奔在一個「遠大的事業」上，換言之，就是用在國民革命事業上，來創造新中國。

凡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得到不可預料的好或壞的機會。一時被同志認為潦倒的蔣氏，竟在投機事業上成功，作了他將來出世的開端。他僅僅在閒散的一二年中，竟有出乎同志們意料之外的事業，並把他大部的收入，用在改革國家的事業上面。因此國民革命得以急速的進展，這也是他得做今日中華民國最高領袖的一種原因。

(五)向孫中山先生貢獻軍資

當蔣氏在上海賣買證券的兩年，中國內部發生很大的變化。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袁世凱竟自稱洪憲皇帝，一九一六年五月，陳其美司令，又被袁氏派人暗殺。同時在全國輿論沸騰之中，袁世凱也就在六月因病身死。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成立了過激政府。九月廣東組織國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相對立，而北京政府方面下了對孫中山先生的通緝令。

袁世凱的僭稱皇帝，南方一派，非常驚動。於是各地紛紛起來討袁。這時南方軍隊的士氣，非

常旺盛。但是軍需軍械，却遠不及北京政府。雖然如此，廣東政府，仍然是積極的樹立北伐計劃和搜集人才。

對袁世凱的僭稱帝制，蔣氏當然也是非常的憤慨。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就任廣東政府大總統的時候，便以電報招他前去。於是他認爲時機已至，就拋棄了二年來的放浪生活，來到廣東。

當時孫中山先生非常感覺人才缺乏，對於蔣氏的爲人，早就有認識。所以對他回到廣東，非常的高興，但是還不知道，他帶來了很大的款項。當他們會面談完北伐計劃之後，於是蔣氏就提出一百萬元的鉅款，願意貢獻給國家，總理當然非常的驚訝，極爲高興。當時兵站部正在無法可設的當中，得到如此大宗款項，如死灰復燃，死人復活的一樣，立刻購置許多的軍用品，和發出給養。從此以後，向來萎縮不振的廣東政府，又呈現出朝氣了。

蔣氏担任侍衛孫中山先生的職務，同時兼任諮議、祕書、交際三種事務。他和孫中山先生在留日時代，已經是非常親近。但是那時還未能够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爲人，及至現在才得到徹底認識孫

中山先生的機會。

孫中山先生是度量寬大的人物，又是能够包涵一切的政治家。蔣氏則是精明果斷的人物，以蔣氏的眼力，可以看清任何的人物。於是他就藉此機會，觀察孫中山先生的長處，來補救自己的短處，他後來所以對人說「除孫中山先生之外，全中國實難有第二個能爲我崇拜的人」，就是起因於當時對孫中山先生的信仰。

蔣氏既然有強銳觀察人的眼光，所以對於當時在孫中山先生下面，担任重要職務的陳炯明懷着野心，將來一定要爲革命叛逆的形像，早就看破。他曾經向孫中山先生祕密的這樣報告過，但是孫中山先生漠不關心，認爲不致如此。因爲孫中山先生爲人寬大，認爲以自己的人格定可以感化惡人，而可以消滅他的惡念頭。

但是結果仍然相反，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就領着葉舉，洪兆麟等叛變起來，占據廣東，組織叛逆政府，孫中山先生幸用蔣氏的奇智，逃到軍艦上去。這次的事變，使孫中山先生

非常痛心，後悔自己待人過於大公無私，但是同時對於蔣氏也更加進一步的認識了。

第六章 陳炯明的叛變

(一) 叛變的開端

叛變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的目的，在殺害孫中山先生，推倒民主的廣東國民政府，來自己成立一個政權。於是命他部下的葉舉、洪兆麟，用砲火攻擊孫中山先生所住的大總統府。孫中山先生幸用蔣氏的智謀，得脫於難。後來十二月十六日陳炯明的部隊，因受反攻，完全的被消滅了。

這次的鬥爭。是孫中山先生、蔣氏與陳炯明的一場惡戰。而同時也是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與舊軍閥的爭鬥，更是造成蔣氏日後這種地位的一個動因。這話怎講呢？因為擊滅了陳炯明，然後才能進行北伐，由於北伐的成功，蔣氏的名望，才震動了世界。所以六·一六事變，在孫中山先生和蔣

氏都是永不可忘的一件重大事件。

當時北京政府自袁世凱死後，便由馮國璋曹琨等做大總統，但是這些人都不過是時代遺留下來的北方軍閥的頭目。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七月，大總統黎元洪，因南北議和失敗而下野。他本不是積極的民主主義者，不過是一個溫厚的和平主義者。他的後任爲馮國璋，除自私自利之外，對於如何統治中國的方針，可謂絲毫沒有。他勾接外國貸借巨款，來飽充私囊。南方國民黨中的孫中山先生等，對這樣情形，自然難以默認，於是九月在廣東設了臨時軍政府，進行北伐計劃。同時北京政府也下了對孫中山先生的通緝令，這樣南北便完全成爲勢不兩立。

孫中山先生被推爲臨時軍政府的大總統後，乃下令攻擊廣西，隨即佔領，更想乘勢北伐。當時把這些計劃都告訴了陳炯明，預備在廣西設立大本營，攻取江西湖南湖北江蘇等地。此時命令陳炯明留守廣東，輸送兵糧，這是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的十一月。

但是心存異志的陳炯明，對於北伐軍的兵糧軍需全不接濟，因此糧道被斷絕的大本營的苦痛，可想而知。這時孫中山先生也只得放棄當初計劃，回到廣東，想再從其他方面進攻。但是陳炯明看見孫中山先生返粵，以爲這是對付自己，於是發生恐怖，在十一年四月，提出辭呈，跑到惠州，與北方軍閥吳佩孚互相勾結，預備等待機會來殺害孫中山先生。

胸懷寬大的孫中山先生，還於五月二日下令特任陳炯明辦理兩廣軍務，這原來是想解除陳炯明的猜疑。但是他仍然恐怖，不肯就職，在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就起了叛變。

從清晨三點鐘，就有大砲機關槍步槍向總統府亂射，可是出乎陳炯明意想之外，蔣氏等早已護衛着孫中山先生脫離總統府了。

(二) 蔣氏的智謀 (孫中山先生脫險之真相)

我們要澈底明瞭蔣氏的才能，對於當時蔣介石氏所用的智謀，實有應當知道的價值。他在事變發生的三點鐘以前，就已經接到陳炯明開始砲擊的情報。於是孫中山先生立刻就化裝爲老農夫，帶

着數人脫離總統府，上了永豐軍艦，這就是現在的「中山艦」。

從路上的前方，如果來了敵人隊伍，孫中山先生就裝作老人，如果與敵人部隊同路前進，他就又換穿軍服，和兵士隨談隨走。因爲是在早晨的三點鐘，所以分不出彼此來，況且又加以化裝的巧妙，所以孫中山先生竟做了戲劇中的主角。那戲裏的導演者就是蔣介石氏。

脫離危險的孫中山先生，就上了永豐艦，即刻下令五六隻軍艦，從海上砲擊陳炯明部下的葉舉洪兆麟的部隊。

叛軍燒了總統府，殺了衛兵數十人，把孫中山先生的著書及藏書都燒掉，以致三民主義原稿喪失，這在目下三民主義的序文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同時，叛軍又搜索商民的宅屋，搶掠姦淫，使全市受了極大的損害。

雖然軍艦用砲火攻擊叛軍，但是沒有很大的效果。如此相持了五十餘日，在此期間，蔣氏日夜在孫中山先生的身旁保護，和指揮作戰。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蔣氏總不使孫中山先生擔憂，只報

告一些好的消息，而把壞的消息全都隱瞞，使孫中山先生心境舒適。當時孫中山先生已有五十六歲，不但思想成熟，而且革命經驗豐富，可說是一個全人。當時和孫中山先生在艦上共起居苦樂，也是蔣氏一生所不能忘懷的事跡。

如此互相對峙有五十餘日，叛軍雖以水雷攻擊軍艦，但幸未爆發。當時停泊中的英、美軍艦，曾經提出嚴重抗議，所以後來便未再放水雷。當時孫中山先生處境非常危險，遂乘英國軍艦到了香港，又換乘俄羅斯皇后號，於八月十三日安抵上海。

孫中山先生到上海後，立刻發表「第二次護法宣言」及「告同志書」，陳述此間經過。這兩篇文章都充滿着悲憤與革命熱情，爲有名的文章。

當時孫中山先生已漸入老境，奔走革命已四十年，心身的疲勞，都超乎想像之外，又加以陳炯明的刺激，更爲苦痛，所以不久就發生了肝病。

民國十三年冬，陳炯明又發動叛軍擾亂廣東，孫中山先生因憤慨太甚，致舊病復發，一九二四

年（十三年）十一月，張作霖及馮玉祥召開南北和平會議，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病狀更爲加重，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十四年），遂遺棄了未完成的革命事業，病歿在北京，中華民國偉大的創造者便從此離開人世。孫中山先生的遺言，就是後來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常向民衆呼喚的口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啊！

（三）討伐陳炯明

陳炯明的反叛野心，始終未改。雖然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看見左右形勢不佳，一時下野。但到十三年冬，見孫中山先生北上，廣東空虛，於是又發動叛亂，佔據東江的險要，與貴州軍閥楊希閔，廣東軍閥劉震寰連絡起來，進攻廣東政府。

當時蔣介石氏正擔任廣東的防禦，因此竟會有蔣氏業已戰死的謠傳，到了北京的孫中山耳中。富於情感的孫中山先生聽到以後，歎息的說：「甯可失了十萬的軍隊，不可無介石一人」。

討伐陳炯明所動員的蔣氏的部隊，都是廣東黃浦軍官學校的學生，爲極有組織極有訓練的精

銳。當然，陳炯明的軍隊是不堪一擊。民國十四年一月（一九二五年），蔣氏領着革命軍去討伐陳炯明時候，正是孫中山先生病危的時候。因此大家意氣消沉，所以也未收到十分成績。隨後又接到孫中山先生逝世的確息，而且七月中同志廖仲愷先生又被暗殺，於是軍心更爲不振。

但是到了十月，蔣氏對於兵士們發表一篇悲壯的演說，來鼓舞他們。三千精銳的學生，於是又忽然恢復了元氣，許久未能攻克的陳炯明的惠州城，竟被一鼓作氣，數日之中就攻下了。當時蔣氏的演說，非常悲壯動人，由此可知他是如何的一位戰略家。那篇演說的大意說：

「總理（指孫中山先生）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偉大的人，現在總理患的是肝病。肝病的原因就是憂慮，總理因爲痛恨陳炯明的非人道行爲和倒戈才得了肝病。若是能除去憂慮的原因，肝病就一定可以治好。所以如果我們希望總理的病好，第一必須打倒陳炯明，然後總理的病自然也可以回復」。

蔣氏確是一位熱血男子，又頗能演說。每回參加民衆的中間，決不顧自己的危險。這樣的大胆

和坦白，實在有他偉大的魄力。他在大眾前面，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因為他真正的崇敬孫中山先生，所以纔表現出這種演說。由此發生出來的熱烈的戰鬥精神，三千的青年壯軍，結果掃蕩了數萬叛軍，攻克了惠州城。據說用兵如此神速，乃是從唐朝以來空前的紀錄。

這樣革命軍建立第一次的奇功，肅清了內部，使廣東得完全統一，奠定了中國革命的基礎。

第七章 北伐進軍

(一) 譚延闓之北伐前哨戰

世界大戰中的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一方面在俄國成立蘇維埃政府，同時在中國，以孫中山先生為中心的非常軍政府也於八月三十一日在廣州成立，當時孫中山先生被推為大元帥。在那時候，一方面因為中國國內，有張勳的復辟運動，及馮國璋的蔑視約法，非法的解散國會，以致國內陷於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又因為受到歐洲大戰以來的民族自決主義的刺激，所以當時纔產生這樣

非常軍政府。

到了第二年的一九一八年，南方的廣東政府軍隊與北方的曹琨政府軍隊，會戰於長沙。在這個時期，北方的徐世昌與南方的岑春煊等，對於連年內戰，陷國家於水深火熱，都覺得不忍於心，所以出來調停孫中山先生與馮國璋的衝突。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正式開「南北和平會議」。結果孫中山先生暫時停止對於北方政府的攻擊，並於同年八月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但是這次南北和議墨漬未乾，而第二年即（一九二〇年）直皖戰爭又爆發了。

在直皖戰爭以後，曹琨因為迷戀大總統的美夢，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以每人五千元至一萬元收買國會議員，作為選舉總統的代價。這在中國歷史上，稱為曹琨賄選，已成永久不可磨滅的污點了。

曹琨的賄選，不僅招致了南方派的憤激，即北方的段祺瑞與滿洲的張作霖派也同致憤慨。當時吳佩孚因在北方擁有重兵，佔着絕對的優勢，所以他在名義上雖舉曹琨為大總統，但是實際上已掌握北京政府的實權。

在這種狀態之下，南方的志士到底不能再默視下去，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即在廣東組織國民政府，於是國民黨重振旗鼓，又大大的活動起來了。

那時蟠據在東三省的張作霖共同的出兵，從此孫中山先生與段祺瑞及張作霖三巨頭，結成三角聯盟，以對抗直系。中國在這兩三年中間，直皖戰爭，直奉戰爭，以及北伐戰爭，連綿不斷，不啻入於混戰狀態。當時的戰爭，皆以吳佩孚爲衆矢之的，由此看來，吳氏爲北方軍閥的巨頭，其勢力若何之大，自可不難想像而知了。

此項北伐事業，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以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八日用「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孫文」名義發表的「北伐宣言」爲開端。在第一次的北伐時候，譚延闓是當時的總司令。

（二）第一次北伐宣言

現在將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的一部份，介紹於次。我們讀了這項宣言，對於中華民國內部發

生的種種病根，及北伐的使命，中華民國建國的理想，以及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都可以從這裏面看出。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打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舉舉大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及曹琨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爲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爲革命份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

局，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琨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琨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

革命政府已下令出師北嚮，與天下共討曹琨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銷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

(三)軍閥的混戰

第一次的北伐軍，因準備不足以及內外種種原因，一直遷延到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譚延闓纔就「北伐討賊軍湖南總司令」之職，進兵湖南，開始對於湖南軍閥趙恆惕實行討伐。趙氏自難抵抗北伐的大勢，其部下葉開鑫乃首先反正，在護憲的名義之下，參加討逆軍的陣營，於是趙氏失敗逃至漢口。這是國民革命軍初次出馬的成功。

然而不久這一次北伐軍便遭阻礙，因爲企圖背叛孫中山先生的陳炯明軍隊，忽然從惠州襲擊湖南，因此譚延闓爲了要先除去腹心之患，不得不再率領三四萬的大軍回至廣東，改編爲五個軍，向東江進攻，陳炯明狼狽敗走，因此國民政府根據地的廣東，一時乃得暫保小康，但北伐大業終歸頓

挫了。

民國十四年九月，段祺瑞內閣的北京政府，爲了剝奪舊直系的吳景濂張志潭的職位，致吳佩孚恨之刺骨，常思復仇之日。這時候奉天的張作霖也與張宗昌，吳光新，楊宇霆等協力進兵中原，企圖奪取中華民國元首的地位。

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失敗後的吳佩孚突然出現於漢口，自稱「討賊總司令」，以「恢復法統，擁護憲法」爲口號，向人民號召。段祺瑞的政權於是發生動搖之象。那時段氏的心腹有鄭士琦，王揖唐，楊以德，盧永祥等，當時他們希望能得到國民軍一派的援助。國民軍乃是馮玉祥，鹿鐘麟，等的軍隊。又在這個時候，以上海爲中心之蘇，浙，閩，皖，鄂五省的聯合軍也在整頓軍備，想奪取北京政權。這五省聯軍的首領是孫傳芳，周蔭人，馬聯甲，方本仁等。此等軍閥，各爲了個人的私利，日夜在那裏爭鬥。

這些軍閥，大概計算起來，不下五十餘人。蔣介石氏所以要北伐的理由，從上述情形看來，也

可以知道當時的那種必要了。

上列二十名左右的人物，其中除極少數之外，現在幾乎已完全被人遺忘。這乃是軍閥所走的必然的末路啊！中華民國建國二十餘年來猶未統一，到民國二十五年，纔漸漸有了統一的頭緒。因為各地軍閥的强大勢力，現在已經萎縮了。

所謂軍閥的特質，在對於人民不施善政，橫征暴斂，掠奪民家，侵犯婦女，毫無顧忌。不消說，他們是決沒有對於時代的認識，所以也無暇顧及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而祇是充滿着自私自利的貪慾，他們如果取得外國承認的政府的負責任的地位，便利用對外借款，飽充私囊，及養私人軍隊。至於這種借款將如何損害中國的經濟權益，在他們是不會顧及的。

反之，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的國民黨黨員，以近代國家的意識，認為積年國家紊亂的根本原因，實由於軍閥與外國勢力的作祟。因此，國民黨革命的目標，便先放在掃除軍閥上面。

蔣介石氏以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以軍官學校畢業學生為中心的在南方訓練出來的革命

軍，開始北伐。

(四) 黃埔軍官學校

黃埔軍官學校是廣東政府最初建立的陸軍軍官學校。這一個學校位置在廣州市的黃埔，頭一任的校長就是蔣介石氏。

這個學校學生的勇敢，戰術的優秀，以及愛國精神的熱烈，爲過去中國軍事教育史上所未曾有過的。最初該校以六個月爲修業時期，其後修業年限改爲一年，最後延長到二年，在第一次北伐時候，已畢業出三千的精銳，樹下了天下無敵的偉大功績。

這一個學校創辦時候，與俄國革命有密切的關係。黃埔軍校創立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在這七八年前，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多數黨建設了一個革命政府。

俄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中國——尤其是南方政府與國民黨員深受刺激。孫中山先生此時對於蘇俄革命的成功，及自己革命事業之蹉跎與失敗，深加思慮，結果認爲必須要有組織的軍隊與

有組織的黨，以及堅決的革命精神，然後革命纔可以成功。

同時在俄國方面，蘇維埃政府自革命成功後，國內的產業，軍備及其他部門，均有進展，並且此時也多少有些精神上的餘裕，來派遣代表到外國。一九二二年前後，俄國代表加倫來到廣東，與孫中山先生不斷往來。不久又遣送鮑羅廷來到廣東。加倫在軍事方面，鮑羅廷在政治方面，以蘇俄革命成功的經驗，向孫中山先生祕密獻策。

孫中山先生爲一掃中國積年的紊亂起見，覺得先有改革黨的組織及改造軍隊的必要。所以在民國十三年一月實行改組中國國民黨。所謂「容共政策」也就在這一時期確定的。

中國國民黨容納共產黨黨員，原來是以中國共產黨容認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爲條件的。從此以後，開始修正黨的綱領，統一黨的組織，嚴格的勵行黨訓。

但是在國民黨中，保守主義者仍然有相當的勢力。他們竭力反對「容共」及「聯俄」政策。但孫中山先生不顧此項反對，決心採取他的新政策。這樣結果，自後國民黨有左翼，右翼之別，十數

年來，內部左右翼的鬭爭，綿延不絕。

在這以前，民國十二年春，擊退陳炯明軍回到廣東的孫中山先生，聽從加倫的建議，決意要在廣東設立軍官學校，派遣蔣介石氏到莫斯科視察俄國新政府的軍隊教育。蔣氏從俄國歸國後，奉孫中山先生的命令，設立軍官學校。這就是黃埔軍官學校。

這個學校從民國十二年的冬季即已準備一切，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學，由廖仲凱，汪兆銘，胡漢民，及俄人鮑羅廷及加倫將軍任講師，從此革命精神教育大爲發揚。此後南京政府成立，這個學校就遷移到南京，改名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現在仍然保持着「黃埔精神」，年年畢業出不少指導的軍人。

這個學校以造就武裝三民主義者爲目的，如果與日本的士官學校比起來，在目標上祇有忠君愛國與三民主義的區別而已。他們訓練學生，注重養成爲三民主義不惜作任何犧牲的精神教育。

照這種教育，當然要在普通的軍事教育之外，特別規定世界革命史，中國革命史，中國政黨

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政治經濟學等六項科目，來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尤其是以鼓吹反帝國主義運動，排除國內封建勢力爲主要的目的，這乃是一種與普通不同的軍官學校。

學生完全從中學卒業程度的青年裏面選拔出來的，卒業後，按照成績的好壞，任命爲中尉或少尉。

「黃埔」白虎隊的三千畢業生，曾一舉殲滅了陳炯明的數萬大軍，到現在還留爲有名的佳話。而尤爲偉大的北伐事業，也是這股黃埔畢業學生完成的。

北伐軍事告一段落後，中央政府纔名實相符的奠定了南京收府。由陳炯明——軍官學校——北伐——中央政府……等等連續的名辭上看來，我們對於蔣介石氏，大概可以知道他的一個輪廓了。講到蔣氏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忽略掉他與黃埔的關係。又講到黃埔的時候我們也必然的要聯想到蔣氏的。

蔣氏與黃埔軍官學校，實有不可分離的血的結合。

(五) 國民黨的發展

但是在敘述蔣氏的北伐之前，我們對於當時國民黨的發展，不能不加一番的檢討。這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北伐的軍人完全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黨員又同時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他們爲了中華民國的獨立與自由，不惜犧牲生命及任何的一切。

民國十三年一月根據俄人加倫與鮑羅廷的建議，徹底改造了國民黨的組織，變成很鞏固的革命團體。到民國十五年一月，已經成立黨部的地方，有廣東等八個省黨部，綏遠等三個特別區黨部，廣州漢口北京三個特別市黨部，國民革命軍內四個特別黨部，共計有十八個黨部，自此以後，更有飛躍的發展，國民黨黨部的存在，已擴大到二十四省，八市及八軍之內任何地方了。

民國十五年以前，全國各縣及普通市的黨部，不過一百九十七個，自該年一月至九月間即增加了二百五十四個，這時高級黨部與普通黨部合計爲四百零一個。此外，各產業勞動團體以及學校內的黨部合計起來，據民國十五年的統計，全國共有七千五百零四個。

至於舊黨員，有十七萬五千餘，新黨員有三十六萬八千餘，合計在五十四萬四千餘以上。但這還祇是民國十五年的數字，到了十年後的今日，國民黨已擁有黨員三百萬人之多。照這樣龐大的團體，如在同一的主義之下，進行任何事業時，那裏有不能成功的事情呢？

(五) 蔣介石的北伐進軍

——蔣氏第一次北伐——

中國國民黨在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下列強硬的決議：

(一) 對外打倒帝國主義。

(二) 對內打倒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土豪劣紳。

其手段爲：

(一) 組織人民的軍隊，

(二) 造成廉潔的政府，

(三) 保護國內新興工業，

(四) 保障農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以上係遵照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同時是中國國民黨的基本政策。從上述政策裏分析起來，在民主主義裏面，不免含有若干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也就是進步的民主主義政策。

蔣介石氏根據上列大會的決議，負着掃滅軍閥的使命，於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那天，北伐軍便在廣州市民的歡呼中，開始北進了。

蔣氏指揮的第四軍獨立團葉挺的部隊，第一戰即擊破孫傳芳的唐福山部隊，接着在七月十三日，唐生智的部隊又占領長沙，二十六日蔣氏本人由廣州市出發入湖南，八月十二日抵長沙。

在他出發那天，蔣氏向國民黨部，及各團體，報館等發出就職通電。又在對內對外發表的宣言之外，對於部下將士發表一篇「誓師辭」。

這篇誓師辭，很使一般青年兵士感激流涕，茲錄原文如下：

嗟我將士 爾肅爾聽 國民痛苦 火熱水深 土匪軍閥 爲虎作倀 帝國主義 以梟以張 本
軍與師 救國救民 總理遺命 炳若日星 弔民伐罪 殲獸凶酋 復我不平等 還我自由 嗟我
將士 爲民前鋒 有進無退 爲國效忠 實行主義 犧牲個人 丹心碧血 革命精神 嗟我將
士 一德一心 毋忘恥辱 毋憚艱辛 毋惜爾死 毋偷爾生 壯烈之死 榮于偷生 嗟我將士
保此國家 嗟我將士 保此人民 遵守紀律 服從命令 惟紀與律 可以致勝 生命爲私 紀
律爲公 生命爲輕 命令爲重 嗟我將士 團結精神 澈始澈終 相愛相親 毋懼強敵 毋輕
小醜 萬衆一心 風雨同舟 我不殺賊 賊豈肯休 勢不兩立 義無夷猶 我不犧牲 國將沉
淪 我不流血 民無安甯 國既沉淪 家孰與存 民不安甯 我孰與生 嗟我將士 矢爾忠誠
三民主義 革命之魂 嗟我將士 共賦同仇 革命不成 將士之羞 嗟我將士 如兄如弟 生
則俱生 死則俱死 存亡絕續 決於今茲 不率從者 軍法無私

北伐軍全軍一心，所向無敵，民國十五年八月，先占領湖南而入湖北。當時的國民革命軍共計

擁有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潛，李宗仁及唐生智等八軍。以後又加入張發奎陳銘樞軍隊。統歸蔣氏一人指揮。

八月十五日召開軍事會議，下總攻擊令，同月中旬，已占領湖南各要地，肅清舊軍閥趙恆惕的軍隊。以後到八月二十七日，蔣氏爲上前線督戰起見，親自到湖北省漢口，與北方軍閥巨頭吳佩孚舉行在歷史上留名的一場大戰爭。

革命軍因爲有主義爲號召，很容易得到民衆的支持，所以吳佩孚的軍隊，雖素稱勇敢，但在精神上已爲革命軍的氣勢所吞，結局不免陷於失敗的境地。

當時從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四日之間，晝夜發生激戰，北方吳佩孚的部隊終被擊退，於是一世英雄之吳佩孚氏，受此巨大打擊，已無再起的能力了。

而且在那時候，一般的民衆固不消說，就是中外的戰術家，也沒有料到吳佩孚失敗得乾脆到這種地步。因爲當時吳佩孚軍隊在兵力上較蔣介石氏的軍隊遠占優勢。由此看來，蔣介石氏統率的軍

命軍將士，爲了新中國，如何作壯烈的戰鬪，也可以想見了。

這以後的經過又如何呢？現在大略的記其重要的戰績如次：

一、中路方面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蔣介石軍隊攻取兩漢（漢口漢陽），吳佩孚遁走。

△九月二十日，革命軍約三萬集中南昌方面，着手準備向南昌，九江進攻。

△十一月七日，完全占領南昌，大敗孫傳芳軍隊於九江，同時即奪取該地。

△十月十日，武昌城陷落，吳佩孚殘黨劉玉春失敗。（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城陷落，與

中華民國的成立同爲一天，實有不可思議的因緣）。

二、東路方面

△十月十日，在福建方面原爲與孫傳芳連同一氣的軍閥周蔭人的根據地，是日被北伐軍的何應

欽部隊攻陷永定，大埔，平和，饒平等地方。

△十二月十八日，福建全省落於革命軍之手，何應欽入福州，組織省政府。

三、江浙方面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白崇禧部隊，由福建方面長驅直入浙江省境，佔領桐廬地方。

△同年二月中，浙江省被攻其危，二十二日何應欽進抵杭州，孫傳芳的殘軍退往江北。

△三月二十二日，白崇禧的革命軍占領上海，彼時在上海方面有孫傳芳的殘部，張作霖的奉軍，以及張宗昌的魯軍，共同抵抗南方的國民革命軍。但因各自懷抱野心與私慾，互相利害衝突，故對於革命軍頗為有利。其間還有革命軍的便衣隊的活躍，勞工的罷工等。海軍也服從國民政府，高舉起青天白日旗。

△三月二十三日，何應欽軍隊進攻鎮江，為進攻南京的先聲。占領常州無錫，革命軍的特派員收買南京城的警官，令其開城。

△同月二十四日，魯滌平，程潛，何應欽，賀耀祖等的革命軍入南京城。彼時革命軍的一隊有

軌外行動，襲擊外國領事館，外國人住宅，以致發生國際問題。是即所謂「南京事件」。

△在此之前，於一九二六年，北方國民軍的首領馮玉祥視察蘇俄回國，率其部下鹿鍾麟劉驥李鳴鐘等全軍加入國民黨，至五月二十七日又正式加入國民黨，馮氏被任爲「國民聯合軍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馮軍占領陝西省城西安，十二月十五日入潼關進出於河南省境，伸其勢力於陸海路沿線，驅逐吳佩孚軍隊，從此北方的軍事對於國民革命軍益爲有利之展開。

第八章 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

(一) 武漢、南京兩派的對立

共產主義之於蔣介石氏，是最難對付的一樁事情。蔣氏爲了這樁事情，不知道受了多少痛苦。最近張學良的兵變也是其中之一。

上文已經講過，孫中山先生很早就和蘇俄聯合，以蘇俄做榜樣來實行種種的改革。但是孫中山先生的用意，祇在藉蘇俄的援助，以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為唯一目的，至於說要造成像蘇俄那樣的共產主義國家，他根本沒有這麼想過。所以孫中山先生雖有左傾的事實，但始終沒有走出三民主義的範圍一步。他部下的國民黨也是守着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主張，始終奉行三民主義。

不消說，蘇俄是要把中國製造成一個十足的共產主義國家。這種結果，在國民黨內形成一大左傾派，但是在孫中山先生的抑制之下，決不容許極端的左傾。就是這樣，在國民黨員之中，還有很多有力的份子，對於孫中山先生本身的左傾，因為不滿而脫離了他的麾下。

以後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客故於北京，於是失去首領的國民黨，果然分成左右兩派，互相鬥爭。這時，鮑羅廷、羅伊等共產國際的派遣員與國民黨內的左派結合起來，極為活躍，不久壓制着庸懦的右派，廣東政府一時幾乎完全被這些左派佔着。

然而左派爲什麼能夠得到這樣勝利呢？關於其中原委，我們不能不從國民黨的黨綱中去推究。

一九二四年制定的國民黨的綱領，曾參酌鮑羅廷的意見。所以內容甚爲左傾。起草的人幾乎完全是共產黨員與極左派的國民黨員，所以起草出來的綱領，與共產黨的綱領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不消說，孫中山先生當然不是共產黨員，同時，國民黨也當然不就是共產黨。不過因爲黨內的共產黨員，想利用國民黨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把一切都拿來作合乎共產主義的解釋。這不能不說是使左派勢力增大的原因。

蔣介石氏對於國民黨這種左傾的傾向，根本就不甚滿意。

蔣介石氏以往被孫中山先生派到蘇俄，視察該國的軍事和經濟，歸來後也曾勸過孫中山先生接近蘇俄的。蔣氏被任爲第一任的黃埔軍官學校的校長，也因爲有蘇俄援助的緣故。在當時軍官學校的教育大綱裏，也竭力鼓吹蘇俄一流的革命思想。因爲有這種關係，蔣氏雖然心中對於共產主義有不滿，但很難於下手肅清。況且蔣氏懷着熱烈的北伐的希望，在這一點上又必須有蘇俄的援助。在當時，自然蔣氏不得不與中國共產黨繼續保持着聯繫。

蔣氏的厲害地方，在於擁有強大的兵力。如果蔣氏右傾，左派就將失勢。所以左派的有力領袖與共產派結納，商定排擊右派的計劃。他們於民國十五年三月打算引誘蔣氏至中山艦上，企圖在艦上加以暗殺。但是，機警的蔣氏，因為預先知道這個消息，而得無事。這就是所謂「中山艦事件」。

如上所述，國民黨的左派與共產派，其初想把蔣介石氏除外，完全握取政權。到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中旬，國民政府的要人們從廣東至武昌，左派與共產派對奪取政權的計劃，進行益力，同時又奪取漢口的英國租界，發揮剷除帝國主義的手腕。這乃是民國十六年一月五日的事情。

醉心於此項成功的左派與共產派，決心採取排斥蔣氏的策動，先在漢口樹立武漢政府，請出汪兆銘陳友仁等主持，並任命鮑羅廷爲顧問，擬以唐生智統率的軍隊爲背景。該年三月中旬，即在漢口召開第三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取消蔣氏獨裁的權力。因此，受他們壓迫的右傾的穩健份子，紛紛脫離武漢而投到蔣氏的麾下。

蔣介石氏對於武漢派的隱謀及壓迫，極其憤慨，因此，有在最近的將來和他們決裂，等到南京時再成立新政府的意思。

他率頭的北伐軍在二月中旬奪得浙江省的杭州，迫孫傳芳北走，三月二十一日更佔領上海，二十四日即佔領南京。

在佔領南京時候，就引起了所謂「南京事件」。

(一)南京事件

南京的孫傳芳軍隊在和北伐途上的蔣介石氏軍隊戰爭時候，雖有一時的勝利，但受的損害很大。在此以後，再也沒有阻止蔣軍行動的能力了。因此，孫氏向山東的張宗昌求救。張軍南下，仍然敵不過蔣氏軍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先落到蔣軍手裏。再到同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已早到了南京的城外了。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直魯聯軍到底沒有勝算可操，於是開始陸續撤退。南京城內的中國官吏也

倉皇的逃走了，這時城內的情形非常混亂。

當時在南京居住的日本人，爲防備萬一起見，都避難到領事館裏。但他們並不是害怕那素日相信很有紀律的國民革命軍有什麼軌外舉動，實在是因爲恐懼聯合軍敗退後的掠奪行爲。然而事實上却與預期相反，聯合軍在退走的時候尙比較的平穩，因此，他們纔敢放心起來。

蔣氏的國民革命軍進城以後，却有一部份對於歐、美、日本的僑民，竟有不穩當的舉動。旅京僑民不得不再避難到停泊在長江裏的外國兵艦上去，英、美兩國軍艦，砲轟南京，也就在這個時候。

以上祇是南京事件的概要。

在這一事件上，似乎是光輝的國命軍的一點污點，同時在蔣氏看來，也似乎是不可磨滅的遺憾。但是實際上，這次的南京事件，實在是中國共產黨鬧出來的，他們的用意，在藉此與蔣氏爲難，蔣氏因此可說上了共產黨的一個大當。這裏的理由如下：

上文已經說過，國民黨裏的左派與共產黨，對於蔣氏及右派，反感甚深，這比較蔣氏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還要激烈。

尤其是在蔣氏占領南京以後，兩者之間，簡直有不兩立的形勢。一方面是兩方面勢力的爭奪，另一方面也由於蔣氏對蘇俄派來的顧問及共產黨的壓迫。有此兩個原因，武漢政府當時有妨害南京政府的成功的必要。

大概無論何人都很知道江蘇、浙江兩省爲揚子江流域的寶庫，誰占有這兩省，誰就可以號令中國的中部。因此從經濟的立場上看來，武漢方面的地利到底比不上南京。所以蔣氏一派占領南京後，由此發施號令，長江下流的江浙兩省，皆可完全統轄，那麼武漢派就將無可如何了。何況蔣氏又將要壓迫武漢派呢？所以在武漢派的意思，遲早要打倒蔣氏的。

因此，武漢派在武漢固不必說，就在蔣氏肘腋之下，也想聯絡那裏的共產派陰謀打倒蔣介石。他們採取的手段，第一就在利用勞工運動來從內部攪亂。

然而在江蘇方面，與武漢不同，這裏的農民及工人並沒有受過多少鬥爭的訓練。況且在孫傳芳時代，這種攪亂又已有過失敗的歷史。此次蔣氏對於這種不正當的勞動運動，很容易的就把牠制止了。

其實，蔣氏在南昌時代，早已發出下面的這樣通令：

『苟在軍政之下，發起勞動罷工，即以反革命論罪，而加以處罰』。

因此，藉工人運動來從事內部攪亂的計劃，未能成功。從此以後，武漢派爲達到目的，於是又不能不採取第二種的手段了。

那麼武漢派新採取的第二種手段是什麼呢？在他們以爲如果能够使蔣介石氏的軍隊對外釀成事件，這就可以剷除他的地位了。

在實行這一計劃時候，一切的條件都很具備。即在蔣氏的軍隊裏面，有不少與共產黨有相當程度諒解的青年軍官。又在附屬於蔣軍的黨代表及下級士卒裏面，也有不少同情共產主義的人們。所

以到南京以後，便與他們聯絡起來，乘着機會發生暴動，鬧出對外事件，這決不難達到目的。所以南京事件，乃是這一派的陰謀啊！

自然，蔣氏在事先未嘗沒有講求防止這種事件的發生。不過在戰爭時候，人心往往易於越出常軌，因受人煽動而發生過分的舉動，這也是常事。果然，不但是受共產黨煽動的蔣介石氏的軍隊，就是向來對共產黨抱有反感的人們也一時被煽動了。所以這事件，實在是共產黨預定的計劃，在中國戰爭中並不是什麼一件突發的事件。

關於這一點，還可以舉出一個證據。

在那天的暴動時候，士兵在軍官的指揮之下，不但是在行動上很有組織，而且便衣隊也加入在裏面指揮。其次，他們備有汽車，馬車，馬等運搬東西。住在南京的外國人，不管是住在城內城外，僅在三四點鐘的短時間內，竟被完全檢查。由此看來，這是何等計劃的行動，恐怕不是任何雄辯所可掩飾的罷？

對於這次暴動事件，其初據南京政府的公布，係反革命派乘山東軍敗走的混亂時候，煽動了一些無賴之徒所引起的暴動。然而後來因為事情無可掩飾，於是又公然的承認係共產黨煽動的結果。譬如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中日兩國關於南京事件解決的交換公文裏面，中國方面說：「該項事件，據調查結果，證明爲共產黨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前，煽動發生之事實」。蔣氏想要利用蘇俄，却不知反受了這樣大累。

(三) 共產黨的過激行動

武漢的共產派，不僅陰謀主使蔣介石氏的軍隊釀成對外糾紛，企圖使蔣氏失足，即對於一般民衆也有無限的過激行爲。

武漢政府在鮑羅廷的指揮之下，組織農工團體，煽動他們拿暴力來摧殘國民革命。

他們假借農民運動，對於地主及地方上的有力份子，拿土豪劣紳的罪名來加以迫害，又在實行土豪劣紳懲治條例，反革命條例等口實之下，煽動暴徒，恣意行使破壞行爲。

其次更假借工人運動到處發動勞動罷工，實行勞動者的示威行動，貫徹對於勞動條件的要求。這樣的破壞行動實行得最甚的要算湖南省了。在該省，共產黨組織的糾察隊，到處出沒，如果有反抗武漢政府者，不加思索的加以危害。因此對於武漢政府的深刻的怨嗟之聲，不絕於途。

這些共產派嗾使暴徒，往往對於武漢政府的實力派湖南軍人的家族，也加以迫害。因為共產派絲毫沒有覺悟，仍繼續行使無限的暴戾。所以不久懲罰共產派的聲浪，先從湖南軍隊裏面爆發出來了。

結果在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長沙的守備隊長許克祥對農民暴徒與共產派斷行武力彈壓，竭力掃蕩共產派份子。自後在六月二十九日，李品仙部下的軍隊，就在武漢政府範圍內的漢口，彈壓勞動各團體，解除糾察隊的武裝，對於共產派大加彈壓。這等軍隊的舉動，對於武漢政府內部的共產派，可說給予一個致命的打擊。從此以後，共產派即陷於沒落的命運了。

共產派察知身邊的危機已極急迫，農民部長譚平山先就逃走，繼至七月中旬，政治部主任鄧演

達，勞工部長蘇兆徵等也相繼退出政府，結果國民黨內的左派與共產派完全分離，武漢政府僅由國民黨左派獨力支撐。

共產黨因此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攻擊國民黨，責難國民黨不肯勵行三民主義，違反聯俄，容共，農工的三大政策，甘心作軍閥的走狗。武漢的國民黨也於同月的廿七日酬以一矢，對於蘇俄訓令武漢的共產派，破壞國民黨的事實，嚴加指謫，同時訓令黨員對於共產派的這種危險的計劃及行動，要嚴加警戒。又在該日，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在告中國共產黨為標題下，公布與共產黨斷絕關係。國、共兩黨的提攜，從此乃歸完全決裂。

(四)與南京政府合併

共產派的陰謀所造成的南京事件，使蔣介石決心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肅清共產黨，四月十二日先在上海對共產派實行一次大彈壓。結果，上海纔完全成爲蔣氏的勢力範圍，此項肅清共產黨的舉動，頗受上海財界的歡迎，此後蔣氏即得到上海銀行團（以蔣氏的同鄉浙江財閥爲主體）的

後援。

四月十八日，成立南京政府，表示與武漢政府相互對抗的態度。南京政府宣言忠實勵行三民主義，凡違反三民主義者，皆目之爲叛徒，當不惜加以處分。同時又公布彈壓共產黨，勵行清黨運動。

然而南京派與武漢派的反目，愈加深刻，漸漸要釀成流血的鬥爭。尤其在蔣氏出師北伐，親自遠征山東的時候，武漢派竟乘機突起打倒南京政府，威脅江蘇，浙江，江西等處の後防，蔣氏因恐革命勢力的內部分裂，乃率領全軍，急速回到南京。

在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說的，武漢派內部的共產黨亦因被逐，以致勢力消失。向來在背後支持共產黨的唐生智的態度，此時也已一變，對於共產派開始實行彈壓，肅清了武漢政府內部的共產派。

唐生智在掃除共產黨以後，就以清黨與確立黨權爲條件，進行甯漢兩政府的合併運動。

在甯漢合併運動時，武漢派要求以蔣介石氏的下野爲條件。當時在南京政府內部反蔣的空氣也相當濃厚。因此很識時務的蔣氏，認爲甯漢不合併，將來很不容易再掌握全部的勢力，於是在八月

十四日拋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實行下野，赴日本遊歷。

九月三日，南京、武漢兩政府成立合併協定，新南京政府於茲成立。

(五) 蔣氏的下野宣言

武漢南京兩派的妥協運動開始以來，四圍的情勢對於蔣介石氏頗爲不利。那時在蔣氏面前，祇有兩條路綫。一條路綫是斷然起來排斥武漢派的要求，另一條路就是自己下野，以促進兩派的妥協。蔣氏祇能在這兩條路綫中選擇一條。

八月十二日，蔣氏突赴上海，與該地的自己一派中有力者會面，討論將來應採取的態度，結果，蔣氏認爲在此時下野以備將來再起爲得策，到第二天的十三日，便發出一篇下野宣言，十四日隱退回到甯波的家鄉。

茲將該項下野宣言的要旨，摘述如下：

「余自受命黨國，出師北伐，已一年於茲，環顧四週情況，黨國呈分裂之兆，人民窮困，國民

革命之大業，荏苒不見發展。推其原因，實共產黨之陰謀所致。然武漢同志等不察真因，誹謗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黨之利益，故余毫不躊躇，即刻下野。

共產黨與鮑羅廷危害國民黨，妨害國民革命之陰謀行爲，不遑枚舉。故余一向即極力主張驅逐鮑羅廷及與共產黨分離。此次余所主張，已在武漢實行，且此爲國民黨生存上之必需條件，已有明證，不勝欣喜。

聞武漢同志之不克來京，係因余在南京之故。余既爲吾黨不惜生命，更何戀此區區地位。惟值此下野之際，爲完成北伐與建國之大使命起見，謹提下列三項要求，作爲最後之希望。

- 一、武漢同志速來南京。共籌黨國大計。
- 二、分駐湖南湖北江西各地之武裝同志與津浦沿綫軍隊互爲呼應，繼續北伐。
- 三、在兩湖及江西地方，徹底實行肅清共產黨。

上列事項被實現時，共產黨之攪亂，軍閥之跋扈，帝國主義之橫暴，均將絕跡，全國之統一

亦將易於實現』云云。

(六)赴日本遊歷

蔣介石氏下野赴日本時候的情形，據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報知新聞記載如次：

『昭和二年的秋天九月末，以亡命之身付之一葉扁舟而飄然來朝的蔣氏，經雲仙，神戶，於十月十三日，與親友張藝氏（現外交部長）及侍者一人共三人來京，訪問住在澀谷，常盤松的頭山滿家，請他斡旋代找一個清淨的住處。

向無一面之識的頭山翁，那時在一見之下，即推許蔣氏將來必爲偉大人物，他於是在醉心之餘，與隣居之資本家川野長成氏商議，將該家二階三間的居室供給蔣氏等居住。八疊的日本房間爲蔣氏居住，六疊二間則由張氏與從者起居。

雖祇滯留十天的短促時間，但是他所表現出來的大人物的風度，使頭山翁與川野一家的人們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爲不斷到箱根、日光等處旅行，行裝也無暇解開的蔣氏，真正宿

於川野家的時候，也不過三晚。

素日抱着「中國不能不與日本互相提攜」信念的蔣氏，在三晚之間，均招頭山翁與川野共同聚餐。這樣毫無隔阂的中日交歡，充滿了和諧的空氣。

但是在那時候，因為奉天派兵出來，而受到很大壓迫的國民政府內部，認為挽救這種危局除蔣氏之外，可說無人的呼聲，日益增高，於是蔣氏由汪兆銘等的懇請，敦促，纔決心歸國，連戰連勝，瞬息之間，就完成統一大業，頭山翁與川野家的人們，為之驚喜不置。

在川野家蔣氏住過的那間臥室裏，當他歸國時候親筆寫下的那幅「親如一家」的記念軸，至今仍然動搖着好像在回顧十年前的舊事樣子。

頭山翁說：

「蔣氏無論如何是與日本一致的。他對於共產黨，不管其在內抑在外，一定要加以排斥的，當他表示這樣決心時候，我立刻好像和他成爲百年知己了！」

當時蔣氏爲中國的第一人，固然已爲公認，但其態度的優雅，器宇的不凡，使我感覺非常的佩服」。

又據川野家裏人說：

「在吃飯的時候，常招喚頭山翁和主人共餐，家裏人們看見他的禮儀正肅的生活態度，大家不禁說出，偉人的鑿動到底與衆不同。現在想起來，一切都已是十年以前的舊事。這次事件（西安事件）發生時候，我們都特別的爲他担心。衷心祈禱他能够平安無事啊！」

第九章 五年來的戀愛史

（一）與宋美齡女士結婚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午後四時左右，在上海大華飯店的禮堂，有一個盛大的結婚典禮。禮堂中佈置得非常華麗，有千餘來賓，盡是社會上有名的人士。新郎就是領導北伐軍

克服全中國的蔣介石將軍，新娘是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女士的令妹宋美齡女士，證婚人爲蔡元培，余日章，介紹人爲譚延闓何香凝王正廷等。完全依照國民政府規定的結婚儀式，舉行了非常隆重的典禮。

在蔣氏的這一天，實爲實現五年以來夢想的一天。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蔣氏也正是這種情形，他在五年前就和宋女士相認識，由認識而成朋友，由朋友而成相親愛的人，最後達到戀愛的階段，於是宣誓結了婚。

蔣氏此時年已四十歲，夫人年二十五歲。新郎爲千軍萬馬中英勇無敵的常勝將軍，新娘爲美國曼梯何里約克大學的畢業生（譯者按宋女士畢業於威爾斯烈大學），專攻社會思想史的近代女性。所以這一天，全中國都慶祝他二人爲最幸福的一對。

蔣氏在這一天，可以說是得到最後勝利的可紀念的一天，所以特別的高興。因爲他已是再婚，而不是初婚。這在與宋女士交際的時候，她就已經知道，知道他有妻並且有子。

蔣氏和以前的毛夫人，或者性格上有點相差，或者趣味和感覺上有點隔閡，我們固然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彼此曾經竭力想調和，來過和平的家庭生活。但是他們夫妻仍然不能融洽的地方。在大家族制度下的中國，不能像美國那樣容易離婚，習慣上認爲夫妻必須偕老同穴，所以這成爲蔣氏的一大苦惱。

但是一想到社會的環境和自身的將來時候，又決定了要與前夫人離別的根本方針，而想個善後的辦法。自然那時在他心目之中，早就覺得宋美齡女士是一位結婚的對象了。

但是又有第二個難關，就是還不知道對方宋女士的心境如何？當時，在宗教的信仰上宋女士與蔣氏雖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仍能進行戀愛，終於達到了結合的目的，這大概總是由於他們性格上的一致罷？

（二）我們的今日

十二月一日接到蔣氏與宋美齡女士結婚通知的人，或者看見報上消息的人，都立刻想起去年夏

天蔣氏和前夫人離婚的廣告，全是爲這次十二月一日的準備工作。他終於克服了舊社會的習慣，解散了舊家庭，結果造成新家庭。當然他要十二分的歡悅了。

他們一方是中國現代的第一人，另一方是由美國回來的聰明的近代女性。所以中國報紙一致稱讚他們爲「相親相愛的伉儷」。蔣氏的敬愛宋女士，由他所發表的「我們的今日」一文中，可以窺見一般。其中意義大致如次：

「我今天和最敬最愛的宋女士結婚，爲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日可以安心担任革命的大任。家庭就是社會的基礎，想改造中國社會，必須從家庭起，宋女士對我的意見向來同感。我們的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供獻，此後二人願同爲中國革命基礎的建設而努力」。

宋女士爲留美的女性，一般留洋的女性，大多講求奢華，如燙髮等等。他們似乎覺得不如此，就不能爲留學增光。但是宋女士却完全不然，她回到中國以後，既不燙髮也不穿洋裝，完全遵守中

國的習慣，直到現在仍然是如此。

凡是曾經受過蔣氏招晏的人，都可以知道除了正式的宴會之外，皆不備酒，這全是受了宋女士的薰陶，所以她的賢夫人的稱譽，使人都得首肯。

有了她這樣一位賢夫人，所以蔣氏在努力復興中華民國的過程上，始能過着幸福的生活。

(三) 宋美齡夫人

與蔣氏結婚當時，一般人的印象，多以為宋女士是貴族式的夫人。舊式的人們往往認為她是驕傲的女性。但是在近代的人們看來，却認為她是勇敢的先驅者。

實際上，她固然是一位活潑的女性，而且她認為祇在家庭中謹慎的處理家務，並不算是女性唯一的職務。因此，她時常要伴着蔣氏東奔西走。就是閱兵時候，她也要在一起。或者有人以為這是「風頭主義」，但實則不然，她在軍隊中非常受人歡迎。這種原因，完全是由於她時常把家庭托付別人，而自己去到前線慰勞傷兵的報酬。

她不好空談，只喜歡實行，而且在行動上非常勇敢，她的胆量之大，普通的一般男性都趕她不上。她的慈悲心，是受了基督教派的培養；她的勇敢行爲，是受了美國冒險精神的影響。至於使她這些天性發育的，則是她所受的家庭教育。

在她家中，有宋子文（中國有數的財政家），宋慶齡（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藹齡（孔祥熙的夫人）等傑出人物。長期間的美國大學生活，使她成爲一位很摩登的女性，但是這種摩登，並不是形而下的，而是形而上的。她本人的高深教養，使她不致於趨向於浮華，她從聖經裏學到「真實」，知道如何與「惡」爭鬪。因爲如此，所以她能除掉被人稱她爲「過於活潑」或「奢華」等不好的批評，而自己極有自信的前進。外國的首相夫人或者大總統夫人，大都祇知道出入於社交宴會，而好賣弄風姿。但是宋女士則常奔走戰場，救護傷兵，担任炊事等等，她可以完全擔當一個男生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同時也是中國歷代將軍夫人中所從未有現象。

關於她本身，有這樣的一段插話。她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登在美國的某雜誌上，題目叫做「從

「征記」又叫做「前方的丈夫和我」。

這就是在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的兩年間，她向蔣介石氏要求到前方去，得到了許可。於是在戰場上冒了數十次的危險。但是她一點也不畏懼，有時鼓勵丈夫，商量作戰，又有時安慰疲勞的丈夫，及組織救護隊等等，這樣的和丈夫共甘苦，今天住在南昌，而明天又飛到漢口，就在兵馬之間，東奔西走。

在前方的飲食起居的不自由，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她忍耐着所有的痛苦，努力的工作。若是在上海時候，無論坐汽車或看影戲，她要如何盡興，雖都可以辦得到，然而她却要到陣地完全變了一個生活方式。在這種地方，也恐怕是任何女性所不能及的罷？

某一天的深夜，她隨丈夫，在江西的內地，突然被紅軍包圍了。

她在前綫擔任的是丈夫的祕書，重要的文書，都由她整理保管，所以蔣氏這時立刻就叫她收拾重要的文件。

不久，槍聲漸漸的接近，槍彈也飛到營房裏來了。當時連敵人與友軍都分不清楚，可說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境地。於是蔣氏交給她一支手槍，準備射擊侵進來的敵人。同時，如果不幸戰敗，也就預備拿槍自殺了。但是幸而最後紅軍被中央的生力軍擊退，而宿營的不安，纔得解除。

以上是蔣夫人在營中的筆記。這一類的危險，實在不止一次兩次，但是她愈經危險反愈加胆大。她隨着丈夫的軍隊到內地去，現在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她雖然未穿着軍服，但是已經成爲一位十足的勇敢的女軍人了。

這種勇敢精神，完全與蔣氏一致，這自然也是使蔣氏敬愛的一個原因。世界上所謂圓滿的家庭，恐怕要以蔣氏和宋女士爲最圓滿了。蔣氏從夫人學到新的時代觀，而夫人則從蔣氏學到除去浮華，及知道切實的苦幹。兩人的思想，彼此互相糾正，於是成立現在這樣圓滿的家庭。

十年以前的蔣氏和現在的蔣氏，思想上有極大的變化。民國十三年前後的他，和人說話時候，常先從部份的事實說起。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前後，他的演說，都是從大處立足，從基礎說起。

這是他的一個進步。

宋美齡女士最初多以為是出風頭的人，到了現在，中外人士，才知道她是一個很有見識的近代女性。

蔣氏夫妻就在這樣互相勉勵之中，成為美滿的一對，共同致力新中國的建設！

第十章 北伐的完成

(一) 北伐軍的新陣容

蔣氏的北伐軍，所向無敵的，到達了山東省濟南附近，大有一舉佔領的趨勢。但是因為發生對武漢派的爭鬭，蔣氏急忙率軍回到南京，北伐一時只得中止，後來蔣氏隨即下野。

張作霖部下軍隊看見革命軍自動後退，乃乘機尾追，恢復了許多要地，八月奪回了南京對岸的浦口，於是成爲南北兩軍隔江相峙的局面。

山西的閻錫山與奉天的張作霖的關係，本來就已不好，後來又因為反對張氏的就任大元帥而決裂，九月末於是發生戰爭。但是十月十日在望都（京漢線的保定與石家莊之間）的一戰，奉軍得了勝利，山西軍遂被封鎖在省內。

革命軍的形勢漸漸不利，雙方成了持久戰。南京政府在立場上不得不設法先完成北伐，於是從南京，上海各方，都積極要求當時游歷日本的蔣氏回國。

當時革命軍中有力的人物，有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白崇禧，李宗仁，其次有陳銘樞，李濟深，陳濟棠等，不過他們在兵力和地勢上，都不及蔣氏。但是蔣氏已離開了國民黨，已不能為北伐盡力，所以黨和政府的幹部都感覺恐慌，於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黨和政府，幹部的聯合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請蔣氏復職。

認為時機成熟的蔣氏，於十二月由日本回國，決意復職，定了北伐的計劃，以何應欽為前敵總指揮，重新整頓北伐的陣容。

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蔣氏在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再徹底進行北伐，於是北伐軍，一舉奪回浦口，十二月十六日又奪回徐州，恢復了以前的氣勢。

馮玉祥和閻錫山，看見這樣形勢，認爲此時應與蔣氏合作。於是在民國十八年二月中旬，相會於河南開封，約定共同參加北伐陣線，決定了三軍協力的作戰計劃。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原來在民國十五年時候，因與奉軍交戰不利，退避在甘肅內地。後來纔從甘肅向陝西迂回前進，破了奉軍，更佔領河南。

蔣、馮、閻三巨頭會議的結果，國民政府編成如次的集團軍，並任命蔣氏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蔣介石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馮玉祥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

三月蔣氏又將第一集團軍全兵力十五萬分作如下的各部隊，分頭担任攻擊。

一、第一縱隊 總指揮 劉峙

以濟南爲目標，從津浦線正面進攻

二、第二縱隊 總指揮 陳調元

沿海岸線進攻青島

三、第三縱隊 總指揮 賀耀組

以濟南爲目標，從隴海線方面進攻

四、別動隊 總指揮 方振武

馮玉祥以九萬的基本隊伍作爲中心，共集合十五萬兵力於鄭州，從京漢線正面準備攻擊北軍的中路。同時，閻錫山從本省的山岳地帶打破封鎖，開始反攻。在北部從京綏線進攻北京，在東部則預備會合馮軍共同北上。

於是各軍一齊開始攻擊，四月中旬國民革命軍壓迫奉軍攻入山東。四月十六日馮的一支隊，從側面攻入濟甯（濟南西南百英里），於是濟南成爲半圓形的被包圍形勢。

（二）濟南事件

濟甯的占領，制了濟南的死命，濟南的陷落，已祇是時間的問題了。濟南的混亂，在日本方面，認爲有重大的關係。濟南有二千名的日僑，又有許多經濟的利害關係，青島有一萬多的日僑，也有許多經濟權益。膠濟沿線各站，又有許多日僑，所以濟南的形勢如何，自然對於山東日僑的安危，有極大的關係。（以下全係照原文翻譯著者，根據片面的觀察，自然錯誤很多，讀者應加注意。譯者註）

國民革命軍當局屢次聲明担保占領區域的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但是照南京及漢口事件看來，仍然是缺少保障。若是山東也發生這樣事件，日僑的生命財產便很危險，二三十年來經營所得的經濟利益，也要全被推翻，所以比起南京漢口還更要嚴重。

當時的田中內閣，爲要保護日僑起見，決議第二次的山東出兵。四月十九日命令第六師團出動，先發部隊的齋藤旅團，二十六日到了濟南，開始警備。

現在將山東出兵時日本政府發表的聲明，與國民政府提出的抗議，一併記錄於後，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於保障外僑的生命財產，是何等的缺少誠意！

第二次山東出兵日本政府的聲明

「帝國政府對中國的變亂，自然不至援助任何黨派，但對於有多數日僑居住的地方，若有擾亂治安，危害僑民的危險時候，便不得不採取適當之自衛的措置」，在前次山東派遣軍撤退時候，已經有過一次聲明。

現在山東戰況緊急，有影響日僑居住地方的危險，不得已，乃照前次聲明的趣旨，由內地派遣五千部隊，從青島到膠濟沿線，担任保護日僑。現爲應急處置起見，該師團尙未到達之前，另派遣中國駐屯軍中的三個中隊，先到濟南。

然而派兵到濟南，全是自衛上不得已的處置，並非對於中國及其人民有若何非友好的意向，或者對於南北的一方軍事行動有干涉的行爲。等到在保護該地日僑見地上，認爲已無派駐軍隊必要時，立即撤回派遣軍，也和前次派兵時相同。」

國民政府的對日抗議

「去年五月間，貴國政府於本政府出師北伐通過魯境時，突有出兵山東之舉。本政府以貴國此種舉動，實屬侵略我國領土主權，不特違背公法，抑且破壞條約，當經本部通電達貴國大臣抗議在案。是後雖不久撤兵，我國民對於領土主權之橫遭侵害，不禁猶有餘痛。本政府定都南京以還，對於各友邦生命財產，迭次飭令所屬，力加保護。今春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又有具體表示。最近國民革命軍北伐途次，復由蔣總司令正式頒發佈告，並下令全軍，切實負責保護外僑，業於本年四月十六日電令江蘇交涉員，將此意照會駐滬貴國領事，轉達貴國政府，而本部長於此數月所特爲致力者，尤在遵照本政府之外交方針，以誠懇之精神，與

各友邦圖謀以次解決各種懸案，以釋誤會，以增親善。乃貴國政府對於上列一切事實，概行不顧。於我大軍再度北伐之際，統一行將完成之日，又有出兵山東之議。情形與辦法，一如去年五月，是則於情於理，兩不可通。不獨公法條約蹂躪殆盡，更恐因此釀成意外。貴將誰歸？貴國政府此種舉動，目的究竟何在？若慮戰地僑民蒙意外之危險，則儘可按照國際慣例，從容別謀安全之策。不意貴國政府不此之圖，復蹈前轍。遽行出兵，是本政府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應請貴國重加考量，顧全兩國人民歷來之好感和融洽，迅將所擬派赴山東之軍隊，一律停止出動，以維邦交，而敦睦誼。」

對於第二次的山東出兵，國民政府頗爲慎重處理，雖然有以上的對日抗議，但尙未實行排日，當時中央黨部的決議如下：

「此次日本的出兵，出於田中內閣的專斷，並非日本民衆的意志。所以罷工罷市等足以擾亂後方的一切行動，均須避免。」

由此可見官民雙方的態度，都非常慎重。因為國民政府急於完成北伐，所以不願與日本牛事。同時鑑於前次的南京事件，恐怕這次共產黨又乘機擾亂內部。所以北伐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此，自然也注意到這一點，但是不幸仍然有濟南事件的發生。

北伐軍逼近濟南附近的時候，北軍因為連打敗仗，兵士都失了戰意，已經無勝利的希望。張宗昌孫傳芳等都覺得不如收兵退却，所以乘三十日的夜蔭，逃出了濟南。結果五月一日清晨，革命軍不流血的占領了濟南。

南軍入城以後，蔣氏即對日本派遣軍的當局，聲明負責維持治安與保護外僑，同時要求日本軍隊撤防，免生誤會。其初日本守備隊，見中國軍隊秩序甚好，應允撤防。但到第二日晨，便有一部分中國軍隊，掠奪日人吉房長平寓。因此惹起兩軍衝突，後來戰線漸漸擴大，日本警備區以外的日人，亦遭兵禍。

不久，日本派遣軍與革命軍兩方成立停戰協定，中國軍隊完全退入城內，於是我國（日本）向

對方要求其處罰責任者，謝罪賠償損失，解除惹起事件的軍隊武裝及撤退到膠濟鐵路二十華里以外的地點。然而這時中國的態度，異常強硬，回答根本也就缺少誠意。

我軍司令部因見中國毫無誠意，遂決心採取自主的武力行動。從八日清晨，便開始在商埠地近搜索中國軍隊，加以驅逐。這時辛家莊的中國軍隊起來攻擊我軍，中日兩軍遂又開火。日軍到處擊潰中國軍，十一日午前二時，便占領了濟南城，在城周圍的二十華里以內，完全沒有中國軍的蹤跡。

這種事件發生以後，山東的形勢，日見緊張。日本已派遣的兵力，當然不够分配，而有再增兵的必要，於是又派遣了名古屋的第三師團。

以上是濟南事件的大概情形。

濟南事件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尚在制止民衆的排日運動。但是事件發生後，各地民衆排日抵貨運動便非常猛烈，上海更爲厲害。譬如檢查日貨，登記日貨，募集救國基金，停止與日本的銀行

交易及處罰奸商等等，都是非常的激烈。

(三)日本的「滿洲」治安維持宣言

濟南事件後，南北兩軍的對峙，北軍更屬不利，顯然已不能保守京津一帶了。京津若再被革命軍占領，結果戰爭便恐怕波及滿蒙，那麼日本在東三省的權利更有受侵害的危險了。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逐漸勝利，在日本政府方面，認爲已有預防的必要。於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就向北京的張作霖，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山西的閻錫山，河南的馮玉祥，發出通牒，大意說：

「中國多年戰爭的結果，一般國民都陷於極度不安和貧困，在華外僑也不能安居樂業。所以中國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統一，實爲外僑共同之希望。尤以與中國利害關係更深的鄰邦帝國，更爲關切。

現在戰亂已有波及京津地方的趨勢，東三省也感受危險。東三省的治安維持，向來爲帝國所

重視。若該地治安發生紊亂，或者有發生紊亂的危險時候，帝國必須極力阻止。所以在此戰亂進展至京津，有波及東三省的趨勢時候，帝國政府爲維持東三省治安，不得不取適當而有

效之措置。

然而帝國政府對於交戰者，採取嚴正中立之方針，仍然不加更改。且採取上述方針，於時機及方法上，亦務必注意，不致對於雙方以生出不公平之結果。」

對於這個聲明，國民政府立刻就抗議如次：

「對於東三省方面的治安問題，國民政府自當講求切實的辦法，以保護內外人士一切的安全，此乃國民政府本來之責任。

然而貴國政府的通牒中，爲維持東三省的治安，於不得已時，有採取適當而有效之措置等語，此等處置實爲干涉中國內政，且明白違背國際公法上，各國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

(四) 北伐的完成

濟南陷落的消息，使奉軍非常動搖，不得不下令全綫後退，於是京漢，京綏兩路的軍隊都往後退，以萬里長城的八達嶺，京漢路的保定，津浦路的德州爲第一線，預備保守北京。

到這時候，奉軍能够採取的方策，祇有採取攻勢，或退守京津，甚或全體退出關外的三條路。

從日本看來，防止戰禍蔓延到東北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南北兩軍停止戰爭。但是在北軍戰勢不利的時候，若日本勸告停戰，結果自然要使南軍不平。所以和平的手段，只有使南北兩軍在北平成立和平妥協，或者勸告張作霖退出關外。

當時日本駐在北京的芳澤公使，就是採取前者的方法，勸告和平讓出北京，但是驕傲的張作霖，堅持主戰論，不肯採納。

後來南軍漸漸的逼近，北軍的士氣更是不振，各地的戰事，都是北軍打敗仗，所以北軍已經到絕對不利的地步。於是張作霖纔不能再固執成見決心退出北京，六月一日大元帥府招請外交團，聲明退出，及舉行告別。三日午前一時十五分，全體由京奉線出關。他自佔領北京，雖已二年，但是

夢想的中國統一，與大元帥的榮位，終是曇花一現。第二天的午前五時三十分，他的專用列車，要開到瀋陽站的時候，忽然炸彈爆發，列車顛覆，張氏及黑龍江督辦吳俊升都同歸於盡。

聽到這個消息的奉軍，自然更爲動搖，幾乎不可收拾。因此決定全軍退出關外，由北京，天津退往山海關外，於是奉軍的正式部隊都退出關外。

同時幫助奉軍的孫傳芳，也逃到瀋陽的督辦公署。至於吳佩孚氏則在武漢陷落時，逃回四川去了。就是頑固的張宗昌，也在灤河一戰解除了武裝。於是京津完全落到革命軍的手中，六月八日青天白日旗就在北京的城上飄揚起來了。

革命軍佔領京津，可以說是北伐的完成，和中國內部十八省的平定。青天白日旗從此飄揚到中國全國。

七月六日蔣馮閻三巨頭，前後往北京集會在孫總理的靈前，行了報告北伐完成的祭禮。北伐開始以來，已有二年，完成總理遺志的蔣介石氏，不待說，是有無限的感慨。

在總理靈前的蔣氏，正如在生人的前面一樣，祭文上說着懇切的回憶，大意說：

『軍政時期從此告終，而入了訓政時期，茲遵照遺訓，已定南京爲全國首都，今後當遵照遺囑，完成所有建設事業。』

(五)南北妥協

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發以來，僅僅在兩年之中，便統一了中國本部，所餘的也祇有東三省了。繼承張作霖做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的張學良，雖然曾經隨着父親，在京津一帶作戰，但是沒有他的父親那樣的野心與鬥志，並且他又知道對南軍作戰沒有勝算，所以採取和平方針，希望在和平中能够成立南北妥協。

他曾經對某日人過下面的話：

『我對於父親以前所做的事，自然無話可說。不過近來東三省人民，因爲戰爭感覺非常痛苦。中國本部既已被革命軍統一，若是東三省仍然單獨的繼續作戰，那祇有使人民受苦而已。所

以這決不是我願意做的事情。」

那時他的意思，認為祇要革命軍的勢力不再侵入東北，可以不直接干涉東北的內政，那麼自己對於南北的妥協，隨時都願意接受。不過他所顧慮的一點，乃是日本的態度，因為恐怕將來南北妥協之後，日本方面或者要有所舉動，況且當時的田中內閣又正在主張對華實行積極政策，所以不能不刺探日方意嚮。

但是當時在日本方面，主張南北妥協的輿論者很為有力，他們的理由如下：

(1) 國民革命軍及國民政府，到南京以後，惹起許多排外事件，使外人發生厭惡。若是這種勢力再達到東三省時，恐怕會要推翻日本重大的既得權利。雖說國民政府將來把內外的情勢安定之後，仍然要採取溫和的政策，但是目前在兵馬倥傯之際，還不可靠。

(2) 南京政府雖說統一了中國本部，但這祇是在外表上是如此。其實國內仍然有反對份子，而且共產國際，尚在操縱中國共產黨要打倒蔣介石氏，若果這種勢力發動起來，中國恐怕又成爲亂

局，若是東三省加入其統治之下，恐怕也要受波及。

以上是妥協尙早論的根據。

張學良曾徵求過日本瀋陽總領事的意見，總領事的回答也以爲是尙早，雖然這是個人的意見，但也可知道日本意見的一班。

張學良因爲上項意見，一時中止妥協，但是南京的密使絡繹道上，勸他早日懸掛青天白日旗，若再躊躇，東三省將來恐怕就要被日本占有，張學良終受南京勸導，決心與南京妥協。十二月二十九日，青天白日旗便在東三省各地飄揚。於是全中國由蔣介石氏一手統一了。

第十一章 蔣介石氏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一) 掌握實權的蔣介石氏

國民政府在國民革命軍的進行北伐中，移至武漢，這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的事

情，而蔣介石氏以電光火石之勢，進兵上海的時候，則爲該年三月。此後到九月中，甯漢兩政府的合併成功，南京正式成立國民政府，蔣氏再膺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與師北伐，結果舊勢力最後的代表者張作霖，放棄大帥元的地位，倉皇遁回奉天，被炸死於關外，這乃是第二年六月的事情。於是到了該年年底，張氏的繼承者張學良斷然易幟，宣佈服從國民政府。這樣，自從武漢政府成立的那年——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一直到今年已經是整整的九年了。

在這九年之間，蔣氏有時做國民政府的主席，有時做陸海軍的總司令，或者做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他在南京政府裏的名義雖經幾次的變遷，但是在實質上他總是國民政府的柱石，始終也沒有改變過。無論怎樣變來變去，他的獨裁的程度絲毫沒有增減，雖然蔣氏本人也認爲獨裁並不是一個良好的制度。

不消說，對於他的獨裁，有一部人是反對的，又有一部份人因爲反抗他的獨裁而有所舉動。但是每次都由於他的精密的軍事天才，而且又有中央政府做他的背景，同時他的地盤在經濟上也最占

優勢，有浙江財閥在後面幫助他，所以每次的勝利都是落在他的手裏。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對於統治的原理說明得極爲詳細，但是關於如何具體化的方案，却付之缺如。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祇是一種思想，而不是一個政策的綱領。所以與其說孫中山先生是一位現實的政治家，毋甯說他是一位啓蒙時期的革命的思想運動家。

反之，蔣介石氏却是一位實際的政治家。他拿孫中山先生的啓蒙的思想做背景，逐漸實行，因此統一了中國並統治全國。

當然，在國民政府的內部，孫科與汪兆銘等等也不能不算是實際的政治家。但是因爲他們不是蔣介石氏的嫡系，不能不甘心接受蔣氏的指揮。因爲他們的實力不如蔣氏，所以他們自己知道，如果站在蔣氏政權之外，亦即等於放棄政權，那麼與蔣氏妥協，保持最低限度的發言權的機會，却不失爲賢明的策略。所以縱然稱爲國民黨左派汪兆銘派，也不得不低首來走這一條的路線。那麼又何況其他的軍閥呢！

這樣，蔣介石氏遂成爲掌握南京國民政府的實權者。

這裏，我們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還有加以一番考察的必要。

(二) 國民黨的指導原理

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歿之際，曾對於同志留下這樣遺囑：

『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原來國民黨施行統治是完全根據這個遺囑，所以我們爲要明瞭國民黨和南京政府，不能不對於這個遺囑的內容，先加以一番說明。

其中自然以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的指導原理。

(1) 三民主義

所謂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總稱。

所謂民族主義敘述的是關於中國民族獨立的實行方法，其中含有對內的及對外的雙重民族解放意義。在國內方面，其目的是在使漢·滿·蒙·回·藏各民族互相平等的結合，各民族均在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享受同等的待遇，集中各民族的團結力量，以造成與列強平等的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

其次，在對外方面，主張中華民族本身的解放，解除一切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及束縛，使中國的國土從半殖民地的苦境中解放出來，排除所有外力的不合理的壓迫。

國民黨為喚起這種民族意識起見，日常所用的標語，第一是「打倒帝國主義」，第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

其次所謂民族主義，係指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的原則而言。孫中山先生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為二種：

(a) 民權 政權完全收留在人民的手裏，人民就用這種完全的政權，來直接管理國事。這種政

權就叫做民權。

(b)治權 這種治權完全歸政府的機關掌握，政府運用這種極大的力量，來管理全國的事務。然而政權又有四種：

甲、選舉權

乙、罷免權（官吏的任命罷免權）

丙、創制權（人民有自行制定法律使政府執行的權利）

丁、複決權（人民有改正及廢止現行法律的權利）

人民既拿這四種政權來管理政府，限制政府的活動，在政府方面，就不能不同時採用五種治權，即所謂五權憲法。所謂五權憲法，係在司法、立法、行政三權之外，另加考試及監察兩種權力。所謂考試權，就是說官吏及人民的代表等，都須經過政府的考試，然後纔可以錄用。此項制度的運動，便叫做考試權。其次監察權自然是彈劾官吏的權了。

據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如果能夠把政權與治權分開，合理的加以運用，就可以充分發揮民主國家的政治機能了。

最後講到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的社會革命的指導原理，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可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孫中山先生本人雖認為民生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同，但在事實上，民生主義也含有共產主義的傾向，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總而言之，民族主義主張中國各民族的解放，民權主義含有政治建設的意義，而民生主義則含有經濟建設的意義。

(2) 建國大綱

建國大綱為確定三民主義的實行辦法的一個大綱。其內容先敘述革命的主義及主張，其次為實行的方法，最後則說明完成革命的程序。此項建設的程序，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

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軍政停止之日。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實行各種建設事業，以造成完全的自治縣爲目的。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憲政時期，在省方，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在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

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公布之。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完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

(S) 建國方略

建國方略的意思說革命是非常的破壞，在這破壞之後，必須有非常的建設。孫中山先生把這種建設分成：(a) 心理建設，(b) 物質建設，(c) 社會建設三方面。

所謂心理建設可以看做孫中山先生的處世哲學，提倡「行易知難」，而反對王陽明的「知易行難」的學說。

物質建設就是所謂實業計劃，係說明經濟的建設事業。

社會建設或稱民權初步，其內容爲敘述結社，集會，會議等各種的規則與手續。

(4)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係根據聯俄容共兩大政策，改造黨的組織。黨的勢力從此飛躍的進展，國民黨的實力亦發揚於中外，在國民黨的黨史上，實創了一個新的紀元。

該宣言內容計分三段：

第一段以「中國之現狀」爲標題，攻擊軍閥的橫暴，反對列強帝國主義的束縛，並主張爲了要排除一切惡勢力，須促醒民衆自覺，及唱導中國民族解放的必要。其次，對於當時各種政治主張，如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及商人政府派的議論，一一加以引述，予以嚴正的批判。

第二段以「國民黨之主義」爲題，解說三民主義，尤着重於提倡民生主義，詳述農民政策與工人政策的實行方針。

在農民政策方面，主張農民因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予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理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方。對於農民之缺乏資本及負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

在工人政策方面，主張對於生活絕無保障之工人，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彼等之生活。所以此後國民黨呼籲全國無產階級的團結，參加他們的運動，大聲疾呼要打倒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

第三段的題目是「國民黨的政綱」，從對外政策及對內政策兩方面列舉具體的政策。

對外政策，一方面極力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尊重國家的主權，同時關於外債，則申明凡非爲擁護軍閥的地位而消耗的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加以保證並償還

之。

對內政策，對於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採均權主義。此外如地方對於國費的負擔，普通選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地租的查定，戶口調查，農民法，勞動法，教育等一切黨綱上所規定的政策，在這裏也都有簡明的敘述。

(三) 黨治與政府的組織

現在先就國民黨的組織作一個概觀。

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

以全國代表大會爲人民全般意志的代表，另以國民政府執行政務，大會每年召開通常會議一次，其職權如下：

(1) 受理並審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各部的報告。

(2) 修改國民黨的政綱及章程。

(3) 對於時事問題決定政策。

(4) 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並遞補缺額。

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全國代表大會的意志。此項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限如下：

(1) 代表國民黨的對外關係。

(2) 指導各地組織黨部。

(3) 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的人員。

(4) 組織國民黨中央機關各部。

(5) 支配國民黨黨員及財政。

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至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在平時，由中央執行委員中互選出來的常務委員代行執行委員會的職務。

又在黨內爲監察各機關的職務起見，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

黨內又包括有中央執行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組織的中央政治會議，對於國民政府行使指導權。照上面看起來，國民黨的政務，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指導機關，同時以國民政府爲實行機關，而中央執行委員會另外又指導國民黨的黨務。爲執行此項黨務起見，特別設了一個中央黨部，在中央黨部之下，則有各地的省政部，縣黨部，市黨部，特別市黨部，區黨部，與海外黨部等組織，而成爲一個系統，互相聯絡。

其次，講到國民政府的組織。

國民政府係根據國民黨的意志，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方式，執掌政務的一個國民黨的機關，這和國民黨內執掌黨務的中央黨部是相對的。國民政府最初在南京構成一個國家統治機關的形態，是在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的四月十八日。

國民政府根據五權憲法上的各種治權的權能與權限，組織成爲五院。這五院均受國民政府主席

的管轄。五院的名稱如下：

(1) 行政院

(2) 立法院

(3) 司法院

(4) 監察院

(5) 考試院

國民政府主席以元首資格代表國民政府，掌握軍權。

行政院與普通內閣相似，分爲內政、外交、農礦、財政、交通、工商、軍政、衛生、教育等十部（譯者按現在農礦與工商合併爲實業部，衛生部併入內政部爲衛生署，另有海軍部共九部），分別執掌各種政務。所以行政院長相當於各國內閣的首相，而各部部长亦相當於內閣各部的最高長官。

立法院有委員四十九至九十九名，爲國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議決各種法律案，預算案，宣

戰案等。

司法院執行一切的司法事務。

考試院執掌國家的考試事務。

監察院則行使彈劾官吏與檢查會計的兩種權限。

(四) 蔣介石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蔣介石氏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內，有最大的權力。茲說明於次：

第一，在國民黨裏的蔣氏勢力，他本人在黨的中央擁有六十餘名的委員，如果再把支持蔣氏的元老派加算在內，共計有八十名左右。對於汪兆銘派的二十餘名，孫科派的約十名，西南派的約四十名，其他約三十名，佔着絕對優勢。況且蔣派與汪、孫二派合計起來，約百二十名之多，對於反對派的七十餘名，相形之下，更佔優勢了。

蔣氏在黨裏比較的算是後輩，在一九二四年的一全大會裏，他自己還沒有得到中央委員的位置

。到一九二六年的二全大會裏，他纔被選爲中央委員，直到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爲止，他在黨內的勢力尙不足道。

然而自從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國共分離以後，由於陳果夫、陳立夫等的努力，蔣派在黨部裏的勢力纔稍稍增加。再到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以後，聲勢更爲浩大，到了一九三二年可說是達到頂點，自此以後一直繼續的維持着優勢。

其次，再講蔣氏在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

在蔣氏做行政院長之下，軍政部長爲何應欽氏，直系的孔祥熙氏據財政部長的職位，其他如外交部長張羣，內政部長蔣作賓，交通部長俞飛鵬，海軍部長陳紹寬等，都是蔣派的人物。在這方面，汪兆銘與孫科幾乎沒有插足的餘地。

又其次軍事委員會更是蔣氏的禁城，他自己是委員長兼常務委員長，又是參謀總長。在他下面，軍事參議院長唐生智，參謀次長楊杰，也都是蔣氏的嫡系。

還有江浙的資產階級，即浙江財閥，由於蔣氏嫡系的宋子文與元老派的張靜江這兩個人的關係，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就一向是支持蔣氏的。

由於在過去十年與蔣政權相互結合的關係，浙江財閥關於經濟金融，援助中央完成了集權制度。尤其是在過去一年間的成績，譬如十一月的幣制改革，白銀國有等，都要算最大的成功。結果，現在中國全體國民的私經濟，漸漸有集中於南京政府的新趨勢。又地方軍閥雖也假借白銀國有，奪取地方銀行的白銀，但地方經濟無論如何，也不能不依賴中央政府了。

最後說到元老派。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與吳敬恆，戴天仇，于右任，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張繼等都是元老派。這些元老也都支持蔣氏，這也是蔣氏勢力強大的一個原因。

從上文看來，蔣介石氏的勢力在黨中央，國民政府，以及軍事委員會內既佔絕對優勢，又受元老派的支援，並有浙江財閥作爲後台，所以現在成爲全國最大的勢力。與其他各派的勢力比較起來，他們祇好像是太陽前面的一點火光而已。

但是蔣氏的勢力尙不僅限於黨部與國民政府的部內。就是他的軍力也非常的強大而有力。現在中央軍的實力，決不是任何地方軍閥所能並肩相比的。

茲試依中國軍隊的色彩，比較其實力如次：（譯者按此種分類與目前實際情形，諸多不合，謹此註明。）

▽中央軍

（一）直系——三十四師，一旅，炮一旅，兵力三十八萬二千，步槍三十五萬八千枝，機關槍二千，砲九百門。

（二）傍系——四十五師，十七旅，騎一旅，兵力五十四萬三千，步槍四十五萬一千機關槍三千五百，砲千五百門。

（三）合計——七十九師，十八旅，騎一旅，兵力九十二萬六千，步槍八十一萬，機關槍五千五百，砲二千四百門。

(四) 空軍——飛機四百架，主要駐屯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張學良

(一) 第五十一軍——于學忠部下的第二百零五、百十一、百十三、百十四、百十八各師，騎兵第一師，騎兵第六師。

(二) 第五十三軍——萬福麟部下的第二百零八、百十二、百十六、百十九、百廿九、百卅各師，騎兵第二師。

(三) 第五十七軍——何柱國部下的第二百零九、百十五、百二十各師，騎兵第三師。

(四) 第六十三軍——馮占海部下雜軍一個師。

(五) 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下的百零七、百十、百十七各師。

(六) 合計——十六師、騎四師、砲三旅、兵力十八萬，步槍十萬，機關槍二千三百，砲

千二百門，空軍飛機二十架，分駐陝西、甘肅、山西、甯夏方面。

(七)此外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與張學良聯成一氣。楊軍的第十七軍有第十七、第四十二，新編第十三、十四、十八各師及陝西警備六師。共有兵力七萬，與張學良軍隊合計，共有廿五萬人。

▽靜觀派

(一)閻錫山軍

第三十二軍——商震部下的第六十六、六十七、百卅九、百四十一、百四十二各師，騎一師。

第三十三軍——徐永昌部下的第六十八、六十九師。

第三十四軍——傅作義部下的第十二、七十三師。

合計——兵力十二萬，步鎗六萬五千，機關鎗四千三百，砲一千門。

(二) 共產軍——毛澤東朱德等的共產軍約五萬。

(三) 西南軍

以余漢謀爲總司令的第一集團軍(廣東軍)——十二個師，七個旅。

以李宗仁爲總司令的第四集團軍(廣西軍)——六個師。

合計——兵力十五萬，步鎗十一萬五千，機關鎗千七百，砲五百門，戰車十數台。

(四) 貴州軍

第十八路軍——毛光翔部下的八師，二獨立旅，兵力八萬，步鎗三萬。

(五) 雲南軍

討逆軍第十路軍——龍雲部下的六師，兵力一萬六千，步鎗一萬六千。

(六) 韓復榘軍(山東省)

第三路軍——第二十、廿二、廿九、七十四、八十一各師，及省防旅的五師，一旅，

兵力六萬，步鎗三萬，機關鎗兩千，砲二百門。

(七) 宋哲元軍(河北省)

第廿九軍——三十七、三十八、百卅二等四師，兵力四萬，步鎗兩萬二千，機關鎗四百五十，砲一百門。

從以上所講的看起來，蔣氏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現在佔有絕對優勢。所以現在他做行政院長，實際的登上政治舞台，當然是不成問題了。

第十二章 反蔣陣營的沒落

(一) 蔣馮的衝突

北伐成功以後的中國，仍然發生許多軍閥爭奪地盤的戰爭，繼續着軍閥割據的形態。各地對於威勢卓著的蔣介石氏所起的反對，形成了所謂反蔣陣營。蔣氏因此天天忙於懷柔鎮壓，還感覺到不

够。

北伐成功以後的民國十七年二月，南京政府在廣東，武漢，開封，太原四個地方，設立了四處的政治分會，拿來作爲三民主義的指導區域。

這種政治分會據說是分區負擔實行政治指導的，但是在實際上不過是勢力及地盤的分配而已。譬如太原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閻錫山的勢力範圍，開封分會屬於馮玉祥的勢力範圍，廣東分會屬於李濟的勢力範圍，武漢分會則是李宗仁的地盤。至於不屬於這四個分會的地方，大概都是由南京的中央政治會議來施行政治的指導。

設立各地的政治分會這一個事實，就是承認地盤的分配。地盤的存在，一方面是國民政府政治統一的障礙，同時也是實行裁兵的阻力。所以蔣氏須要廢除各地的政治分會，把軍權收在南京政府的手裏。因爲這個緣故，蔣氏和各地的軍閥發生了衝突。

開封政治分會的馮玉祥，爲十數年來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惑星，這一次受到蔣氏的處置，

就首先和蔣氏衝突起來。馮玉祥以基督教將軍的身份加入國民黨，有一個時期曾與蘇俄接近，被稱爲「赤大塊」。但是因爲他慣用機會主義的行動緣故，終不能與蘇俄和美國合作到底。

當從前華北因爲張作霖被炸而告崩壞的時候，馮玉祥便很想把華北抓到自己的手中。所以到蔣氏爲整理華北，要求與馮會談的時候，馮氏不但不應允，而且還要求給予他十萬大軍，讓他自己到前線去從事抗日。但是事實上如果把兵權給了馮玉祥，那無異是把武器給了敵人一樣。所以看透馮氏肺腑的蔣介石氏，不僅不給他兵權，而且還把自己直系軍隊佈滿在華北一帶。

馮玉祥的希望，是想把山東加入自己的地盤，可以利用青島的海港。他爲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與蔣氏進行妥協，但是蔣氏竟先發制人，把山東，尤其是青島給了他自己的部下。這使馮氏極端失望而憤慨，當然是不消說了。

果然到了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七日，馮氏在鄭縣招集部下，舉行軍事會議，第二天——十九日發表宣言，指摘蔣介石氏的罪狀。於是蔣氏於二十一日，在國民政府的五院院長連署之下，發表討馮

宣言。然而不到幾時，馮軍的中堅份子一部分傾向中央，結果使馮軍完全失敗。於是山西的閻錫山出來調停，蔣馮的衝突纔一時收斂，六月二十四日，蔣馮閻三人，共同發表了一個和平宣言。

然而從八月一日所開的南京編遣會議，顯然是蔣氏要統一軍權的一個計畫，於是汪兆銘一派首先起來發表討蔣宣言，馮氏部下的二十名將領也聯名宣佈蔣氏的罪狀。到了第二年（民國十九年二月），從來對於蔣氏表示好感的閻錫山氏，也發出通告，來責難蔣氏的獨裁，這時他已與汪，馮二人連衡，以當蔣氏了。

所以蔣氏從民國十九年五月，便率領軍隊，與山西的閻錫山軍及馮玉祥的西北軍開戰，後來因為東北的張學良軍隊完全與蔣氏採取一致的態度，所以勝利終歸蔣氏。

不久以後，因為胡漢民被蔣氏留在南京，廣東方面發生反蔣運動的時候，馮玉祥和閻錫山又聯合起來，想共同倒蔣，但是因為張學良依然表示援助蔣氏態度，所以這一次的倒蔣運動，也歸失敗了。

自從張學良下野後，華北方面就成爲黃郛與何應欽的協同政權。胸存芥蒂的馮玉祥氏又想利用這一個機會，把河北收到自己的手中。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他在察哈爾又興起第三次的反蔣運動。他以爲山西的閻氏，山東的韓氏，可以援助他的，同時蘇俄也可以默認他的行動。然而事實恰與預期相反，閻氏和韓氏都沒有響應，蘇俄方面也認爲馮氏如果占據了察哈爾，對於他本身也不見得有利益，所以這次的反蔣運動也終於自歸消滅，馮氏則寄身舊部韓氏之下，棲隱於泰山。

後來他應蔣氏的招聘，而赴南京，現在已同心協力爲國家服務了。

(二) 廣東及廣西派

廢止政治分會也就是要廢止軍閥的地盤。反對蔣氏這種意見的人，決不祇是馮玉祥一人。號稱廣西派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號稱廣東派的李濟環，也主張保存政治分會，隱然表示着反抗蔣氏的氣勢。

據兩廣派的計劃，擬以武漢的地盤爲中心，形成一個勢力圈。所以知道了蔣氏要廢止各地的政

治分會，他們乃與南京政府內部的胡漢民互通聲氣，先驅逐湖南省政府的主席魯滌平，而把該省占爲自己的地盤。

在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們列舉魯滌平的罪狀，用武力驅逐了他，並罷免他的官職。南京政府認這種措置爲不當，乃於三月四日，斥責武漢政治分會的違法。該分會因爲不接受中央的申斥，所以中央於二十六日便下討伐令。

交戰的結果，兩廣派完全失敗，李濟琛被監禁，李宗仁逃亡，湖北、湖南兩省完全歸到南京政府的統制之下。

以後兩廣派的領袖，更連絡國民黨裏的左派，在廣西集中兵力，伺機奪取廣東。但是這一個計劃也被蔣氏破壞，沒有成功。

原來廣東與廣西，都在珠江流域，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在內部，廣西與廣東兩派不免有許多爭執，但是在對於兩廣以外的共同的敵人的時候，始終是站在一條戰線上面的。所以廣西派的反蔣

運動常常得到廣東派的支援。

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氏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但因胡漢民氏表示反對，於是發生激烈的爭執，當時胡氏雖想退出南京政府，但是因為種種關係，一時被留在南京。

對於這件事情，廣東派一致起來反對，向來與胡氏關係最深的古應芬氏祕密的跑到廣東，勸說當地的實力派陳銘樞、陳濟棠樹立反蔣的旗幟。當時在南京政府擔任鐵道部長的孫科氏，也曾參加這種運動。

陳銘樞因爲一向與蔣氏互通聲氣，所以沒有立刻表示態度。正在這樣躊躇不決的時候，陳濟棠却乘機而起，把廣東的地盤奪取到自己的手裏。

這時汪兆銘一派，以及陳友仁等也都趕來參加，五月就在廣東另外成立一個國民政府。這一個政府與南京政府一直對峙了四個月之久，到「滿洲」事變發生的時候，纔實行妥協。該年十二月兩個政府纔合爲一體，當時的條件爲釋放胡漢民回到香港。

講起陳濟棠這個人，他從來是決不死走一條路線的人。他原來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在李宗仁、白崇禧做第四集團軍的正副總司令時候，他還祇是一個團長。到陳銘樞做廣東省政府主席的時候，他完全雌服在他下邊。但是實際上他的手段却要比陳銘樞氏來得高明，以前他所以不出名的緣故，完全是因為他的陰險性格使然。所以當蔣應芬等南下的時候，他就認爲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斷然與他們勾結起來，驅逐了首鼠兩端的陳銘樞氏，一躍爲廣東的上人翁。許多年來，無聲無臭的陳濟棠，從此就被舉世所知了。

他的手段非常毒辣。他利用廣東的實權，把汪兆銘、孫科、陳友仁、伍朝樞等在廣東的勢力，一齊掃淨絕了。

並且陳策（海軍司令）、張惠長（空軍總司令）、陳慶雲（虎門要塞司令）等三人，曾經受孫科的指使，要拿武力來威脅陳濟棠的時候，也被他先發制人的，解除了陳策的陸戰隊的武裝，同時其他兩個人也受了他的處罰。

他自己對於一班小軍閥極力的懷柔，拉攏他們到自己的陣營裏來。至於對付正面的敵人廣西派，則截斷他們的武器與軍火的來源。又在他的麾下直屬部隊裏面，本來就沒有什麼出色的人物，足以令人注意，對於余漢謀、李揚敬、香翰屏三翼羽的勢力，他總要讓他們的勢力保持平衡。此外他直屬的獨立師及獨立旅很多，他本身的統制力，完全能達到全部麾下的軍隊裏去。而且他又很會貪污，私財聚集到三千萬元。

這種使人無可奈何的陳濟棠，在要確保他的兩廣地盤之外，無論什麼理論都不能說動他。所以無論何人用反蔣的口實，或以剿共為理由來拉攏他，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到了後來，胡漢民派與元老派（南京政府的）已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聯絡了廣西派及陳銘樞等，無論如何要迎接胡漢民氏回來，重新樹立廣東國民政府。然而陳濟棠在表面上却裝作不聞不問，暗中使余漢謀、香翰屏等廣東將領連名通電來威嚇胡氏，一方面集中兵力，表示彈壓的氣勢，另一方面封閉胡派的機關及通信社，結果使胡派的計劃完全失敗。陳氏在這樣硬幹的時候，自己仍然裝作毫不相關的樣子，由此

也可見他這一種人是如何的不容易對付了。

不過，陳濟棠對於日漸擴大的蔣氏的勢力，也覺得無法可想。到了今年，因為蔣氏的努力愈覺盛大，所以他想找出一個口實，來發起反蔣運動。因為這時他已覺得如果不這樣做，他的地位也就很有崩潰的危險了。恰巧那時南京政府正在向着中日親善的那方面邁進，於是他就抓住這個機會，標榜抗日，責難南京政府。結果陳濟棠失敗，後來亡命海外。

其次，廣西派的歷史很久，該派在北伐完成的當時，其地盤曾擴大到武漢一帶，白崇禧的軍隊有一個時期曾伸到華北。

不過以後因為首先反對蔣氏的緣故，李濟琛被監禁，又失掉武漢的地盤，所以李宗仁白崇禧等經過很多艱難困苦，纔逃回到廣西的老地盤，這在上文裏已經說過了。

回到舊地盤以後的廣西派，便銳意從事復興事業，成效卓著，但是因為出口被陳濟棠握着，所以無論怎樣起來也很困難。

廣東的陳濟棠發起反蔣的時候，廣西派也立即起來響應。自從廣東派被蔣氏壓服後，廣西派也就顧全國家大局，服從南京政府。

反蔣陣營的沒落，自然就是中國的統一。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由於蔣氏的努力，而開始發現統一的曙光了。

第十三章 紅軍的討伐

(一) 中國共產黨的發達

與反蔣陣營同為蔣氏最感頭痛的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拔起。

共產主義開始傳到中國是在西歷一九二〇年前後。那時最初的指導者是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及譚平山等。前面二人主要在中國北方及中部從事思想運動，後者則係以廣東為根據地，從事南方一帶的農工運動。恰巧在那時候，孫中山先生受俄國革命成功的刺激，認為中國也有發動同

樣革命的必要，而考慮聯俄及容共的兩大政策。

孫中山先生與當時駐華公使越飛會見的結果，認為中國還沒有到實現蘇維埃組織的時候，所以中國的革命，祇可做到與蘇俄攜手，從帝國主義的手裏解放出來的地步爲止。

然而自從孫中山先生一死，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改組時候，共產黨頓時在國民黨內得勢起來。這時他們認爲要實行中國的改造事業，須與蘇俄提攜，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爲捷徑。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下面一個決議：

「中國的改造事業，現在與北京政府協力已屬不可能了。在世界上能够與國民黨提攜的唯一的國家祇有蘇俄。」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可說是中國的暴風雨時代。在那個時期，身當其衝的中國人固不消說，即在外國人方面，也受了不少共產黨的禍害。南京事件，漢口事件及驅逐外國傳教師等等，無一不是在所謂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共產主義者煽動排外的結果。

尤其是武漢的極左派，當時聽從蘇俄的指令，愈加高唱共產主義的設施。

他們組織的所謂糾察隊的行動可以說是非常過激。本來所謂糾察隊，是以取締勞工及節制罷工為職責的，這是國民革命軍猶在廣東時候所組織的機關，但是以後竟完全變成做赤化運動及用暴力威脅勞工，強使做勞工運動的機關了。國民革命軍進展到長江以後，各地也都組織了同樣的機關，其中在武漢地方的糾察隊最有勢力，而且隊員的人數也最多。他們在武漢政府的援助之下，在各方面逞其暴威，實行猛烈的排外運動。同時對於所謂土豪劣紳，也用盡了種種壓迫與威脅的手段，又對於共產黨以外的人，也完全採取一種高壓態度，於是武漢一帶成為極端恐怖的革命狀態。

但是這種過激的行動，到底不能長此繼續下去。武漢政府內部的穩健派終於起來反抗這種過激行動了。關於鮑羅廷指導下的極左派與穩健的右派的如何對立，與兩者在以後如何的訣別，在上文都已經詳細的講過了。

對於共產派的這種過激的行動，加以彈壓的，在上海方面為蔣介石氏，在漢口則為唐生智氏。

自共產黨的中堅之總工會與香港海員合作社被解散後，隨着國民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契合加深，於是都會方面的共產主義運動，幾乎完全被政府壓伏下去了。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地域上係盛行於蘇維埃區域，在職業上則係盛行於農村方面。

蘇維埃區域，當共產黨勢力最猖獗的時代，曾在全中國領土以內占據到四百縣，綿亙十數省。他們組織有所謂蘇維埃地方政府，實行一種特殊的政治。

其次，就共產黨以農村爲主要活動的一點來說，這是因爲在中國的農村人口裏面，有土地的人口祇佔百分之四十五，而沒有土地的人口却占到百分之五五。而且在有土地的農民人口之中，中農與貧農又佔一大部份，因此共產黨就抓住這一點，而產生了現在的這樣結果。

最初分散在各省的蘇維埃區域，到了後來自然的擴大起來，互相保持着有系統的聯絡，所以在嚴重的政府軍警備之下，暗中仍然屢次召集各地方的蘇維埃代表，舉行重大的協議。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該月二十日，在江西省的瑞金，開了第一次的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中華蘇

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宣言，於是共產黨的存在，更成爲不可輕視的一個勢力。

由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而成立的臨時政府，任命毛澤東爲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之下，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監督、國家政治保衛等十個委員會，這種組織與蘇俄極爲酷似。

這個共產黨政府，又以外交人民委員會長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對外宣言。其中有下列一節：

「中華民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俄國革命紀念日，正式成立於江西。本政府代表中國農工兵及一切勞苦民衆，打倒帝國主義及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之統治以代替之。本政府爲唯一的無產者祖國蘇俄之友。反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一切的侵略，而主張澈底的民族自決。

本政府主張取消一切過去的平等條約，取消一切外債，要求撤退一切外國軍隊，返還一切租借地。本政府最後目的，不僅在打倒中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且在打倒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的統。

治。但在目前，不反對與世界各帝國主義政府，訂立完全的平等條約。

凡此等國家的人民，在蘇維埃區域之內，於不違背一切法令的條件下，有經營工商業之自由。』

據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發表，一九三二年春季，在共產黨支配下的地盤共計有六萬平方英里，擁有十五萬乃至二十萬的完全武裝的軍隊，及三千萬乃至五千萬的人民。爾來這一個數字雖然逐漸減少，但仍然不失為特殊的國家，除蘇俄之外，恐怕在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充實的共產黨組織。

這怎不是一件值得驚異的事實？素來缺乏安定性的中國社會，往年支配者的寡廉鮮恥，在都會中的新式工場及舊式工場裏的一千五百萬以上的勞工；兩萬萬以上繼續着暗澹生活的農民，失去耕作二千多年來的肥潤的土地；二百萬的兵隊與土匪，每年循環不已的內戰，交通的困難，老朽的保守主義與摩登主義的交錯。照這樣的中國社會，一旦受了蘇俄革命的影響，共產主義自然要在大陸的內地發酵，一天一天的膨脹起來，成爲今日的中國共產黨。

(二)蔣氏討伐紅軍

在民國十九年反蔣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紅軍極其活躍，於七月二十八日佔領湖南長沙，隨即設立蘇維埃政府，其勢力蔓延於湖南、江西兩省的大部份，同時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也受到不少影響。所以這在南京政府方面，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這時蔣介石氏便下了決心，該年年底即從事大規模的討伐紅軍。他先輸送幾十萬的大軍到朱德、毛澤東等紅軍根據地的江西省，開始攻擊。但是這一次討伐的結果，政府方面有三四個師的軍隊幾乎完全被紅軍消滅或降伏，以致於全軍大敗，愈加增強了紅軍的勢力。到二十年五月，又輸送大批的討伐軍，但這一次也歸失敗，甚至當時的南昌也有被紅軍佔領的危險，於是蔣氏到六月下旬便親赴南昌，擔任討伐的指揮。

他到南昌召集各軍事長官，對他們說：

「現在中國，討伐赤匪也就是抗日。據歷史的教訓，內部統一之後纔能抵抗外敵。所以討伐共

產軍沒有完成的時候，絕對談不到抗日。」

當時在熱河省境的偽滿軍隊與中國軍隊正在長城方面發生戰爭，中國全土的抗日氣焰非常熾烈。因此紅軍在後方的搗亂，更使蔣氏感覺頭痛。

國民政府方面對於共產軍，抱有怎樣的決心，這從上面蔣氏的訓詞中就可看出，但是討伐紅軍，無論如何，必須要有大批的資金與軍隊，纔可以制勝。

據一般的傳說，蔣介石氏用在討伐江西省紅軍的金錢，在第五次討伐的時候，就帶去一千萬元。而且其中七百萬元，是專為防止中央軍隊叛變使用的。因為在與共產軍作戰的時候，以兵士的心理狀態為先決問題。

由蔣氏率領到江西的軍隊，僅在省內就有三十萬人。另外為對付散處在湖南、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紅軍，也分配不少的討伐軍，所以政府為了討伐紅軍所調動的全部兵力，據說有六十萬人之多。

自從北伐以來，打敗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軍閥而保持着常勝將軍名稱的蔣介石氏，與紅軍作戰的時候，雖屢次把他們打敗，但在全體的勝敗上面看來，却不能說是怎樣滿意。

討伐共產軍到底有什麼困難呢？

共產軍的特色，就在所謂遊擊戰爭，他們的兵士和農民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政府大軍開到的時候就都逃避，但一等到軍隊走開，而他們又出來了。因為兵農的混雜，所以討伐軍不免對於良善的老百姓，有時錯殺，因此，人民對於政府的反感加深，反而對於共產黨方面表示同情，以致討伐起來更感困難了。

而且政府方面的軍隊，又大都沒有什麼戰意，他們根本不知道爲什麼而作戰，所以政府的軍隊與武器都可以用金錢來收買。一等到真正作戰的時候，政府軍的兵士，就有很多乘機脫逃了。

但是在共產軍方面，雖然並不見得真正的理解馬克思主義，都不過是爲了糊口才加入共產軍的，但是共產黨的幹部所實行的土地均分與一般社會政策的設施，對於多數的貧民階級，却認爲這

是救世的神仙。所以與其效忠於政府軍，倒不如傾向於共產軍方面。

討伐共產軍幾次失敗以後的蔣氏，依然勇氣百倍的堅持著繼續討伐的精神。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共產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終於被蔣氏攻下了。

自從放棄瑞金以後的紅軍，就開始西遷運動，這實在是中國共產黨史上劃期的紀錄。

茲畧述其經過於次：

開始西遷運動的紅軍是朱德及毛澤東的聯合軍，普通稱之爲朱毛軍。

他們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就橫斷湖南南部而入貴州省，第二年的年初更渡了烏江而佔領遵義、桐梓，擬以侵入四川爲最後目標。這樣貴州、四川、雲南的省境一帶，大多被擾亂，但是因爲討伐軍的防禦得力，終沒有達到最後的目的，而不得不再回竄桐梓、遵義，進窺貴州的省城貴陽。

當時如果貴陽一旦陷落，那末共產軍就將以此爲中心，把貴州全省都完全要收到手了。所以蔣氏非常着急，就在三月二十四日由四川乘飛機到貴陽，集中七萬五千的兵力，準備迎頭痛擊。後

來由他親自到前線奮戰的結果，纔算把共產軍擊退了。這一次的討伐，似乎是相當的苦戰，蔣氏自身在危急的時候，曾預備乘飛機離去，這一戰的激烈程度，可不難想見了。

在貴陽被擊破的朱毛軍，於是移向貴州省的西南各縣侵入雲南，一氣呵成的進迫昆明省城。然在昆明又被龍雲的軍隊擊退。五月初，乃向北進至武定、元謀方面。在以前派到東川方面的一個支隊，與派到鹽豐方面的先遣部隊，到這時候便互相呼應起來，從三方面開始前進，到五月十日左右，便渡過揚子江上流的金沙江而侵入四川了。

侵入四川以後的朱毛軍，簡直如入無人之境，川南的會理、西昌等相繼陷落，於是再北上，於六月初更侵入西康省，繼後再轉而回到四川省內，威脅省城成都，同時與從四川北部南下的徐向前軍隊亦開始會合了。

朱毛軍自與徐向前的軍隊合流後，兵力倍加，繼續北進，七月占領理番附近，於是八月中旬，毛澤東、朱德、徐向前等在理番北方的毛兒蓋地方，召開首腦部會議，協議共產軍以後的行動。

在這個會議中，因為分成四川固守說與北進說兩派，會議陷於決裂。於是四川固守派的徐向前與朱德軍合併，再在舊占領地的理番方面逞其暴威，毛澤東的軍隊則向甘肅陝西方面北進。

北進派的毛澤東軍率領林彪、彭德懷的部隊侵入甘肅，九月中旬改編軍隊，組織新的陝甘支隊，從十月末到十一月侵入陝西省北部，在延安保定附近，與土著匪軍劉子丹部合流。

又在湖北、河南、江西省境的徐海東的軍隊，從一九三四年底以來，就開始向北移動，這時也在陝西省南部一帶遊擊，到第二年的七月，就與朱毛軍的西遷北上運動互相呼應起來，從陝西南部向西前進，達到甘肅東部，由此轉向東北方，十月中更入陝北，也與劉子丹軍會合了。

劉子丹、毛澤東、徐海東的合流，使共產軍的兵力，急速增大。於是這些陝西的共產軍起了侵入山西乃至綏遠的念頭。本年（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澤東及徐海東的部下約有二萬之衆的共產軍

侵入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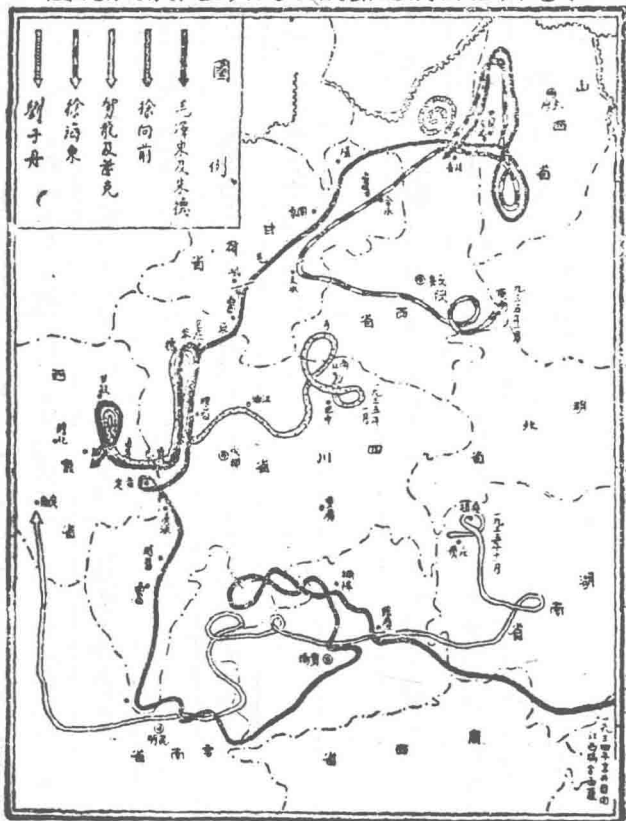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一向在四川省的西部理番方面的朱德及徐向前軍，一時竭力培養騷擾該方面的兵

力，所以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才開始南下，策動進出於四川西部以至川南的西昌邊界。但因被討伐軍阻止，而入了西康省，以等待從雲南北上的賀龍蕭克的軍隊來到。

賀龍蕭克的紅軍，一向是出沒於湖南、湖北、四川省境的。他們從一九三四年末以來，即盤據於湖南省的北部，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旬，他們因占領湖南省的錫礦，得到了很多物質上的供給，從此他們又向南進兵，侵入貴州省，本年二月初，通過貴陽附近西進，而入了雲南省。然而在此被討伐軍擊敗，所以又轉而東向，後又南至貴州雲南省境，在四月初旬，略奪昆明附近各縣後，入西康省，最近已到達定鄉的南方。至此他們與徐向前會師的目的，始已完全達到。

由上文看起來，中國內地的共產軍，被蔣氏的討伐軍窮追，漸次逃到邊境一帶。現在主要的共產軍祇能集結在四川、西康乃至陝西等的邊境地方。這和當年江西中央蘇維埃區全盛時代的情形比較起來，已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他們還擁有潛在的一大的勢力，對於國民政府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與從前也並沒有兩樣。其中的變化，也祇是由中國的中央地帶退到了邊境的一點區別而已。

朱毛匪西竄運動及最近匪移動狀況圖



第十四章 中國之醒悟

(一)「滿洲」事變的失敗

蔣氏當然也有過苦悶時代。他最苦悶的時代，要算是「滿洲」事變的時候。事實上，「滿洲」事變，當時使他很難處置。不過，這種困難，同時對他個人，却也有不少裨益，足以磨練他的身心。

何以「滿洲」事變使他發生很大的苦悶呢？

「滿洲」事變提出國際聯盟大會時候，他起初以爲「日本將被全世界攻擊，那麼「滿洲」自然可以收回」。當時不祇蔣氏是這般想法，大部分的中國人也都是這樣想。

但是不知是幸或是不幸，這個期待，終於沒有成爲事實，蔣氏乃大失所望。

在「滿洲」的日本軍隊行動，提出國聯以後，先經理事會加以勸告，然後英、美、法、意、各

國，更根據非戰公約，警告日本，接着國聯投票結果，亦爲十三對一，因此國聯制裁日本的空氣，一時非常濃厚。這樣日本始終站在被告的立場，由中國在那裏做原告，從表面上看來，一切都歸中國勝利了。不消說，中國的方針，竭力在求援國聯，想來借刀殺人。

正在這個時候。上海事件又激發起來。上海原來是各國利益最複雜的地點。如果在這裏中日兩國開火，無論如何要牽涉到各國的利害關係，最後結果，不難有引起世界戰爭的危險。在上海發生這種事件，纔正是應了中國的希望。蔣氏當時很想利用這個機會，讓世界共同起來打倒日本，自己乘機奪回滿洲。中國對於國聯，尤其對於英美，竭力的鼓吹，也就在這個時候。

中國的這種宣傳，以對美國爲最有效。這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氏開始起來攻擊日本軍隊的舉動，所以當時一方面與英國攜手，另一方面聯絡國聯，想實現他那種共同壓迫日本的計畫。

然而，史汀生爲什麼要援助中國來壓迫日本呢？因爲這與後面所要說的蔣氏在外交上的失敗，同時也是英、美對日採取共同動作所以失敗的原因，很有關係，所以現在且不作任何推測，直接將

史汀生本人的告白，引用在下面：

「對於滿洲問題，以爲由美日兩國簽訂於日本有利的暫時條約即可以解決的美國人，乃是未見在中國重要的背後關係。蓋在目前，日本能够承認的協約或者協定，對於中國皆無非是些帶侵略性的東西。」（遠東之危機）

這是史汀生所懷抱的一般理論。至於他所謂「重要的背後關係」是什麼呢？總而言之，是因爲美國素日關心中國，而對中國有很大的同情。這裏面的理由，據史汀生說：

「美國對於中國及遠東之關係，在某種之重大一點上，與歐洲各國有所不同。雖然歐洲各國在商業上及領土利害上，較我國關係爲密切，然地理上，彼等與中國相隔甚遠，不如我國接近。彼等可謂爲遠方地主，而我國則屬近隣。復次，遠東有因現代化而發生之種種混亂，凡此皆足直接影響我國，而對於歐洲各國則爲間接。蓋太平洋今日已非障壁，而爲一交通之要道也。中國之將來，乃今日之一大問題。但有一事，吾人必須承認，即中國應由中國本身之意志，使其

發達。中國不得受外力之支配，或受他人之強制，以其不願接受之樣式，強使發達。中國文化有其世界無比之抵抗力，四千年來之歷史，即此明證。加之，中國文化上固有之和平主義，實爲亞洲絕大之安定力。否則，中國將直接危害隣邦之和平。吾等美國，亦其隣邦之一。如美國政府放棄其條約上之義務，以致招受上述之損失，則斯誠爲絕對近視之政策矣。」（遠東之危機）

史氏繼更攻擊日本行動：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之侵略中國，曾引起美國國民極大之關心。因此舉不僅爲對於現今世界集團行動之根本基礎——對條約義務之信義——加以襲擊，且對北太平洋秩序與安甯所繫之隣邦應有之友誼關係，亦加以破壞。換言之，吾人對此共同信義之關心，因此次事變發生於吾人世界之中而更加強化。武裝完備之日本，在其他一國中，採取軍事行動，且圖以其與西班牙殖民勢力業已同時消滅之殖民市場理論，恢復於西半球中，此兩事對美國之震動，正如德國

恢復武裝而向一隣國侵入時，大英帝國所受之震動相同。是以余於此處說明所謂「日本門羅主義」，與美國原來之主義有所不同，對於歐洲讀者當不無幫助，若以當今日本藉「亞洲門羅主義」之名，所實行之侵略政策，與一八二三年美國爲保持南美諸國之地方獨立，及自治而公佈之門羅主義相比擬，識者必將認爲幻想而無疑。」（遠東之危機）

同情中國的史汀生氏，在發生上海事件的時候，便決心要和日本戰爭，所以由美國國務院開始向英國交涉共同出兵。這時雖然是蔣氏對日復讐的好機會，不過好事多磨，結果未能實現。

這次的經過，大概如此：

海軍作戰部長撲拉特，聽說史汀生決心要與日本戰爭，即刻會同海軍長官亞丹斯，往白宮求見胡佛總統，直率陳述意見：

「現在若與日本戰爭，實非其時。美國之艦隊，尙無充分準備。日本海軍，一夜之間，即可占領菲列賓羣島，而美國如欲奪回，則至少亦需兩年。國務院如欲實行經濟絕交，戰爭即將不可

避免。」

同時，陸軍長官哈萊的意見，也是如此，所以胡佛結果祇得命令史汀生改變方針。

這原來是「莫利·戈·郎得」的著者走漏的消息。現在撲拉特本人仍加以否認。不過就當時的情形推測，這種事情，也並非不可能。

史汀生對於這事，當然嚴守祕密。但是在他的遠東之危機裏面，有下面的一節，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艦隊，也未嘗沒有與日本開戰的打算。

「遠在東三省事件爆發以前之一年夏間，吾等所已決定並且公佈之計劃，規定美國海軍每年須在加利福利亞海濱至夏威夷島之太平洋面舉行會操。在舉行此種會操時，美國艦隊必須開至夏威夷。東三省事件爆發後，不久吾人即討論，此項計劃是否需要改變一問題。但因此種會操，對日毫無威脅，乃人所共知之事實。故決定不停止舉行，自是，適值日軍攻擊上海之際，美國軍隊在二月十三日，開至夏威夷舉行循例會操。復經一度詳細考量後，決定是等艦隊，在會操

結束後，尤其仍留原處，不准離散或調回大西洋。在隨後紛擾不甯期間，而有是種決定，甚爲欣幸。」

那麼美國艦隊何以不調回大西洋呢？據史汀生的自白，大致如下：

「此時事變迭生，均表示日本政府完全爲軍人所操縱，軍人後面，則有日本人民之擁護，日本民衆又爲其所遇各種事變所興奮，而至於瘋狂之狀態。鑒於此等事實，日本企圖何種突變，殊不能言，斯年冬間，遠東之外國駐在觀察者向各本國報告，據彼等所知，目前情勢，確有是種可能性，即日本將對其鄰近之歐美領屬，實施襲擊，在此一情勢下，全部美國艦隊集中於夏威夷，能生安定局面之效，更屬無疑。蓋美國艦隊之所在地位，適處於任何南向香港安南或菲律賓襲擊爆發綫之側翼。故此大美國艦隊之集中，實爲表示素主和平之美國，最後軍事實力之有力警告。此種警告，任何一國，無論其如何狂妄，均不能漠然置之。」（遠東之危機）

史汀生對於認爲日本有進攻英美屬地之可能的輕率觀察，毫不加思索，即行接受，所以當時他

不單命令艦隊保護菲律賓羣島，甚至還要保護香港及安南。其實在日本方面，祇要英美不假武力實施經濟制裁，那麼決不會用兵力來攻擊外國屬地的。這樣看來，史汀生氏大概是相信經濟制裁一定可以實現。平心而論，史汀生何嘗不在那裏打算領導對日經濟制裁，來使日本受他壓迫呢？

但是史汀生的計畫，終歸失敗了。他不但受了模拉特的阻止，而且連平日相信可以共同對日實施經濟制裁的英國，也都表示拒絕。他關於這一點有下面一段的自述：

「對日經濟制裁之可能運用一問題，自上海戰爭發生以來，較諸前年秋間，在美更多討論及之。且此種制裁之可能性，已更臻實際。主張運用是種制裁之呼聲，現正在美流行，且得如哈佛大學校長羅偉爾(Lowell)與貝堪(Newton D. Baker)諸名流之聲援。國會現在開會期間，若干議員又提出議案，請求賦予總統採取是種壅動之權力。假如情勢之演進，一至於此，即令美國政府亦感有此必要，而建議與世界其餘各國，共同施行對日輸貨禁令。又如此議在援用九國公約後提出，則較由國聯單獨提出，余信更多為吾國國會所接受之機會。二月八日，余回總統陳

述援用九國公約一事。四日以前，當日本放棄其邀請四強調解之議時，吾等對其唐突之牒文，未予答覆。關於此點，總統認爲遺憾，蓋彼以爲應予某種答覆也。但余個人對於是種牒文之來往，非有日本某種新穎與建設性之答覆，決不願再作。二月八日，余即如是告總統。并謂現在余有一積極建議，即援用九國公約是。關於作此一援引之適時與重要，彼即表示同意，並謂一如吾國一月七日「不承認」照會之通知書，亦於此時提出，以爲該約簽字國所表示之一種適當的決心。二月九日，余邀英國大使至，告以余此種感覺，即爲對上海迄所發生之情勢，如聞北之無辜被炸，吳淞砲台之襲擊，表明世界輿論，集中世界之道德援助力量起見，當今援引九國公約，甚爲重要。并謂該約第七條，對於是種侵害中國主權與獨立之行動，似亦規定可作此一種聲明。當今時間，已甚急促，而日軍在滬每日準備另一大戰之動作，又爲顯然。二月十一日，總統乃命余以電話與英國外務大臣西摩爾直接商談，藉以促進此事之成就，同時亦可有最充分之時間討論此項建議，並確定英國政府是否願意合作一問題。余即於同日照辦。此時，西

門在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兩國在上海關於一切事宜之合作，進行極爲順利，且關於若干是等問題，彼此已以電話商洽。余向彼儘量解說，所以發動欲在九國公約下作此聯合動作之原因——闡明吾等立場之重要，及從中國余所接得之種種消息，此種消息，即關於二月八日路透社之報告中，所稱東京政府之建議將對中國有重大影響一事。余建議吾國政府與任一願意追隨吾等之其他簽字國，關於九國公約因日本上海舉動而受之打擊，根據該約第七條，作一聯合聲明，並說明吾等以該約簽字國資格，對於東京傳出廢棄該約之任何建議，不主張予以默認。次日，即二月十二日，在西門對此建議已有考量後，余又與彼通話。並於此日，余應其請，將余與國務部諸同仁擬定之聯合聲明草案，由電報遞達於彼，並說明此項初稿，可有盡量斟酌與修改餘地。該項建議，顯爲一應經英國內閣與首相討論之重大問題。西門爵士於次日，即二月十三日，首途返倫敦。余將此聲明書草案遞彼，俾彼在返國途中，反覆考量。大英帝國非僅爲九國公約簽字國，日亦爲從事會商此糾紛之國聯一會員國。由於此種事實所生之複雜問題，至

爲顯然；但國聯在前年秋間作初期談判時，已表示準備設法援助非戰公約，同時國聯會員國亦經與吾國內瓦公使，在非正式會談中，討論同時援引九國公約之可能性。故是等阻礙，似非不可逾越者。且當上述給西門之草案尙在擬定時，余仍顧及是等事實，對於尙在國聯受理中之中日現局，不作明文判定之語。因余曾向西門說明，此案主旨，在表明吾等之意向。即誠意遵守九國公約之規定，及尊重中國主權與完整。余於二月十三與十五日，復向倫敦與西門通話，討論此同一問題，最後，彼雖未明示拒絕，但以是等談話中彼之態度而言，余深信英國政府因其忖度中之種種原因——此種原因余雅不願欲探詢，或予批評——對加入此次聯合行動事，感覺躊躇。因是余亦不再向其催詢矣。英國之無意參加，顯將此次聯合行動之各種可能性抹煞。在此環境下，美國政府如再單獨向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遞送此牒，恐將仍遭如此之破壞聯合行動之答覆。余之計劃，因以夭折。先是余本擬即與法大使克勞特爾(Glandel)商酌此事，迨聞英國此種態度後，余亦作罷。』（遠東之危機）

英國方面既然連對於援用九國公約，發表共同聲明，都已拒絕，那麼對日經濟制裁，當然更不成問題了。史汀生自從此項計劃失敗後，非常懊惱，到二月二十二日，便發出寄給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的一件書函，同時也是美國單獨的聲明。

以後李頓調查團派到中日兩國，該團報告書，在公佈以前，曾送往美政府，當時史汀生因見內容大肆攻擊日本，高興異常。

不久十二月六日國聯大會以李頓報告書爲中心，討論解決中日兩國紛爭時候，史汀生以爲這次英國總該因爲起草報告書的團長李頓爵士關係，不能不與美國攜手。但是結果又很失望。當時西門外長的演說，內容對於日本很表同情，幾乎使人懷疑他在爲日本說話。

譬如觀察雜誌，那時有這樣一段的記載：

「西門爵士極爲松岡幫忙，他祇注意到李頓報告書中的一部分文字。在這一部分文字裏面，講的是紛爭複雜的性質，與中國的弱點。他關於滿洲的將來，曾言明恢復從前的原狀，決不是正

當解決的方法。』

松岡聽了西門爵士的演說，向人發表過下面的感想：

「西門爵士在十分鐘的時間裏面，就把這十天以來，我所用的半生不熟的英文辯解的意思，都簡單明瞭的傳達出來了。」（一九三三年觀察雜誌）

英國政府不僅讓史汀生的援用九國公約失敗，而且在國聯大會席上，西門外長尙偏袒日本。所以引起美國輿論的激昂，及史汀生本人對英的反感。結果美國集中太平洋的艦隊，一部分調回大西洋方面，暗中向英國示威。

關於這件事情，美國新聞記者楊克在他的著書「強盛的美國」裏面，曾經有這樣一段記載：

「滿洲事變發展成爲上海事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即向英國提議共同制裁日本，然而素日主張排美親日的西門外長，竟加以拒絕，而欲釀成日美的紛爭，由英國來從中取利。後來到了九三四年，在倫敦開海軍豫備會議時，日本要求超過從來的造艦比率，而英國又表同情日本，

主張須要給日本面目，在這種情形之下，表面上反對日本的，好像祇有美國，所以一切的責任，都須由美國單獨的負擔了。排美的行動，既是這樣明顯，那麼美國政府，當然不能坐視，因此祇得對於當時集中太平洋的美國艦隊，發出開回一部分到大西洋的命令。並且暗示將來看英國態度如何，或者決定這一部分艦隊永久停留在大西洋，也未可知。當時這種暗示的意思，自然不外表示如果英國始終抱着親日的態度，而維持中立，那麼美國便決心對抗，縱然將來在中國或太平洋方面，英國的利益受到日本威脅，那時美國則決不過問，而祇能保護本身的利益了。

看到這般情形，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自治邦，可不必說，連南非聯邦，也都驚慌起來。於是他們一致對於西門外長的親日政策，發生懷疑，屢次向外長質問。這在他們，當然不無原因。因為如果照西門的親日政策繼續下去，將來萬一遇到事件發生，得不到英國本國的援助時候，那麼便無法再求美國援助了。

不久倫敦當局漸有覺悟，知道將來抑制日本，無論如何也須得美國援助。因此倫敦方面的政策，立刻轉變，結果仍不得不與美國攜手，共同壓制日本海軍要求均勢，及反對日本華北出兵。這時美國的艦隊，又集中到太平洋方面，一九三五年美國海軍及空軍的聯合演習，所以能够實施，都因為英國給了這樣的保障的關係。」

如上所述，從滿洲事變到上海事件的過程中，美國始終是同情中國，積極壓迫日本，不僅經濟制裁，甚至決心與日本戰爭。所以當時竭力的聯絡英國，打算拿英美兩國的力量來打倒日本。不過英國覺得史汀生的辦法，不免過於冒險，所以不得不加以拒絕。其實英國又何嘗不願與美國攜手，祇因美國的辦法過於激烈，所以總婉言拒絕了。

但是英國的拒絕美國，並不完全由於英國的自動。那時日本對英外交的成功，當然也算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

事實上，我國（日本）當時的駐英大使松平與西門外長，是唯一無二的好友，同時松平夫人與

西門夫人，也特別的要好。因爲這種關係，由英國外長，便間接的影響到英國的對美態度。況且當時我國派往日內瓦的佐藤大使，一方面拿出武士道的外交精神，啓發外國的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在他部下工作的少壯外交官等，當時又都發揮了他們很有效的活動。

那時在外從事活動的精明老練的外交官們，最擔憂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軍隊或者會乘勝進攻南京，如果事實這樣，那麼英國便恐怕不能再保守沉默，結果要與美國聯合起來，共同對日作戰，而使日本成爲世界公敵了。由於這樣見地，他們不斷電請政府注意。我國軍隊在擊敗中國軍隊之後，所以仍然退回上海原防，也就是因爲有這些深謀遠慮的外交官們建議的緣故。

這樣看來，在對英外交上，的確是日本的勝利，而中國失敗了。所以蔣氏所希望的「由全世界聯合起來共同打倒日本，中國乘機收回滿洲」的一件事，結果也就不能實現了。因此中國的失敗，可說完全是由於對英外交的失敗，換句話說，也就是因爲英國拒絕與美國合作的緣故。

不過這種失敗，却給了蔣氏一個反省的機會。從這以後，每次辦理中日外交，都是日本失敗。

這種原因，也未嘗不是因爲英國現在幫助中國，而妨害日本所致。照這樣看來，也可說蔣氏在五年以後，辦理南京交涉的時候，報復了五年前「滿洲」事件時候的仇恨。

(二)自力更生

在滿洲事件及上海事件發生的時候，飽嘗艱難困苦的蔣氏，到現在又開始感覺到外國的力量，連美國也都不可靠了。何以美國也不可靠呢？這次美國對於中國再三要求的和緩實行白銀政策時候，竟斷然拒絕不聽了。

繼史汀生時代的胡佛總統的後任，是如今民主黨的羅斯佛總統。羅斯佛的對華政策，向來採取靜觀主義，決不照史汀生那樣的過激，而同時這也是表現民主黨在外交上的特色。

羅斯佛總統就職以後，便開始實行新政策，以救濟當時美國空前的經濟恐慌。在他的新政策裏面，公佈有銀立法，禁止白銀輸出法，白銀國有法等，用來提高白銀價格。由於這種銀價提高的結果，首先受到影響而遭很大不幸的却是中國。中國雖是銀本位的國家，但國內並不產銀，每年皆需

要大宗的白銀輸入。因為美國方面的銀價提高，中國的銀價不單上漲，而且引起白銀外流的現象。同時由於銀本位的關係，國內物價，將繼續下跌。那麼這時在中國方面所受到的害處，第一自然是物價下跌，惹起生產事業的不景氣。其次刺戟輸入，使貿易收支入超。第三釀成投機事業者輸出白銀，加深通貨收縮的傾向，這樣，最後必然的要發生一種異常的恐慌。

南京政府平日的財政本來就很困難，自從白銀問題發生以後，更感到難以維持了。於是南京政府命令駐美大使施肇基氏，向美國提出抗議通牒，但美國政府因為不能隨便改變政策，結果加以拒絕了。因此，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自籌應付辦法。到這時候，蔣氏更痛感到從來的他力主義幻滅的悲哀了。

所謂「自力更生」，換言之，也就是國力的涵養。為涵養國力，首先要消滅破壞統一的赤禍。因此再三考慮之後，便決心一方面要從事討伐共軍。另一方面，盡力團結全國武力，改革地方政治，建設各種生產事業，充實軍備，指導國民的新生活運動及經濟建設，促進將來中國國民向健全

的方面發展。

從這以後，譬如從前剝削農民的地方上一部分的苛捐雜稅，都漸被廢除，同時禁吸毒品政策，亦著成效。尤其交通事業，最有發展，至於航空路線，則較日本，還要發達。最近日本每年輸出各種建設材料，供給中國，可見在經濟的建設上面，國際間並無所謂敵友的區別。同時由此亦可見中國最近在建設上面，是何等努力！

關於自力更生的主張，蔣介石氏在五秩生辰時候，對於國民發表的訓示如下：

（天下事，安危禍福，罔非自致，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

「事在人爲，察往知來，理有可信，是以中正於此，不能不爲吾同胞同志進而闡論國家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先哲有言「國豎於家」，故家庭興廢之理，可通於國，國之盛衰靡常，正猶家之興廢無定，其或不勝摧折，而終於敗亡，或蹶然興起，以自致富強，則悉視其國民之覺悟及努力與否以爲斷。中外古今，事無二致，而近百年間，新興諸邦艱苦復興之史蹟，尤足爲吾人今

日之模楷。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亦無徒勞而不獲之耕耘，唯貴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可以突破之理。以中正所躬自體驗驗言，吾家當中正幼時，孤弱艱危，可云至多，然而豪強之侵逼，能陷吾母子於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節，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之途徑，則知天下事安危禍福，罔非自致，而轉弱爲強，必資自力明矣。」

（一時危難衰弱不足懼，國家再建自家始）

「吾國自十四年國父孫先生崩殂以後，內外交迫，禍亂相乘，始則赤焰蔽天，黨國屢危，繼則外侮頻仍，東北淪陷，其間疑懼交作，謗讟叢生，民命國脈，朝不保夕者，蓋十有餘年矣。其情勢之危急淒厲，實較中正九歲喪父時童昏無知，孤寡失倚者爲尤甚。然中正猶以爲一時之艱危不足憂，公理之消沉不足懼，國力之薄弱亦不足患，而存亡興廢所繫，惟問吾國民有無勵精知恥刻苦自強之決心，苟吾同胞皆能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報國，則國家之轉危爲安，必可計日以待，而吾全國諸姊妹咸能致力以持家教子，知禮明義，則於國家民族富強康樂之關

係爲尤大也。以中正個人之身世而論，自孤幼以至今日，其獲益於賢母之家教，與良妻之內助者，殊非淺鮮。苟吾全國二萬萬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爲人子者，皆能保衛其國，豈有不能致華夏於復興之理。蓋無論國家與個人，所以競立於斯世；其道不外乎自立自助與自強。唯自立乃有以自存，惟自助始可得人助。而國家當衰微危弱之際，爲國民者尤當察所處環境之險惡，明自身地位之孤弱，勿懼於強暴以餒其氣，勿狃於急效而亂其心，是則刻苦自強之義，更爲復興建國之要圖，所當無間始終，一以精誠貫徹之者也，唯吾先民之教，以孝爲先，總理嘗語，吾人以中國立國自有其道，不可徒效外國之皮毛，更不可抄襲帝國主義者之霸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而孝道尤爲總理遺教所特重」。

（必須知恥雪辱，然後人始不得亡我）

「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爲先，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當發揚光大

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吾父母之隕越之羞。以我民族歷史文化之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誠使我同胞人人有「恥不若人」之覺悟，而昕夕惕勵於雪恥圖強之一念，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則不辱之義，庶乎得之。」

其次，蔣氏努力於充實軍備，關於現下中國軍備改善的情況，最近我國（日本）陸軍省發行的陸軍軍備的充實及其精神，記載甚詳，茲特引用於后：

「中國軍隊原爲軍閥之私兵，并非歸於統一。尤其外蒙，新疆，西藏等地，夙在獨立或半獨立狀態中，至其他地方軍閥則在反中央意識下，密謀保存，擴張自己勢力者，亦不在少數。故對於中國軍隊，倘率然視之爲近代國家之有組織的國防軍，并不適當。惟自蔣介石氏最近統一工作之成功，反中央軍閥概已失脚或被遺棄，就現況而言，各軍隊已逐次歸屬中央，漸具國軍之體裁矣。」

中國軍隊總數約二百餘師，計二百餘萬人。由於各軍隊之中央化，已漸可指揮其大部分對外作

戰，關於此點，吾人不能不加以考慮。且此等軍隊近時在外國教官指導之下，改善訓練與設備，因之正逐漸更換面目，此種事實與南京政府最近之對日動向平行並進，爲國防上不容輕視者。

又關於航空兵力之充實，有鑑於滿洲，上海事變，而標揭「航空救國」口號，在美國等國援助下，正在極力擴充。中央所轄空軍在上海事變當時，陸上機七隊，水上機一隊，合計不過百架。事變中甚且逃避遠方，倖逸覆滅。唯爾來蔣介石氏銳意刷新空軍，一心培養國民之航空熱，而美國亦乘機與南京政府提攜，樹立航空三年計劃，首先改編陸上七隊爲三隊，集中餘力於杭州航空學校，重新訓練空中勤務，同時以該地爲空軍擴張之根據地。其後努力於充實內容，加以最近改編廣東空軍之結果，現已具有十四隊八五架上下（其中以自美國購入者爲主，然最近意國勢力之侵入亦甚顯著）。此等飛行隊集中其主力於南昌，并配置一部分於西安，成都，漢口等要地。另在杭州（學生約四百人）洛陽（學生三百人）設立航空學校，施行

關於操縱，修理之教育。

現在飛機數：

戰鬥機

一七〇

中央

爆擊機

三三五

偵察機

二八〇

廣西

七〇

計

八五五

南京政府在去年（一九三六年）九月於一般作戰計劃中，擬定對日防禦作戰計劃，不特中國全土實施大規模防禦工作，（這種工作主要在開封、海州、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并同時對青年學生普及軍事訓練與防空思想，在軍隊內實施對日作戰準備教育。

要之，對於今日之中國，倘以南京政府為中心而加以考察，未必一如往昔，在國防上為無能力

者，吾人必須自國防觀點上，對之再檢討，再認識。」

現在中國已經復興起來了。這的確是中國的實際情形。那麼誰是復興中國的最高領袖呢？不用說是蔣介石氏了。

第十五章 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一) 新生活運動

「凡在路上吐痰者，罰金十元。」

現在中國有這樣驚奇的警察命令。

「女子不准剪髮……禁止燙髮。」

這也是近來中國警察的命令。

在中國報紙上面，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因違反上述規則而受處罰者，幾乎日有所

聞。

對於從來喜歡偷閒苟安的中國民衆，這種規則，也實在值得驚訝。固然在像中國那般廣大的國家裏，一切的法規，本不容易徹底實行，如果要能够徹底實行，非等待中國完全統一之後不可。國民政府當局雖明知這種困難，但因為蔣氏的堅決主張，所以纔運用法規的力量，來督促全體國民實行。

不久果然發生了效果。江西省的南昌，湖北省的武昌漢口，江蘇省的南京上海，浙江省的甯波杭州，較遠的河南洛陽，從河北省的北平，到極南方的廣東，福建的各大都市，街道上都一天一天的清潔起來，民衆的顏面，也比較的清爽起來，路上再很少有人吐痰，而同時行人也都知道注意往左邊走了。看到這般現象，最覺得驚訝的是外國人，尤其是知道過去中國情形的外國人。因為在五年前，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現象。

當然，中國現在所以進步到這種程度的原因很多。如果把我們的眼界放遠些，也可以看出這是

因爲近年中華民國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們在文化上有了很大進步的結果。這些青年的進步，實在是使街道清潔化的最大原因。中國的向上及進步，在不知不覺裏面，將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都「摩登」化起來了。

不過在這些事實的背後，却有一個極大的動力。這個動力就是所謂「新生活運動」。至於發起新生活的人，則又是蔣介石氏。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蔣介石氏在南昌行營召集民衆，初次發表了他的新生活運動的內容及方法。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在實行中國固有的道德，所謂禮義廉恥，特別要把這種道德應用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上面，所以今後的中國人民便必須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等習慣，以及一致的遵守秩序，注重組織，盡責任，崇尚紀律。而且到必要的時候，尚須爲國家民族犧牲自己，及盡忠報國。

他在『新生活綱要』裏面，關於這個運動的宗旨，目的，內容，方法，都說得很詳盡。現在介

紹其一部分的內容如下：

（新生活運動之主旨）

『新生活運動者，我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爲非人的生活者，厥爲「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我中華民國有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住行之資源，本極豐富；時至今日，反多爭盜竊乞之現象，而不免流爲非人的生活者，厥爲「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新生活運動之認識）

『人民生活之滿足，固有賴於政治之教、養、衛各種制度之盡善推行；但政治上各種制度之推行，與社會風俗習慣之關係，至爲密切，每當舊制度崩潰，新制度代興之時，苟不知提倡與其

新制度相適應之風氣，以爲推行之助，則新制度每爲之紆迴顛蹶，末由展其效能。……故新生活運動之推行，端賴國民人人之自覺其需要。發乎己，應乎人，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能修其身，所以立一家之風；能治其家，所以立一鄉之風；與政教相輔而行，而常在政教之先。與政教相得益彰，然不賴政教之力而始著者也。」

（新生活運動之目的）

『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爲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僞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貧者則卑污混亂。其結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與抗，人禍不能弭，內憂洊至，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若長此不變，則雖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故欲繁衍我羣衆之生命，保障我社會之生存，發展我國民之生計，非將上述各種病

態，掃除而廓清之，並易之以合理的新生活不爲功。」

（新生活運動之內容）

「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故「禮義廉恥」者，乃發民德以成民事，爲待人，處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規律，違反此規律者，無論其個人，國家，與民族，未有不爲之敗亡者……。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爲，能以此三律爲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爲的表現，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爲。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爲。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者，皆不得謂義。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爲是，此之謂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念，恆有過與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實。有切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滄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義廉恥之解釋，既如上述。可知

「恥」是行爲之動機。

「廉」是行爲之嚮導。

「義」是行爲之履踐。

「禮」是行爲之表現。

四者相連貫，發於恥，明於廉，行於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缺一不可。』

看了以上蔣氏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下列的事實，完全是中國的實情。

中華民國的各階級，從來不曾有過緊張的生活，全體人民可說都是極其鬆懈的，無所謂向上或

進步。總而言之，這是一種「馬馬虎虎主義」。什麼是馬馬虎虎呢？牠的意思與「模模糊糊」差不多，所以也就是所謂糊糊塗塗的過着生活罷了。

就是在五年甚至十年以前，這樣「馬馬虎虎主義」，幾乎完全支配着中國的民心，他們都不知道明天怎樣，無所謂將來的生活。不過在這時候，外國勢力侵入國內，經濟及產業，發生很大的變革，同時交通發達的結果，已漸漸不容許那樣安閑無爲的生活。凡是迷戀着安逸的人，都很快的變成生活的落伍者，流落而爲毫無生計的人。

在這樣全國國民須要根本改革生活的急迫的空氣裏面，突然出現的就是如今「新生活運動」。照這種運動，自然立刻會成爲中國國民仰望的一綫光明了。

從表面上看來，新生活運動好像非常平凡，不過這個運動的根本目的，決不祇是改善方法，牠最後的目標，是在以下三點。

(一)爲使生活高尚，新生活運動要求「藝術化」。

(二)爲使國民生活可以富裕，新生活運動要求「生產化」。

(三)爲鞏固國民生活，新生活運動要求「軍事化」。

對於以上這種藝術化，生產化及軍事化，統稱爲「三化」。這種最後的目的，也可說是生活的合理化，等到這三種生活革命完成以後，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纔能算穩定。

近十年來，中華民國國民，幾乎是同心戮力，對着一個大目標在往前進。這個目標是什麼呢？不用說，是中華民國的統一，然而如何纔可以統一呢？這種方法，實在很複雜多歧。

第一，照目前中國客觀的情勢，外國勢力已侵進中國，政府無論舉辦何種事業，均要受到條約的束縛。

第二，自古以來的封建思想及舊習慣，很難吸收新的文化。因此受過新科學洗禮的青年們，等到把自己的所學用於實際時，便立刻會感覺到幻滅的悲哀。

第三，新制度及新組織，皆尙未成熟。因此一知半解的人們，到處的拔區，假冒的事情，不知

有多少，至於真正的「摩登主義」，則反被人排擠。在上海的街上，那些摩登少年及摩登少女，盡都是派頭十足，但是如果對他們的知識考察一下，那便要令人覺得十分可憐，所以有人稱這種現象爲「知識的貧困」。中國的封建制度，雖從百年以前，就受了產業革命的洗禮，失掉權威，並且目前前的中國不斷輸入機械，手工業都漸漸的變成機械工業，但是不幸得很，新的近代精神，在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成熟。

在這種場合之下，社會上自然要呈現一種極複雜的現象。今日中國的情形，也就是如此。中華民國自從誕生以來，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目前可說是轉變的時期，或者說是哈動的時代。所以在這時候，一般國民發起各種的維新運動，新生活運動，也就是其中之一。新生活運動由蔣介石氏首先提倡，然後國民政府以次的各省及各市的當局，均作爲先驅，從政府的官吏開始實行，爲人民做出模範後，再漸次的使民衆實行，所以到現在已成爲全國的一大運動了。

據一九三六年的「申報年鑑」，現在中國新生活的三化（軍事，生產，藝術化）運動，已推行

得很有效，譬如一九三五年四月爲實行新生活運動起見，成立了一個强有力的團體。這個團體的名稱爲「新生活勞動服務團」，這個服務團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的軍隊，憲兵警察，教員，學生，黨務，政務，軍事各機關以及婦女界與各社會團體裏面，皆已成立。會員的人數，聞不下十數萬人。

關於實行的具體方法，共規定有二十一項，即：

- (1) 守時間
- (2) 使民衆認識簡易的文字
- (3) 半工半讀
- (4) 獎勵運動
- (5) 提倡社會教育
- (6) 社會衛生運動
- (7) 產業合作運動

(8) 促進保甲制度

(9) 利用廢物

(10) 協力調查戶口

(11) 協力警察搜查

(12) 開渠築堤

(13) 修道補路

(14) 造林及愛護山林

(15) 國貨運動

(16) 保險貯金

(17) 救濟老弱及殘廢病人

(18) 預防及救濟饑饉災害

(19) 禁吸毒品，禁止賭博

(20) 獎勵防空及防空運動

(21) 提倡科學

以上各事，均按照各地實際的情形推進。往年中國民衆生活，大多沒有目標及目的。現在自從有了這二十一項的目標，將來勢必可以喚醒民衆的團結。

蔣介石氏不僅是一位軍人，也不僅是一位行政家。他可以用極平凡的手段，提倡社會運動，亦即新生活運動，使人人都容易理解，而且可以實行。

(二)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最近蔣氏更由新生活運動，進一步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的國慶日發表了一篇關於這種運動的演說。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所負的使命，在根本改造國民的生活，使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至其目的則在

「盡人力，闢地利，均需求，暢流通，以使國民經濟健全的發達。」

這種運動的方法，分爲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在積極方面的有：

(a) 增加生產

(b) 解決失業問題

(c) 振興輸出

(d) 保障投資的安全，以促進生產活動

在消極方面的有：

(a) 除去生產發展的障礙

(b) 除去改良經濟方法及人才缺乏的原因

(c) 除去交通，金融，運輸的障礙

(d) 除去迷信，保守，愚昧等心理，並排除勞動習慣的缺乏及浪費等

上面這種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在各方面皆漸漸發生效果。照這樣運動，如果真正實行下去，那麼中華民國必定可以很快的近代化起來。所以我們要理解現代的中華民國，抑或檢討蔣介石氏，對於這個運動，須要特別的注意。

(三) 如何救國？

——復興民族的基本方法——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蔣氏在南昌行營，向民衆演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又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旦那天，蔣氏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對民衆講演「應如何救國」。這篇演講的內容，包括新生活運動，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兩大基本問題，可說是完全代表蔣氏在建設上的一貫思想。因此我們爲要理解近年的蔣氏，這篇演講實在是極有價值的材料，茲將其原文介紹於後：

（危急存亡之秋）

全國同胞諸君！

全國同胞！今天是我们民國二十五年元旦，我們全體同胞大家歡欣鼓舞同聲慶祝的一天，現在兄弟雖然不能親自和各位見面，但是可以在廣播電台中親自和各位說話，這是很可快慰的一件事情。現在兄弟藉此機會，將我們國家和全體同胞今年最緊要的工作和各位同胞說一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的情勢，現在很危險急迫，時時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但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完全是由我們全體同胞自己來決定的，我們要挽救四萬萬同胞所共有的中華民國，要復興歷史文化最悠久最光榮的中華民族，我相信一定是有方法的，這種方法並非其他，就是在我們中華民國本身的努力，換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四萬萬同胞的身上，就是要我們全國國民個個人能夠努力自強。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大家既知國家民族如此危急，

無論那一個人都應該拿這兩句格言策勵自己，明白本分，負起責任，一心一德，羣策羣力，堅

定志向，團結精神，共同一致的向救國救民的目標奮勇前進。要曉得我們救國家，也並不是怎麼樣困難的事情，只要大家就本身所能做到的事情，能够自強不息的努力去做，我相信我們國家無論如何危急，在今年一年以內就可以挽救過來，便能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轉禍爲福。我們知道，無論那一個國家，當她要從新建立起來，或是那一個民族，當她要努力復興起來的時候，一定要遭受很大的禍害，遇到很大的危險。反轉來說，一個龐大的國家和積弱的民族，如果遭遇到很多的禍害和很大的危險，他決不會真正覺悟奮發，從而自強復興。所以我們國家民族，現在雖然受空前的禍害，遇着莫大的危險，不僅不必悲觀，不必憂慮，而且我們看到外來的禍害愈多，當前的危險愈大，就可以斷言，我們國家民族復興的機會愈快。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都是這個意思。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來最悠久的光榮歷史，有四千萬方里的錦繡山河，更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四萬萬同胞，你看現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比得上我們的偉大，只要我們全體國民都能堅

定民族的自信力，真正自立自強，還怕什麼？還憂什麼？我們國家一定可以轉救，民族一定可以復興，而且就從今年可以復興。

（新生活運動）

今後我們應該如何自強自立，或者就說今後救亡復興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所說的，只要大家將本身所能做到的事情，切切實實做好，就是自強自立，亦即救亡復興之道。最要緊基本的一點，就是兩年以來，大家所知並且大家都在努力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就是要使我們全國同胞都能恢復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禮義廉恥，而首先實現於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習慣之中，使我們的國民，個個人隨時隨地都能明禮義，知廉恥，不再做一件悖禮違義寡廉鮮恥的事情，而以禮義廉恥來樹立我們自己和整個國家民族的人格，洗刷我們各個人和整個國家民族過去一切的恥辱。我們一個人必須有高尚自立的人格，才有現代國家的資格，不愧為一個現代的國民，國民也必須有尊榮獨立人格，才有現代國家的資格，不愧為

一個現代的國家。無論個人或國家，只要自己的真實的人格能够樹立起來，那一個人也不敢來欺侮我們，那一國家也不敢來侵略我們。否則，不僅人家要欺壓我們，侵略我們，而且要滅亡我們，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要想人家不欺侮，不壓迫，不侵略我們，惟有大家自己勉勵自己，各人努力，樹立現代國民的人格，即所以共同努力樹立我們國家的人格。而其基本的努力，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實爲古今中外一切文明國家的國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所以我們全國同胞務必時時刻刻牢記「明禮義知廉恥」這兩句話，並且身體而力行之。從前所有一切紛亂散漫，苟且偷惰，驕奢淫佚，自私自利，萎靡不振，麻木不仁之腐敗的生活習性，都要一掃而空，剷除淨盡，不好再和從前一樣糊塗塗塗做一個落伍的野蠻時代的人，而要以「昨死今生」的決心，除舊布新，實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做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新國民，我們大家既成爲現代的新國民，當然可以建立現代文明強盛的新國家，當然可以和人

家並駕齊驅，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

由上所述，可知新生活運動，就是使全國國民樹立人格，以復興民族之革心的運動。所謂新生活，乃是以「禮義廉恥」的精神爲根據，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爲原則之合理的生活。我們是要從日常實際生活之中，實實在在來完成道德精神的修養。希望全國同胞，要依此目標，努力不懈。古人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說在我們思想上，精神上，生活上，要掃除舊染的一切污點，使能煥然一新，從而繼續不斷的求其一天一天的更新起來，以養成最高尚的精神和人格。講到這裏，我要順便告訴各位同胞，我們要實行「新」生活所謂「新」和現在一般人所謂「摩登」或「時髦」是絕對不同的。我們要實行新生活，絕對不是要求所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一切物質上的享受要新奇，而是要不斷的澈底改良我們行生活，習慣，行動等等，使我們思想道德，精神和人格「日新又新」，造成社會和全國明禮尚義，守廉知恥之新的風氣。這種風氣，一旦養成，就可以建立新的社會。有了新的社會，自然就可以建立成新的

國家。如此新的國家，才是真正文明強盛的現代國家。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們再可以從正面的意思來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人家那怕是很小的國家，因為能够明禮義，知廉恥，所以只要很短的期間，便可以由貧弱轉為富強，以至雄視於全世界。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多的同胞，更加以這樣悠久光榮的歷史，與優美偉大的文化，而且我們的民族聰明才力，比人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能復張四維，那裏還有不能立即使國家臻於富強的道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一致實行新生活，人人做成現代的國民，使社會國家的風氣，一天新一天，一天進步一天，我們當然很容易的建立文明強盛的新國家，所以實行新生活就是我們全體同胞自救救國的根本大道。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其次，除新生活運動以外，還有一件自救救國最要緊的事情。我們大家務必從今天開始特別努力來做的是什麼呢？就是兄弟去年所提出來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這個運動，一定要和新

生活運動同時並行，相輔而行。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是要改良國民的生活習慣，從而增進國民的道德，發揚民族的精神，以改善國民的精神生活，而完成國家精神的建設。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的是要發揮國民勞動創造的能力，增加國民生活的資料，從而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完成國家物質的建設。精神和物質兩種建設，是互相關連，互相影響，互相助成的，偏廢其一則但難成功，同時並進則事半功倍。所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必須相輔而行，亦必然相得益彰。我們既以新生活運動來奠定國家道德精神的基礎，同時再要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來完成國家經濟建設，促成物質文明的進步，才能够使國家健全發展，也才能救起國家，復興民族，因此希望全國同胞個人要時時刻刻的記着，這兩種運動，就是當前自救，救國最緊要的中心工作，大家要同心協力自強不息的努力實行。我相信一定可以由此實現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完成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大業。

各位同胞要曉得，我們要救國家就要革命，革命就是要實現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以「民生」

爲中心，民生的基礎是什麼？就是經濟。如果經濟不能發達，民生便無法改善，民生不能改善，三民主義便不能實行。所以我的要救國，要實現三民主義，一定先要努力國民經濟的建設，以改善民生。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就是我們全國國民努力國民經濟建設的基本途徑，希望我們全國國民一致努力，現在我再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實施要項和方法，和大家說一說。

第一，振興農業。我們中國向來是以農立國，國民的生活，國家的生存，都在以農業爲根基，所以我們要從事經濟的建設，第一件緊要的工作，就是振興農業。振興的方法，就是要採用農村合作的辦法，由合作社指導，並改進製肥選種，改良農作方法，活潑農村金融，流暢農產運銷，來努力增加農業生產，以達到糧食自給自足爲初步目標，統使全國國民一切日常生活資料，不必再向外國購買，以塞漏卮，而免國計民生日趨凋敝。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一方面要增加農業原料的生產量，以作發展民族工業的基礎，同時要提倡就地加工製造，使能廉價供給本地的需要，更可以減少運費，供給各地。

第二，鼓勵墾牧。土地是一切資料國產的根源，要發達生產，首須「地盡其利。」所以一切公私荒地，務必盡量開墾，對於地廣人稀的地方，更要鼓勵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和經營畜牧，並且要施行軍區屯墾制，利用集團的勞力，大規模的開發種種的農利。此外更須恢復並增進農村的副產，例如家畜，園藝，漁利……之類，應竭力使能同時改良品質增加產量。

第三，開發礦產。總理說：「礦業爲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之極大主因。」幾十年來我們中國物質文明和經濟建設之所以不能進步，礦業未能發達，當無是直接的最大的一個原因。過去因爲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種種的阻礙，礦業可說是一事無成。以後政府必須採用積極的保護和獎勵政策，調查礦業狀況，以及除去摧殘束縛礦業發展的原因，改善關於礦業的各種法規。總以減輕負擔，便利開採，鼓勵礦業投資，扶助礦商之獨立經營和自由發展爲主要目的。更當禁止地方政府與任何特殊勢力把持礦權，與民爭利。並且因爲我們國家的資力不够，應當歡迎外國投資，共同發展中國的礦業。如此，一方面既可容納大量的勞力，解決同胞失業的問題，

同時便可以開發富源，促成物質文明的進步。

第四，提倡徵工。徵工就是實行民國勞動服務，以從事於國民經濟建設的一個最急要的辦法。現在我們國家貧窮，沒有充分的財力來完成各種建設事業，好在我國的同胞很多，同胞的勞力，就是國家最可寶貴的經濟動力，亦即一切建設事業的資本。只要我們全國同胞能竭盡所能來勞動，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國利民，自救救國的新建設事業，盡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古人所謂「以勞教民富」，又說：「憂勞興國」，與我們所謂勞動服務，完全是一個道理。希望全國同胞，共體此意，大家贊助政府實施徵工制度，踴躍參加義務勞動，至少總要能以當地同胞的努力，首先從事當地開發交通，修治水利，培植森林，開墾荒地。這一類經濟建設的根本工作，除徵工制度以外，政府方面應同時實行兵工政策，以軍隊的勞力，補助各地徵工工務之不足。我們相信各地的一切建設事業，如得軍隊的幫助，一定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促進工業。工業如不能發展，物質文明便不能進步，經濟生活便不能美滿。所以除極力

促進農林鑛業之外，最要緊的，更須極力謀工業的發達。我們中國舊式的手工業，既已凋敝，新式的機械工業，因為受外國的經濟壓迫，也至今不能發達起來。現在要謀起衰，振敝，富民，裕民的辦法，一方面對農村簡易的工業，及農產品加工製造的簡單工業提倡。就農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統經營，以謀農工之密切連貫。交通發展。一面對於一般工業，由政府分別保護和獎勵，以求全國之工業品自給自足，同時必須設立勞資調節的機關，公平調處勞資雙方一切糾紛，增雙方的利益。這種機關，一定要予以最後強制執行之權，藉以保障企業的安全和勞動者的工作。

第六，調節消費。在我們這樣生產薄弱，一切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各種生活資料異常缺乏，大半都要仰給於外國。因此造成農村資金集中都市，再轉流外國之經濟上的敗血症。以致農村經濟瀕於破產，一切產業，同時凋敝，國家日益貧困。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補救之法，惟有標本兼治。一方面固然在積極方面以最大的努力，從根本上增進國民生產的能力，發達全國生

產事業。同時更要在消極方面以最大的努力盡量節約消費，調劑供求。各位同胞要知道節約消費，只在我們大家一轉念之間，就可以做到，比較增加生產要容易得多。但是這件事對於救國的功效，却與增加生產相等。如此輕而易舉，切實有效的事，我們怎麼好不努力實行呢？總之，以後我總要節約消費，調劑供求，防止內地與農村資金的耗溢，進一步達到對外貿易輸出入的平衡。

第七，流暢貨運。流暢貨運的基本條件，在交通便利。所以我們要盡量發展全國各地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的辦法。同時又要在各重要地區設立主要農產品如棉，麥，米，絲茶等公共倉庫和運銷機關，以便屯積和轉運。

第八，調轉金融。金融為經濟的命脈，金融如失其正常狀態，一切產業都要蒙受惡劣的影響。所以調節金融是國民經濟建設，最根本最緊要的一項事情。講到調整金融的方法，在於鼓勵民間的儲蓄，活潑資金的融通。因應時代環境的要求，由政府執行健全的貨幣政策，全國國民要

絕對信任政府，一致擁護實行。

（不實行即不能成功）

以上八項，就是國民經濟建設建動的主要工作。其中有很多都是很簡明切實，輕而易舉的事情。無論那一個人都能做，如果全國國民能够共同一致，依照這些道理實實在在去做，我相信不謹我們各人自己的生活可以因此趨於安定，而且整個經濟的國難，也可以迅速突破，使國家日趨於正富強之域。否則國民經濟無由建設，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大家只有一天天的貧困，甚至多數國民弄得饑寒交迫，生活不能安定，那末社會國家就只有更加紛亂危險，不能得救了。所以大家要深切認識，這種運動是當前自救救國最緊要的一件工作。從今天起，要一致奮發，努力實行，同時要擁護並督促政府竭力實做，如此我們國家就可以由這幾項基本工作，立即挽救起來。大家總要曉得，我們的聰明才力和外國人一樣健全，而我們的人口比那一國都多，他們做五年十年的事情，我們如果同心協力，一年就可以做成功。所以我們不怕國家怎樣貧弱，

怎樣危險，只怕自己有了聰明的腦筋，和偉大的力量，而不肯用，不知道怎樣發揮。只怕我們的同胞仍舊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不明白自己的責任，不盡自己的義務，不守紀律，不能合羣，尤其是對於一切事情，不能實實在在來「做」。不做，當然什麼事也不會成功，能做，我想世界上就沒有什麼真正難的事情。

現在國家已經到了這樣危急存亡的地步，我們要能自救救國，惟有我們四萬萬同胞，一方面能實行新生活運動，使個個人成爲現代的國民，以建設國家精神的基礎，一方面更要羣策羣力，來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使個個人盡到運動的義務，發揮民族生產的能力，建設國家物質的基礎。如此心物並重，使用兼備的兩種運動。就是實行三民主義最重要的方法。也就是我們全國同胞自救救國最切實的要道。

第十六章 調整中日國交

(一) 敵乎？友乎？

「滿洲」事變正告一段落的時候，中國對於日本的態度，非常強硬。當時因爲敵意很深，所以遇事皆與日本衝突，絲毫談不到妥協。

然而後來因爲依賴外力主義的失敗，纔漸漸覺悟要抵抗外侮，先必須涵養國力，於是發生對日如何處置的問題

自力更生，無論如何困難，皆須進行，但是這種更生，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如果在更生的途中，萬一與日本發生衝突，那麼過去努力的結果，也都要歸爲烏有了。所以中國的立場，必須先與日本妥協，然後才能從容涵養國力。雖說暫時放棄收復失地與滿洲問題，並非心願，但這時除此之外，也實在別無良策。

上面所講的可說是蔣氏的意思，同時也是在南京政府內部醞釀的一種空氣。到一九三四年的夏天，這種調整中日關係的空氣，便愈加濃厚了。

該年八月，蔣介石氏，汪兆銘氏，黃郛氏同往廬山開會，當時檢討對日外交方針的結果，都覺得在外交上全面的轉換，由於過去的種種關係，固屬困難，但是照實際情形看來，中日關係的一部分調整，此時實爲必要。

不過蔣氏仍然覺得在表明親日態度以前，先必須鞏固內部，與防止反對派的蠢動。否則，一旦表明親日，因此或將發生於己非常不利的事情，亦未可知。

恰巧到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討共的軍事頗有進展，江西貴州雲南等省，逐漸平定，同時半獨立的西南派的聲勢，也顯見衰落，尤其是廣東一派，因爲知道勢力不敵中央，態度漸漸的好轉了。

就是在華北方面，自從蔣氏巡遊之後，統一的基礎也逐漸穩固，往年反蔣派的領袖閻錫山氏，對中央的關係極爲良好。至於韓復榘氏，則更沒有反對中央的意思了。

所以蔣氏這時看出縱然表明親日，也不怕反對派的攻擊了。但是，蔣氏異常慎重，以爲在事先徵求民意，比較妥當。於是授意徐道鄰等起草「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在外交部的機關

雜誌外交評論上發表。接着，汪兆銘氏也命令林柏生在中民華報上，登載一篇「對日兩條路綫」。

茲將徐道鄰氏的論文要點大概介紹於后：

「一般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摠手之必要。這是就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于盡的話）澈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是至今爲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令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着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攜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於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概，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

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

徐氏的見解很對。尤其是指摘「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為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的一點，特別令人發生同感。

於是他又進一步，說明縱然標榜這種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仍然不能維持嚴正中立，結果祇得參加一方面作戰：

「現在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啓，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方面強迫我們或破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恤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仍然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逼參加的被動地位，於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

於最悲慘的絕境。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站在那一方來參戰，毋甯說是反抗那一方面之爲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於中取巧，得到什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

這裏的議論也很有見解。現代的戰爭往往把中立國捲入漩渦，何況照中國這樣國家，又是列強的爭奪目標呢？

所以徐氏主張與其無爲無策的坐待戰爭，倒不如這時起來消弭戰爭的原因，先解決目前的中日問題。

「我以爲目前中國，只有盡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採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爲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爲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掣。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着想，或是爲因

應現在國際間局勢着想，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如果中日問題能够解決，那麼日美戰爭自然可以避免，同時俄國對於日本，也可不致挑戰。所以無論何人，若爲中國的利益着想，對於解決中日問題，想必都無異議。

而且他又說調整中日關係，不但對於中國有利，同時對於日本，也是極有利的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之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略家或戰略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與美國啓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爲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的打算

，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澈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的地位甚爲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

究竟日本在短時間內，有無滅亡中國的可能？依徐氏的意見，爲絕對不可能，他所主張的理由如下：

『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在尙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爲更切，豈止關涉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爲敵，不止與俄美爲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爲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

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爲有利之戰略？」

其實，日本要想使中國屈服的手段，並不止封鎖的一個手段。此外還有可以利用的更重要的手段。縱然日本利用封鎖的手段，祇要處置的得當，也不致就把敵對的範圍，擴大到全世界啊！

「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爲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爲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偽國」以來，所支出的軍費有多少的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長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略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唾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民氣民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略，倍多耗費，此就其直接經濟影響而言。

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

拿經濟的眼光看時，戰爭固然是浪費，而不應該有長期的戰爭，但是事實上則往往不然。譬如前次的世界戰爭，其初一般人都想像最長不過兩年，因為戰爭的規模愈大，參加戰爭的國民也愈疲憊，雙方都要不堪這樣的長期戰爭的痛苦。然而實際上，世界戰爭竟繼續到四年之久。又在意阿戰爭的時候，普通都預想意大利由於戰爭的疲憊，其在歐洲的地位，勢必失墜。然而今日的意大利，一旦與德國聯合起來，已竟敢與英法俄三國爲敵了。就是日本，也是這樣，當初一般人預想日本由於「滿洲」事變，財政愈加困難，又由於中國的排貨運動，貿易上將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不遠的將來，國家不難陷到破產的境地。但是事實上，日本現在仍然在繼續的發展。這樣看來，可知戰爭不能僅從經濟上着想，依我個人的見解，總之，要看國家的決心如何。

徐氏的議論，又有下面的一段：

「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爲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軍隊，表面上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以上的軍隊，至今尙不能確保所謂「滿洲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要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額總計不過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尙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須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役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所說，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他就要以支戰場作爲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肯自取敗亡。此種有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甯爲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的。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爲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

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爲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澈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爲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爲要着，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尙在革命未成的時期）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方里之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澈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爲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爲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甯謂塞翁失馬。日本若以繼續侵略暨削中國疆土爲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彼時兩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澈底消滅中國的目的是呢？」

上面這種談論，可說是代表中國人一般的看法。假若果真如此，我們却不能不爲中國預感不幸，因爲這樣結果，日本方面雖受不到多大的損害，然而中國反會早些滅亡了。

不過日本如果照徐氏所說的，對於中國作戰的時候，專門向首都進攻，那麼自然也要疲於奔命了。但是在我看來，日本的軍部恐怕不會採取這樣拙劣的戰略罷！

現在假設日本攻略華北，在這地方成立親日的政權，如果中央軍再向這個政權挑戰的時候，日本又進兵到長江北岸，也就在這地方成立親日政權，照這樣下去，那麼蔣氏的統一計畫，豈不要毀滅。這樣在中國方面，豈不是祇有敗北，而在日本方面，却可以從容的應付嗎？

如果再想像親日政權的軍隊，渡過長江，占領南京，那時蔣氏還可以說與對東北一樣，謂爲「塞翁失馬」麼？

照這種情形，目光銳敏的蔣氏，決不會不知道。但是爲什麼還要這樣說呢？他的用意究竟是在欺騙日本人，抑或在使中國國民興奮，雖不得而知。但是如果他願意拿這種話來做手段，提倡中日

親善，那麼日本也未嘗不可以接受。

徐氏在講完中國不能爲人控制以後，又論到中日關係所以失敗的原因，係由於雙方方面的錯誤的結果。中國方面的錯誤，大致如次：

(1) 當民國十九年以前，中國本來對於日本有解決商租權問題的機會，但是當局竟把這個機會放過，以致惹起以後的東北事變。

(2) 日本不是通常的政黨國家及立憲國民，國內的一切皆被一種特殊的階級軍閥把持。然而中國的輿論不知道這一點，以爲日本民間的進步的輿論，可以抑制着軍人的橫暴。

(3) 日本是軍閥跋扈的國家，素不守條約及國際信義的。但是中國方面則過於相信國際聯盟，以爲牠可以制裁日本，而同時英美也可以出來干涉。

(4) 當時一般人以爲抵制日貨運動，結果必定可以使日本國內大起經濟及政治上的騷擾，那時雖欲不放棄東北而不可得。

(5) 中國政府當時不但不知彼，實亦不知己，譬如日本發動侵入熱河時，過信東北軍隊有利用險要作相當抵抗的力量，而不知東北駐守熱河之軍隊，精神實力，頹敗之至。

(6) 中國的國論，也不能一致。其時國內當局與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間不能一致，中國國民黨與黨外不能一致，甚而至於中國國民黨內部，亦於此時因外交主張而顯現分裂，因此內亂與外患益見嚴重。

(7) 中國方面以感情用事，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但吾人認爲「同歸于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日本如橫行到底，中國自然應該出死力以謀掙扎，但「死中求生」畢竟是最後無其他辦法時的辦法，如果能從「生裏求生」，總應該抑制感情以重理智，爲國家民族計及於久遠。

其次，徐氏指摘日本方面的錯誤，分成直接的及間接的兩種：

(直接的錯誤)

(1) 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決沒有澈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人沒有認清這一點，以為軍事行動繼續進行，疆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

(2) 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今日的中國人民至少已了解民族主義的意義，日本縱然可以藉武力使中國人民屈服，但決不能使其變為順民。

(3) 日本人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然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要算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為最澈底，在國民黨的內部，當然不免有一部分排日論者，不過這總是少數。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

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能致。因此如日本以爲必須打倒國民黨，則不但喪失同情，而且愈使中國國民團結一致，起來與日本對抗。

(4) 日本人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論評爲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蔣氏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等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爲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自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塑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

蔣氏之爲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習性之遺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

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型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

(5) 日本人忽略中國國民的心理。日本一面造成中國國民絕不能與日本妥協的錯誤的前提，因而認為唯有消滅中國民族，日本纔可安枕，而且從來為消滅中國，始終出以極毒辣之手段。所以日本至今仍不解中國人民的心理。

英國其始以殺人的毒物害我，其繼以不能擺脫的不平等條約困我，這是中國國民深入骨髓的仇恨。但是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反英的感情並不如何濃厚，這固然因為英國近來已改變鴉片政策，最大原因則由於英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沒有土地野心，所經營的祇在商業經濟方面。日本人祇要認識此一點，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略的行爲，中國對西方各國，尙且願引為朋友，何況同洲同種之日本？

(間接的錯誤)

(1)日本脫退聯盟後，在日本自己所以說明者，即爲日本有獨自之立場。但實際則爲陷於孤立之狀態。現在世界的趨勢，爲國際合作的趨勢，所以孤立不能不說是違背時代之趨勢。

(2)日本人現在高唱亞洲門羅主義，但今日已與一八二六年美國高唱門羅主義時代不同。日本此時欲排斥列國，以東亞人之東亞的口號而置中國於絕對支配之下，如此不僅美俄已敵視日本，歐洲諸國都要敵視日本，尤與英國利害極端相衝突。

(3)日本爲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論，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爲日本生命綫，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爲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爲不得已，一面更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即或有之，亦爲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轉移之間。

徐氏由此更進一步，指示中日兩國所應採取的途徑，並竭力唱導中日兩國，唯有互相提攜，及共存共榮的一途。

徐氏警告中國的話，有以下的一段：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為中國所應認識者：虛驕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僵定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為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驕，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一時的榮辱得失，祇要不礙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祇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祇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為中國可乘此以求收穫，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衆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層圍中，因此也有一部分人，以為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惜一時痛苦，甯為瓦礫之場的

比利時，亦係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爲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驕矜，以觀其敵。作者之意，則以爲人生意義，不在相阨，而在共存，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侗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義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使，應知日本所爲，雖不惜以害人者害己，而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爲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井下石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同歸於盡，中國便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瀾以俱倒，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只要國民以昨死今生之决心力自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形勢或存倚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分人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爲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

的協定，這已是中國的大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爲此約定，豈在爲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之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依賴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爲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爲保護國，其要求爲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意想中之結局爲瓜分或共管，其口號則爲利益均霑，由中國的立場言，無論爲獨佔爲均霑，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爲計者，唯有依於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藤，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纔是安全之保障。」

接着，徐氏對於日本方面勸告的內容如次：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之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徹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纔爲日本百年不敝的國策，有獨立之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

攜，而後日本爲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爲澈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舍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吐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爲貫徹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遼遠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於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太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如果中日問題有迅速的解決，至少可以廓清其一大半，而中日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僵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

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爲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日本退出國聯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國聯而引起的諸般困難問題的存在。」

現在謀「滿洲國」健全的發展與日滿兩國不可分的關係，既是日本的國策，那麼無論中國怎樣拿親善來作交換條件，日本也決不會輕易的把滿洲放棄罷？至於拿這種條件來重新參加國聯，那恐怕更不成問題了。當然，這在蔣氏並不是不知道，然而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這樣說呢？這無非是要尊重國民的意旨，純粹爲對內而發的言辭罷了。

以上是徐氏關於中日親善議論的要點，不過事實上，這是出於蔣氏的授意，所以這也可說是蔣氏本身的意旨。我在上面，曾對於其中兩三點，加以批評，雖說我們在意見上有些不同，但仍須承認這一篇論文，對於中日親善，供獻極大。蔣氏的用意，想必必在此。這篇論文發表之後，一方面既足以徵詢民意，另一方面，在中日兩國間，開始廣播出親善的空氣。

果然，這篇論文在國內的反響，非常滿意；同時，在日本方面，也很受歡迎。所以不久就有蔣氏決心轉向中日親善的傳說。

蔣氏素來是一旦下了決心以後，立刻就要實行的人，所以在這篇論文發表的一個月後，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蔣氏便招見駐華公使有吉（明）及公使館武官鈴木（美通），商議調整國交。於是須磨南京總領事急速歸國，報告外務省當局後，攜帶重要訓令返任。該月二十一日，須磨即與汪兆銘氏，黃郛氏，唐有壬氏等開始豫備會商。中日交涉，於是逐漸進行。

（二）中日親善

在同一天，日本議會中，廣田外相在演說對外關係時，也有相呼應的話。他說中國的政局，近來已漸漸恢復和平，有統一的傾向，祇有共軍的騷擾可慮。並且附帶的說，日本和東亞各國，應共同分担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的責任。

對於這個演說，中國方面的批評很好，並且與以支持。在一月下旬就有在華的中日要人的會

談，和蔣氏對日方針轉向的聲明。

二月一日，蔣氏在會見中國新聞記者團時，發表下列聲明。說明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有轉向的趨勢。

「我國的外交方針，以和平信義爲標準，對於任何國家，都努力合作提攜，解消仇敵的感情。這次廣田外相在議會中關於我國的演說，很有誠意，我國上下都十分諒解。雖然中國人因受了激烈的刺戟，起了一部的排日運動，政府曾經不斷的施以糾正和禁止。因爲在國際形勢暗澹的現在，惟有以平等原則誠意相見，才能解除互相猜疑，可以發現將來的光明。若中國過去的反日感情和日本對華的優越態度，能加以糾正，則自然能達到敦睦邦交的途徑。若我國同胞，以正大光明的態度，根據理智和道義，抑止一時衝動和反日行動，表示信義，相信日本也必以信義相對。」

二月十三日又發表了取締排日令。二十日行政院長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發表了親日演說，又

有王寵惠等要人的赴日，誠爲一顯然的轉變，於是中日親善工作，漸漸的有了進步。

按滿洲事變以來，中國對於日本，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雙重政策，這就是待機的隱忍方針。排日抗日的氣象，依然濃厚，與其說是交涉，勿甯說是偏於抗日的傾向。若日本向中國要求握手，則一定反被中國所輕視，這在日本，已經有過好幾次的經驗。所以日本只有取靜觀主義，先以武力壓迫中國，看中國的態度如何，再決定消極的對付，或者積極的做中日關係促進運動，以採取隨機應變的態度，繼續靜觀主義。

然而倫敦的海軍預備交涉，因爲日本要求和英美均等，以致軍縮協定不能成功，英美因此認爲日本對於中國及西伯利亞，包藏着野心，於是開始進行協同抑制日本的運動。

因爲英美大家推測日本有野心，所以更打算協同干涉東亞事件。這自然是和東洋事情應由東洋處理的日本方針相違背的，所以日本爲豫防起見，不得不講求應付的手段。

這個手段，不外和中國握手，真正由東洋來處理東洋事情，此外別無良策。因爲外國干涉東洋

的理由，由於中日兩國的握手，就可以消滅。這就是日本接受中國的握手，進行中日親善的一個原因。

更有一個原因，就是關於蘇俄的態度。

滿洲事變以來。蘇俄曾對日本送了希望親善的秋波，但是日本對蘇俄提議的締結不侵略條約，認為時機尚早，加以拒絕。蘇俄於是發生了恐怖，在俄滿邊境開始從事軍事準備。若日俄間一旦開戰，抗日的中國必定和蘇俄通氣。為預防這一點，所以日本也有和中國握手的必要。

加以國聯的技術援助委員長羅斯，又將到南京來，預備像以前拉西曼博士那樣，要做不利於日本的事，所以中日兩國更不得不先求握手。並且蔣氏政權的基礎已經更為鞏固，所以中日握手，也非常對稱，而且富於確實性。

以上就是日本政府所以積極進行中日親善的重大原因。

在這種原因之下，中日兩國的關係，急轉方向，漸納入親善的正軌，一方面有日本的言論界和

有識者高唱中日親善，同時在中國方面，也加以附和。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無論其爲本心，或爲手段，既然已經停止抗日，取締排日，日本自然也必須以誠意相對，逐漸促成中國的轉向。

就在這種意義之下，中日兩國間，在五月十七日，實現了大使的交換，而蔣作賓有吉兩氏，就被任命爲兩國間初任的大使。

但是關於大使的昇格，無端的又引起了日本國內兩種意見的衝突。衝突的起因，就是因爲日本外交當局，沒有尊重軍部的意見，就實行了大使的昇格。

這兩種意見，一方的主張是中國既然對日本出於誠意，日方也應報以誠意。他方面則認爲中國的對日轉向，並無誠意，不過是一時躲避的手段，不先改善南京政府的對日思想，就先行握手，是很危險的。前者的接近論主要是外務省提倡的，後者的警戒論，則據說是軍部的意見。

但是外交當局，竟不顧反對的意見，決意實行昇格大使的原因究竟在何處呢？這正如廣田外相

當時所說的，全因爲認定中國爲有誠意的緣故。

在二月二十日衆議院內政公債委員會上，廣田外相很坦白的說：

「對於蔣介石氏的真意，毫沒有一點的懷疑。」

更在三月一日衆議院決算委員會上，對政友會的仙波久良的質問，曾作下列重要的回答：

「你所質問的大約是，對於中國的對日親善是否過於相信？據我所知道的，正在絕對的好轉，實無容疑慮。對華關係由來很久，但至現在爲止，總是不好的關係居多。中國現在很感覺不對，決心改正，所以中日關係得以好轉。如果我們不完全把握住這種倖運的機會，來收穫中日親善的實效，恐將來要爲後世的子孫遺臭，留下我們的羞恥。所以我們以全幅誠意和努力，連絡各方面，務必期望中日提攜與中日親善，早日得到具體的實現。但是蔣汪和其他國民政府的力量要人，雖然有此種意嚮，但因爲中國民衆對於日本，在歷史上久懷惡感，若求政府方針反映於民衆，真收中日親善的實效，自不得不有相當的時日。我深深的希望這個好轉的時期，能

够早日來臨。」

加以中國方面，從中日關係好轉以來，排日排貨的取締，着着進行，從來中日間成爲問題的懸案，也一一進行解決，這也是日本外務省當局決意實行大使館昇格的原因之一。例如南京，漢口事件的賠款餘額的清償，債務的清算，無綫電報，電話等等問題，共計解決了有八九件之多。

要把中日親善工作納入正規，那麼，對於上述中國方面親日的表示，日本自然也須答以好意，所以日本外交當局，不願國內一部分的反對，決心實行交換大使。

對於大使館的昇格，中國方面是非常的高興，南京外交部當局曾發表下列的談話：

「公使館昇格問題，在民國十七年，既已與日本政府開始交涉，因有種種障礙，直至今日未能實現，但是此次中日兩國政府，以最短的時間與最簡單的手續，將特派使節同時互相昇格，於是多年懸案，得以圓滿解決，實爲欣幸。同時對於廣田外相的努力和誠意改善中日兩國國交，完成一種劃時期的事業，國民政府，深爲欣佩。中日兩國國交的增進，以相互尊重爲原

則，此次昇格，也就是相互尊重的最明確的表示。今後兩國間一切懸案，就根據以上的精神，達成相互目的。此不僅爲兩大國家的光榮，實亦爲全世界的福利。所以不得不謂今日爲中日兩國國交上最有意義的一日。新任大使有吉，過去在中日兩國國交上貢獻的功績卓著，對於他的任命，國民政府極爲歡迎。」

中日兩國的親善，就這樣飛快的進展。譬如該年日本對華貿易，比較上年已就有三分之一的增加了。

(三) 波瀾重重的華北事件

正在上述中日親善工作很有進展及交換大使的時候，忽然在華北方面發生了幾種事件，以致親善工作不得不頓挫下來，以致中日間又佈滿了險惡的風雲。

原來華北方面，是中國與偽「滿」交界的地方，中間設着非武裝地帶，緩和兩方面的衝突。但是平津一帶蟠居着舊東北軍的部隊，防礙黃郛等的親日政權，常有反滿抗日的舉動。

在昭和十年五月，有孫永勤股匪騷擾非武裝地帶，日軍會施行剿滅，後來認爲孫的背後，有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等華北官吏的操縱。同時又有親日親僞的新聞社長二人，在天津日本租界爲人暗殺的事件發生。

關於孫永勤股匪和親日新聞社長的暗殺等事件，本來問題很小，但是日方認爲背後有南京政府國民黨藍衣社的操縱，所以問題才鬧大起來。於是五月二十九日，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於所謂重大決意之下，向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于學忠的部隊，退出平津，解散排日團體和恐怖團體。接到報告的南京政府，立刻開會討論，承認了這個要求，才得平安無事，但是中日親善也就從此停頓了。

接着又發生了幾件小事，也是由南京政府讓步，得以無事。但是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又接着發生，南京政府於是開始懷疑日本的誠意，親善工作從此就完全消滅於無形之中了。

華北方面，向來爲統治中國的中心點，那時由南京政府支配，華北的人民本來心裏就不服。因

爲一方面要受南京任命的省政府，市政府和國民黨黨部藍衣社等的支配，又要養許多的軍隊，捐稅重重，負擔很大。當時又值華北政局改組，于學忠和東北軍離開了河北，宋哲元軍由察哈爾撤退，國民黨黨部也已被封閉，於是自治運動就乘機而起。（以上都是日方假造的理由，明眼人當不爲所欺。譯者註）

自治運動，以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河縣事件開始，擴大到河北各地，並且達到河南的北境，南京政府命令河北省主席商震，向日本駐屯軍商洽，容納了農民正當的要求，自治運動，才一時得告平靜。

但是十一月三日，南京政府突然發令收白銀爲國有，於是自治運動又再度的發生，甚至要成立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五省的聯省自治政府。

蔣介石氏和國民政府，對此當然非常警戒，設法阻止，或是在表面加以威嚇，或是在暗中實行安撫，發揮蔣氏得意的拉攏手段。於是山東的韓復榘，河北的商震，山西的閻錫山，才都改變了態

度。

但是戰區的督察專員殷汝耕，却不顧一切的在戰區成立自治政府，和南京政府完全斷絕關係，自稱爲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長。蔣氏立刻派軍政部長何應欽氏急速北上，下令逮捕殷逆，但是因爲偽自治地域在戰區之內，一時也未能實行。

他方面宋哲元秦德純等，也有施行自治的意思，想和南京政府對立。

據日本表示，日本對於自治運動的態度如下：

一、自治運動爲華北民衆自己組織的，與日本毫無關係。

二、但是華北和滿洲國相接壤，所以認爲該地與日本有重大關係。華方應充分認識此種特殊關係，善爲處置。

三、南京政府若忽視現實情形，僅想拿兵力來解決，則事態恐將更爲惡化。

並且以此意義提出警告。南京政府則在考慮後，拿下列兩個方針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關於華北中國應絕對保守主權的完整。

二、新設冀察政務委員會，應以宋哲元爲委員長。

自治運動發生以來，蔣氏當然是非常焦慮，東三省是由國民政府手上被人奪去的，現在華北又要被佔，所以不得不設法阻止。於是另一方面對於日本提出抗議：

『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是少數不良分子勾結少數日人所造成，並非人民的真意，但是結果使中日間隔離更大，有危害東亞和平的危險，希望日本政府，對於日本××（按係指軍部）的違法行爲，應嚴重加以抑制。』

他方面又對各國駐華大公使提出聲明書，想用外國的力量，來牽制日本。

南京政府既然認爲華北自治運動，是以日本軍人爲背景，想把華北造成第二偽國。於是已入軌道的中日親善工作，更是消滅無跡了。

接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東，各地的大學生，一致起來舉行示威運動，反對自治，

用「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喚起一般民眾。結果中國全國的排日氣勢又高漲起來，於是造成成都，上海，北海等不幸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說自治運動，是促成蔣氏的統一運動容易完成的因素。如果運用春秋的筆法來說，則濟南事件，使中國民眾，認識蔣氏的存在；東北事變，造成中國統一的基礎；華北事件更促成了中國的統一。

(四)三原則對三原則

東北事變以來，日本關於對華政策，中央和當地官憲的意見，常不一致，以致日本時常受得到不利的影響，因此確定一定的對華方針，實爲目前的急務。

因之，廣田外相，召開外務，陸，海軍，大藏（財政）四省的協議會，作成草案，提出昭和十年十月八日的閣議議決，於是成立了日本對華政策的三原則。

三原則的內容：

一、中國應停止排日運動，放棄依賴歐美主義，以期中日協力的實現。

二、中國應承認「滿州國」，尤其在華北，進行調整中日「滿」三國的關係。

三、爲防止中國赤化起見，應謀中日的共同防衛。

日本政府一方面將三原則通告各地駐在官憲，同時又交給駐日蔣作賓大使，要求南京政府的贊同與協力。

蔣大使的報告，到達南京政府的時候，中國也正在南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五全大會），此次會議，山西的閻錫山和馮玉祥也來出席。西南方面，則有鄒魯，林雲陔，黃旭初等要人參加。所以蔣氏的地位，更爲鞏固。

蔣氏當時替代汪兆銘氏，對於內政外交，作了一個報告的演說。關於外交方針，決定了下列的五點：

一、在不危害主權的限度內，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爲政治的提攜。

二、在互惠平等的原則下，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爲經濟的提攜。

三、用所有的手段以求和平。

四、到用盡方法和認爲必要時，就不惜作最後之犧牲。

五、根據以上的外交原則，中國的外交交涉，全權付予國民政府。

這個外交方針，換言之，就是，盡全力以求調整中日關係，以至最後的努力爲止。其中實含有極悲壯的意義。

在五全大會中，對於蔣大使所報告的日本對華三原則，也曾加以討論。十月二十一日，用汪兆銘的名義，答復日本，其大意大概如後：

『對於滿州國的承認很難實現，至於其他各件還可以商量。』

結果中國方面，又提倡在南京開中日會議，當時歸國中的蔣作賓大使和有古大使曾經進行交涉。

當時關於中國是否真正改爲親日的這一點，日本方面的意見還很不同。一部份人以爲南京政府驅逐了知日派，而讓歐美派占着中心勢力，並且英國的經濟使節李滋羅斯正計畫擴張英國的勢力，以抵制日本，再鑑於南京政府不能彈壓抗日學生的態度，所以這一派主張反對論。結局日本只得先來試探南京政府主腦部的意嚮，於是又有中日要人的會見。

後來因爲華北事件的發生，南京政府的對日態度又起了變化。更加以外交部長汪兆銘氏重傷的結果，行政院各部長都更換了。新外交部長張羣就任後，鑑於知日派迭次遭受到的恐怖行爲，認爲照舊的進行中日親善的困難，於是中國的對日態度，頓時作了一個百八十度方向的轉換。

次年，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廣田外相在議會發表關於調整中日國交的三原則時，附帶說明南京政府已經承認。但是次日二十二日，南京外交部立即發出聲明，加以否認：

『廣田外相謂南京政府已承認三原則，完全與事實不符。』
於是三原則問題成了一大問題，日本輿論也因而沸騰。

汪兆銘氏表示除承認「滿州國」外，都可承認，已如上述，而且駐日代理大使對重光次官也說：「五全大會的結果，國民政府最高首腦部對於三原則已加承認」。所以在事實上南京政府雖然大體已承認三原則，但是如果明白的宣佈，恐難以應付國內，並且又鑒於以往國內對於知日派常有不利行爲，所以在日本方面宣佈後，也只有仍然加以否認的一途。不過因爲這是正面的否認，在另一方面又激起日本的輿論，以致此時陷入雙方夾攻的苦境。南京政府於一月二十五日，又發表了下列聲明，內容既不表示承認，也不表示不承認：

「對於所謂中日三原則，中日間所交換的意見的內容，常有若干相差，國民政府還不能充分了解日本政府的真意，所以國民政府希望日本政府，能再表示出具體的內容。

充分明白三原則內容之後，再指定有權力的責任者，當實際的交涉，這是我國的方針。」

由此看來，國民政府雖不完全承認三原則，但也不全然加以否認。

對於以三原則爲根據的具體方案，不僅是中國方面的希望，就是日本方面，也很需要。但是具

體方案的發表，須要準備，又需要機會。於是中日國交的調整，只得暫時束之高閣了。

後來到去年七月開二中全會時，蔣氏又發表一演說，表明南京政府的態度：

「中央根本的外交方針，在保全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若有侵害國家的主權者，我國絕對不能容忍；又侵害領土主權的協定，也絕對不能締結。具體的說，若有國家強迫承認「偽滿國」的協定的時候，則正是吾人爲最後犧牲的時候。但是因爲和平還未絕望，也不能以一時意氣和個人名譽，貽害國家民族的前途。」

他拒絕承認「滿州國」，同時又指出和平還未絕望。

但是蔣介石氏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所主張的中日邦交調整原則，又是怎樣呢？根據五全大會和二中全會的經過，大約不外下列三項：

一、主權的保持。

二、行政的完整。

三、互惠平等。

所謂保持主權的意義，就是說例如華北方面，西南方面，主權皆在南京政府，不許有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行政完整的意義，就是說在南京政府統治之下，政治，外交，軍事都須接受南京政府的命令，不許各地方任意處置。互惠平等的意義，就是以平等爲原則，謀兩國國民的共存共榮，係借用倫敦會議日本所主張的平等原則，主張應放棄對其他國家的國民的優越感。若以此三原則作基礎，與任何國家，都可以爲政治的提攜或經濟的提攜。

上述的日本三原則和中國的三原則，都是極有理由，任何人也不能反對。但是若要使之具體化，則不免發生許多問題，引起彼此利害的衝突。最近中日交涉的不能進展就完全是因爲此種原因。不僅中日問題是如此，其他許多問題也何嘗不是如此？

(五)最近的中日交涉

繼有吉大使任駐華大使的有田八郎，就任後不久，就和蔣介石氏及外交部長張羣氏，交涉繼續

進行停頓中的中日國交調整會議。雖然後來廣田內閣成立後，又調有田就任外相，但南京政府對他的印象，非常良好。繼有田大使任駐華大使的川越，事前先往華北一帶視察，也認為中日關係有調整的必要，更主張打開中日關係，以經濟提攜為急務。對於這個主張，南京政府也非常表示好感。張外交部長對於日本朝日新聞，並發表了如次的意見（六月二十七日）：

「中日關係的調整，雖然依然有種種困難，但是吾人仍須努力打開。現在的中日關係比較以前是已經良好。我很知道日本的民衆對於我國，始終抱有好感，雖然中國民衆對於日本的一部，坦白的說，似乎沒有好感。但是我們政府當局，從大處着眼，確信在東亞和平兩國存立上，中日提攜實有必要，應當努力進行，我國當局實具有此種苦心。」

我就任外交部長以來，已有半年，……從川越大使在新聞上發表的談話，知道大使對於中日關係的打開，有相當的熱意，尤極主張經濟提攜。這對於兩國關係的打開，正如在黑暗中發現了光明，非常感覺愉快。我對於中日的經濟提攜，為二十年以來的主張，現在務必要尋出提攜的

出路。

對於我個人，似乎有所謂無誠意或誠意不足的批評；但是我是一個軍人，就任外交部長，不過是想將中日關係，求在和平中加以解決。因爲不是外交官出身，所以對於外交的禮儀和技術，不十分知道，但是對於袒白的和日本打開國交，則可以斷言具有熱意和決心。就是蔣院長也有同樣的見解。』

這是張氏的意見，同時也是蔣氏的意見。內容就是先從經濟提攜着手，再推進到政治的提攜。另一方面，蔣介石氏在去年八月初旬，又對日本有下列的表示，要求日本同意。

一、對於根據中日親善和中日諒解的經濟提攜，中國毫無異議，不變更對於日本的既定方針。
二、所以對於以華北爲中心的經濟提攜，希望在每次會議中，將從來的懸案，就可能的範圍加以討論。

至於蔣氏領導下的南京政府，對於停頓中的中日交涉爲什麼要積極的要打開呢？這也有種種見

解。但是最有力的，要以西南問題已經解決，統一事業逐漸發展，所剩的只有華北和內蒙問題。按當時情形，這兩個問題，都和日本有關係，蔣氏想早日加以解決，以完成全國的統一。這就是蔣氏要起來和日本交涉的主要原因。

對於蔣氏的提議，日本也有種種的意見，但是政府有力的意見，以爲若是日本僅責難中國的不覺悟和對日本交涉的無誠意，而不加以指導，使走向親善的道路，這決不是良策。所以不如積極的表明立場和表示確定的政策爲妙。於是日本乃進而提出打開中日關係的具體方案。

以八月二十四日成都事件發動的中日交涉，九月十五日川越與張羣的第一次會談，可說互相已盡所欲言及盡量折衝了。當時日本交出了八項要求：

一、南京政府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

二、中日兩國共同防止赤化。

三、中國取締排日抗日。

四、中日航空連絡。

五、中國減低高率關稅。

六、聘請日人顧問。

七、引渡在華反日鮮人。

八、設立成都領事館和開發四川。

這些要求，可以說是廣田外相主張的對華三原則的具體化，由日本對華政策中所產出的。

有田外相時代的對華政策大約有如下的性質：

一、中日兩國，以外交手段調整國交，以共同利益爲目標，實行和平的經濟提攜。

二、因爲「滿洲國」獨立已成事實，和日滿有不可分的關係，對於華北應明白表示最低限度的

政治要求，使南京政府同意此特殊性，並同意共同防禦第三國際的赤化遠東。

三、若中國承認上列二項，日本不再在華北，作刺戟南京政府和中國民衆的行動，對於冀東，

冀察兩政權的合併，及取締走私，也願幫助。

四、其他各懸案中，如減低關稅，中日航空連絡，聘請日人顧問等，應盡力早日以外交方式解決，用以消滅全中國的排日空氣。

至於中國，則以前述的對日三原則（一）主權保全（二）行政完整（三）互惠平等爲基礎，作成對案，用以應付對日的要求。

但是除了對於華北防共二問題以外，大體已趨一致，對於以上兩個問題，中國則完全拒絕日本的要求，毫無妥協的餘地。

南京政府何以對於華北，防共二問題竟頑強拒絕呢？據確實的情報，蔣氏的胸中，大約有如此的理由：

若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不單違反行政完整的原則，甚或有抵觸主權保全的危險。如果再承認「偽滿國」，則必然要引起民衆的反感，而失掉南京政府存在的根據。至對於華北，更不可輕易出

於此舉了。所以凡是抵觸主權的保全和行政完整的，或類此的舉動，都斷然不能承認。

至於防共問題，對於中日共同防止赤化的宗旨，當然不反對。中國也認赤化爲危險。但是因爲日本重視統帥權的結果，時常連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完全推翻，中國在東北事變時候，已經有過此種經驗，當然不願再嘗此經驗，所以此時不作一切合作的協定，在中國方面認爲安全。

從日本方面看來，中日交涉最大的目標就是華北和防共兩問題。若這兩大目標不爲中國承認，簡直沒有交涉的價值。關於這兩個問題，中日間正在進行交涉折衝的時候，忽然又發生了綏東問題。「偽蒙」的德王軍和綏遠的傅作義軍竟開了戰端。

中國認爲「偽蒙」軍的背後，是日本人在操縱又認爲日本是依然未放棄華北侵略的野心。於是蔣氏領導下的南京政府對於已經成立諒解的中日交涉的某幾項事件，也加以拒絕，而完全變成反對的態態。

廣田外相時代的中日親善工作，由於華北的自治運動，結果前功盡棄。此次綏東問題發生，又

使南京交涉完全絕望。這也可說是一個滑稽的對照。

第十七章 西安事件

(一) 蔣介石與張學良

陳濟棠的廣東派，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廣西派一齊沒落後，在蔣介石政權的統一程序裏餘留下來的問題，祇有張學良了。不意爲全中國領袖的蔣介石氏，竟突然被張學良劫持在朔風凜冽的西安行營裏了。

這一個電報散佈出來的時候，全世界都爲之震動了。

張學良爲什麼要劫持蔣氏呢？這兩人在以往曾經有過很密切的友誼，所以這一來格外的惹人猜疑了。

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底，張學良不顧一切的反對，毅然在東三省樹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進而與國

民政府實行積極的妥協，雖然日本在旁邊極力的勸阻張學良，說得舌弊唇焦，仍舊沒有什麼效果。到第二年的二九三〇年，當馮玉祥與閻錫山發動反蔣，在北平成立所謂擴大會議政權的時候，張學良在觀望形勢後，突然以疾風迅雷之勢進逼平津，威脅反蔣軍後背，終造成對於蔣氏有利的形勢。

當時爲報酬他的功勞起見，蔣氏會把他當作自己的兄弟看待，任命他爲陸海軍副司令，想互相攜手來造成中國的統一。從這方面看來，蔣張的關係實在是很密切。

然而到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爆發。東三省地盤既已被奪，張學良祇好從奉天跑到錦州，又從錦州跑到北京。正在北京得勉強保持自己的地位時候，當時南京政府行政院長汪兆銘氏却又和他過不去，而拿去就來力爭要徹底查辦喪失「滿洲」的責任者。不過蔣介石氏不究既往，仍舊和他肝膽相照，特地授他以恢復失地及剿匪的任務，給他一個帶罪圖功的機會，可說是唯一庇護張學良的一人了。

自此以後，不但收復失地沒有希望，而且把新根據地的華北地盤也失去了。一九三三年五月的華北停戰協定成立後，他的立場越發困難，於是祇得接受蔣氏的勸告，暫時出洋游歷。

他與德國的希特勒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會晤，大受法西斯主義的感化，歸來後對於蔣氏，就認爲是中國政治方面唯一的領袖。以後他移駐武漢地方，擔任三省剿匪總司令，專門供蔣介石討伐共產軍的驅使。

在那時候，他是怎樣謳歌蔣氏呢？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在漢口爲蔣介石氏的銅像舉行揭幕典禮的時候，他極口頌揚蔣氏人物，這從下列原文中就可看出：

「諸位同胞同志，本市新建立的蔣委員長銅像，在今天舉行揭幕典禮，我們前來參加這個典禮，都感覺到非常的欣幸和愉快。我們現在爲建國復興而努力，目的在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使我們列祖列宗遺留下來的文化歷史發揚光大，這是我們最神聖的使命，也是我們任何個人不容推卸的責任。在這個使命和責任上，委員長秉承總理遺教來領導我們，指導我們，以

便早日達到我們的任務，委員長承繼了 總理一生的事業來求三民主義整個實現。迄今，委員長以一人之身關係我國運之盛衰，民族之降替。我們有這樣一位民族領袖，便是我們的民族生命有所寄託，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感覺愉快的一點。而且全國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有些城市要爲委員長建立銅像。這一來象徵委員長崇高偉大，二來也爲着紀念委員長自今以前爲國貢獻的功績。」

這樣，張學良對於蔣氏偉大的人格、意識、革命的人生觀以及他的修養等，極口加以讚揚後，就下了一個結論，以蔣氏爲古今稀有的英雄：

「以上關於委員長的人格、事業、學問，分別就個人所見到想到的，對各位簡單述說過了。我們正是憑藉這位領袖的指導來實踐 總理遺教，完成建國復興大業。 總理與委員長都是不世出的民族領袖，而且 總理生平致力革命，惟委員長能絕對遵循 總理的領導，若在 總理逝世前，大家都能照委員長這樣服從 總理，則建國事業當已早告完成，無論如何，我國家民族

也不會到現在這個樣子。

委員長在祭總理文中說到「黨徒之不力，人事之不臧」，這是高分沈痛的話，也正是國人辜負總理的地方。總理設生於德意等國，其一生成就，當遠在俾斯麥，加富爾等人之上。我前已說明，民衆對於領袖，如能絕對服從，竭誠愛護，則領袖的成就必能更大，便是這個意思。很明顯的，領袖所負的任務在領導，在計劃。工作進行還要靠一般受領導的人奮勉努力，計日責功。

方今國步日艱，在此情勢下，領袖與大家都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但是我們受領導的人，更要堅定對於領袖的信仰，更要服從他的指導，愈在艱危時期，我們愈應本此做去。我們都應當相信，委員長作我們偉大的領袖，秉承總理遺教，復興民族的使命，必能取得最後的完成。環境儘管艱難，信念不應動搖，亦即陣綫不應紊亂。不要虛浮，更不要自緩，埋頭苦幹下去，總會有成就之一日。」

有許多人反對他說：「張學良原來是口是心非的人」，所以在上面他對於蔣氏的頌揚，是否出於本心，實在是很可懷疑。

但是，蔣張的這種親密關係，自從後來華北事件發生以後，也就逐漸疏遠了。由於華北事件發生，張學良的殘部于學忠的軍隊，一齊移駐到深奧的內地，從事於討伐共軍，所以他的勢力自然就一天一天的縮小了。

以後到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共產軍從四川省侵入甘肅、陝西方面，張學良又代表蔣氏移駐西安。等到共產軍與陝西土著的匪軍聯合起來，盤據甘肅省的北部一帶的時候，就與張學良的討匪軍開始正面衝突了。

張學良的軍隊，在討伐共匪的戰線上，與共產軍接觸的時候，就受到他們的宣傳而逐漸赤化起來了。因此反蔣抗日的意識一天一天的增高，他們竟擅自不聽張學良的命令，而與赤軍締結停戰協定，所以使張學良也無可如何了。

蔣介石氏由於內外大勢的見地，對張學良發出迅速掃蕩共匪的嚴命，但是因為有上述的關係，這一個命令無論如何辦不通了。所以最近，蔣氏不得不派自己的心腹，在福建方面剿匪成功的蔣鼎文氏，爲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駐節西安，於是把張氏攔在一邊，而以中央軍擔當討伐的責任。因此張學良進退兩難，對於蔣氏的措施，十分怨憤。張學良部下的舊東北軍對於蔣氏的措施也表示憤慨。他們感覺到與其在邊境方面削弱兵力，坐以待亡，倒不如起來對抗蔣氏，或者可以打開一條出路，並且利用中國國民的輿論，做一個高唱抗日運動的急先鋒，同時與共產軍密切的聯絡起來，不難造成再起的機會。這大概是一班青年將校暗中爲張學良所擬的策略。

由於這些事情，所以結果在張學良軍的内部爆發出來了。

(二) 劫持蔣氏

綏遠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氏對於討伐背後的共產軍愈感必要，堅決的把討伐的責任使張學良担。蔣氏在中日交涉很頻繁的時候北上，一方面的作用固然在綏遠事件的指揮，但是最大的任務，

却在計劃怎樣使學良軍徹底的討伐共產黨。張學良覺得對於中央的命令，如再拒絕，不知將來要受到怎樣的處分，所以在進退維谷之中，便突然起了這一次的兵變。因此，這次的兵變，大概與各地的軍閥並沒有多大的聯絡。依他們的想像，祇以爲這一來就可以得到共產黨的援助與全國輿論的同情，同時各地方的軍閥自然要起來響應了。

原來蔣介石氏在洛陽經張學良再三的督促，十二月八日纔飛到西安，於是連日在張學良的私邸舉行會議，每次蔣氏都強硬的責難學良優柔寡斷：

「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候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那麼中央軍對於你所負的討伐共產黨的責任，再不能置之不問，對你也不能不講求相當的處置」。

在這樣的激論之下，兩者的關係當然極度的不和了。

當時依張學良的意思，以爲緩遠事件既然發生了，何必對於這時願意共同參加抗日的共產黨，再加以討伐呢？況且政府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應該尊重民意，一心排除國難。所以張氏那時暗中主

張聯俄容共政策，但這却被蔣介石氏當面拒絕了。

爾來數日，西安的空氣皆異常不安，但是蔣氏仍然拿着以往的果敢的人格，決心留在西安，無論如何要促使張學良反省。自從十一日在學良私邸會議完結後，蔣氏便赴西安郊外的華清池溫泉休養。蔣氏無論何時，遇到困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是照這樣避開一切的人，自己住到溫泉地方，繼續的默考今後的華北問題。幾頭個鐘以後，左右的人都去休息，而蔣氏也熟睡了一夜，到第二天的十二日清晨五時，蔣氏仍然依照平日的習慣起床，喝完了白開水，正在讀書讀得津津有味時候，突然在戶外起了嘈雜的喊聲。陳誠氏立即跑出，接着蔣鼎文也跑出去，在這樣非常的空氣中，等到蔣氏自己也跑出去看個究竟的時候，張學良的叛兵已把溫泉包圍起來了。蔣介石氏正想對這些羣衆問叛亂的理由的時候，叛兵已衝開衛隊的護衛，立刻劫持了蔣氏及其他的要人，一同乘了汽車，在嚴重的警戒裏面，護送到西安城內。

這時候大約是午前九時，西安城內早在學良軍隊的嚴重的警備之下，各官廳的赤旗飄揚，市民

在騷亂中關門閉戶，當時恐怖達到極點。

蔣氏所乘的汽車，開到西安最繁盛的地點A. B. C.大樓後，附近一帶立刻被叛軍重重包圍。至於其他陳誠、蔣鼎文、蔣作賓氏等則在招待處互相被隔離的加以監禁。據蔣鼎文的談話，當時蔣介石氏被劫持後，張學良立刻依預定的計劃，向全國發出反蔣通電，說明目的，同時親自與蔣氏會見，詳細說明這次兵變的目的，以下列激烈的要求，來強迫蔣氏承認：

『國民政府忽視全國民衆的總意，任閣下的獨裁權爲所欲爲，這實在所不許。如不改組政府，斷絕國民黨的禍根，在聯俄容共政策之下，立即對日宣戰，結果祇有同歸於盡。』

蔣氏對這項要求，仍然完求拒絕：

『這種問題應歸中央充分研究，如以此種不法行爲強迫承認，斷乎不許。汝應立即送我先返洛陽，否則汝可立即殺我，我既在汝手中，一切任汝自由』。

在這樣激烈的爭論之後，張學良對於蔣氏的強硬態度，已無策可施。自那天與蔣氏會見以後，

再到招待所向其他被監禁的隨員說明兵變的趣旨。到十三日，中央的飛機出現於西安上空，實行威嚇飛行，於是張學良更感到非常焦躁，再與蔣氏會見，強迫承認他的要求，但是仍舊和前一天一樣被拒絕了。那天晚上張學良在廣播無線電台上，說明兵變的真相，並報告蔣介石氏的安全，企圖用全力來抑制輿論的憤激。

蔣氏於十四日由A. B. C.大樓移住西安九府街楊虎城的私邸，該邸爲大理石的洋式建築，是西安唯一的高樓。連日有中央飛機襲來，張學良察知中央的強硬態度，於是就絡續集中兵力到潼關，對於中央軍採取武力對峙的陣勢，同時在監禁的場所，也格外的嚴加警戒。蔣介石氏與他的隨員完全隔離，互相不許連絡。張學良因爲蔣氏的意嚮完全聽命於中央的緣故，所以決定放蔣鼎文氏歸去，付與直接與國民政府交涉的使命，在他以爲是蔣介石氏既被劫持，國民政府一定要容許他的要求的，所以他其初很抱樂觀。蔣鼎文氏由西安出發前，曾與蔣介石氏會見，但不許談話，祇讓蔣鼎文氏看到蔣氏的安全而已。

蔣鼎文氏十八日飛到南京，帶來蔣氏的手書及張學良對於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

蔣氏的手書是給何應欽的：

「敬之我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視察，中正於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爲要。中正手啓。十二月十七日。」

南京政府把這一封手書發表了，但對於張學良所要求的一切，概未發表。到十九日雙方還沒有妥協成功，所以蔣氏與其他各要人依然在被劫持中。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部的空氣如何呢？

西安事件起來後，蔣氏部下的青年將校，立刻決議討伐張學良，甚至對於要阻止討伐的人，也不惜以兵刃相見，他們的氣慨確是悲壯激越之極了。

國民政府部內的蔣氏嫡系勢力，於是利用這種空氣，先組織成軍事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制，把軍事的實權掌握到何應欽的手裏，監視其他系統的蠢動，同時又請宋子文氏担当聯絡財界方面的責

任，極力講求平穩局面的政策，維持南京政權的現狀，同時喚起全國民衆擁護中央運動。於是一般情勢，對於南京政府方面有利的展開，國民政府乃決定下令討伐張學良。

這樣，中央軍一步一步的進迫張學良的根據地西安，採取包圍的形勢，以期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救出蔣氏，宋子文先飛到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妥協，山西的閻錫山也出來進行妥協的工作。結果到了二十五日，張學良已知道形勢於己不利，於是恭送蔣氏出境。

第十八章 中國之統一與復興

(一) 中國的統一與建設

——蔣氏的英文論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蔣院長爲紀念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起見，特以英文向國內外發表一文，題爲『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原文如下。其最後一語：『中國而一旦富強，則必爲世界最大之安定

「勢力」，這實爲一句很新鮮的口號，並且裏面含有很深刻的意義，所以因此惹起全世界的注意。

「自蒸氣無線電空中航行發達以後，國際間之關係即起一鉅大之變化，任何一國任何一事，瞬息間即傳遍於全球，中國處此時代，已非往昔閉關自守無聞於世可比，然關於中國之傳聞愈多，則所招致之誤解亦愈甚。

自中國改建共和以來，舉國上下一致之努力，對內厥惟求國家之統一，對外求國際間之自由平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此新舊交替之過渡時代，包含政治社會家庭等問題，甚且影響及於外僑之利益。國內情形既若是其複雜，而欲局外人持平觀察，予以坦率之判斷，自甚困難。故對於今日之中國，尙有認爲無組織之國家者，此等誤解，致使中國不能博取世間充分之同情。中國近年來日夕努力之建設工作，遂陷於事倍功半之境地。茲值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願向國內外英語讀者，發表若干觀感，在此普天同慶舉世歡騰之日，余意除以「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爲主題外，再無其他適當之題目，足以符合消除國際間誤會之期望。

第一點：友邦人士所應注意者，今日之中國已非往日分崩離析可比。

在一九一二年建立共和以前之五十年，中央威信日益低落，地方跋扈，日益加甚，由此種趨勢而構成軍閥割據，引起循環不息之內亂，人民蒙其殃害，不可勝言。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而糾紛之起，無時或已，軍閥之割據固未盡除，而內戰之外又有共匪之滋擾，人民痛苦，水深火熱，通都大邑，化爲灰燼，農民離村，田野荒蕪，除劫奪燒殺以外，幾無工作可言，此種恐怖狀態，足使一國統治者束手無策，但中國政府深知欲謀國家之建設，必先求國內之統一，故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來，即無日不努力於統一之完成及秩序之恢復，數年來政府以堅毅不拔犧牲邁往之決心，按部就班，實現劃共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之計劃，故一九三三年共匪巢穴之江西收復，以後兩湖、川、黔各地之赤共，亦相繼肅清，其散在邊陲地帶之少數餘孽，亦不難一鼓蕩平，故共匪與軍閥之勢力，已不足爲中國之患。且也閩粵救平，兩廣就範，中國統一之局已完成矣。

第二點：應當注意者，中國於萬分危難之中，已實行復興與建設之計劃。

戡平匪亂困難，而整理匪共擾亂後各區域之治安經濟尤難，應付此種困難，自更需要勇往與創制之精神。人民苦於禍亂，久失秩序與團結，爰援引中國昔日之保甲制度，而運用新方法，以促進村里人民互助互衛及互相監督之責，使不肖份子無隙可乘。

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農民，欲求建設，非先復興農村不可。一九三四年政府遂下令不再增加田賦附捐，以後並迭令取消苛雜，截至今日，已取消者有五千餘種，每年減輕人民之負擔達五千萬元之鉅。

近年來國民政府支出鉅款，用於水利及造堤工程，在去年一年之短時期中，即支出三千五百萬元，自今以後，繼續不斷旱潦之災亦可避免。合作事業今日亦甚發達，總數為二六、二二四。其中一二、五一七為去年所組成，實業部最近又增設合作社，推行全國之合作事業，此外又成立農本局，資本六千萬，官民各半，目的在傾政府與社會之全力，推行農民貸款及農產物之運

銷。關於交通方面之進步，最好以數字表明，鐵道由一九二五年之八、〇〇〇公里，增至一三、〇〇〇公里；公路已完成者凡九六、五四五公里，在建設中者有一六、〇〇〇公里。往日自南京至廣州或南甯，舟楫車馬，費時數月，今藉汽車數日可達。空中航行，十年前不聞於中國，而今日由上海達漢口、成都，北平，廣州諸大都市，而遠及於新疆邊省。由乘客數量言，即以中國航空公司一家為例，一九二九年祇有三五四人，去年一年已達一〇、四〇四人。中國之建設，並不止於經濟，而對於行政效率之促進，公共衛生之推廣，義務教育之實施，及財政之改良，均經努力而獲得顯著之成效。以上所指示者，僅爲大端，此雖云大端，余敢言在此八年之短時期中，有此成績，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從來未有之現象。

在紀念建國萬眾鼓舞之日，余本不應向友邦誇示國民政府以往之成績，正當集中目光於今後未完成之工作，然余所以略示過去情形者，乃期表明中國確有自力更生之能力，既已剷除軍閥匪共，又不斷爲人民幸福而建設，所不足者爲不受干涉不遭阻礙之自衛的發展機會，此機會吾人

昕夕以求，志在必得。能予中國以此機會，不特間接幫助中國，實亦爲世界和平之始基，蓋中國有四萬萬愛好和平之人民，及無限藏之富源，中國而一旦富強，則必爲全世界最大之安定勢力無疑。」

(二) 外人對於中國復興的觀察

中華民國的進步，在外國人眼光中看起來是如何呢？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倫敦發出的路透電報，謂前駐華英大使賈德幹偕其夫人與子女昨夜抵倫敦，就外交次長職。據賈氏對路透記者談話：

「中國中央政府成績日增，此乃中國狀況中之顯著特點，蔣院長爲人，甚可欽佩，其辦事能力甚大，從不自懈，乃政治家，亦真正愛國者。南京政府所辦之經濟工作，甚爲顯明，而財政前途，顯有起色。渠以爲中國新幣制可許成功，中央銀行安定通貨之勢力，亦極關重要。農村狀況，至少在中國中部現漸改善。雖物價低落，農民受累，而不規則之捐稅現猶過多，但農民現

不復遭所有資產悉爲貪暴軍閥所鯨吞之苦矣。中國幅員廣大，交通尚缺，故共匪雖已大滅，猶爲嚴重難題，學生之不甯靜，起於對日仇視，大學當局頗爲焦慮，不過此種事態，許多國內皆有之。近來學生代表與蔣院長之談話，已使空氣澄清不少。新生活運動乃其饒興趣之現象，其若干信條，在外人觀之，或非必要，但在基本上，實起於中國文化所最深入之事物，故此顯爲國家復興工作中之起點與正當目標也。

至於中國前途究竟如何？當然多繫於中日關係云。

最後賈德幹氏復謂：

『渠在華二年之生活殊饒興趣，渠現挾許多快樂觀念以俱來，其中最重要者，爲中國對英好感之信心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南京上海各報紙，均刊載美國報界鉅子紐約世界電報總主筆何懷特氏九日在馬尼刺關於中國問題的談話。

何懷特氏謂，

「日本侵略中國之潮流，現已至最高點，此潮流是否在實際上開始退落，今後數星期中可見分曉。就目前狀況而論，中日兩國苟不即行開戰，即可議定長期和平之基礎。中國對於日本，已表示堅決之立場，急轉直下之局，即在目前。歐美各國對於中國完成復興與統一，一鳴驚人，必須括目相視。易言之，歐美人土已往對於中國之判斷與估價，必須重加調整矣。」

何懷特前次抵此後，曾乘太平洋航空公司飛機至香港，旋又改乘中國航空公司飛機至上海北平。在中國時又晤中國要人及各國駐使，暢談遠東局勢，上段談片即此行結果。何懷德並稱：「三年之前，中國蔣委員長駐節南昌，督師勦共，曾告余曰，其時彼國內尚未統一，軍備尚未充足。及至去年，蔣委員長又在南京語余，中國共軍已經潰敗，南北統一及民族復興，即將告成，統一之局，外國人所視為不可能者，茲已完成而無可動搖。以地域論，則自廣州以至北平，以人民論，則自小工以致鉅富，今後對於任何經略，或損害中國之任何企圖，莫不毅然決

然同心協力以赴之。三年之前，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中國人民贈與其軍隊爲大刀而已，迄至前星期，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若干建議，中國各地人民，祝賀蔣委員長五十生辰者，數十架最新式之飛機。由大刀而至飛機，即可以規中日局勢演化之過程。一言以蔽之，中國睡獅今已醒矣。

夫緊張局勢與戰爭威脅，在中國已屬司空見慣，惟今日情形，已大不相同。歐美各國對於遠東醒獅必須另眼相看。中國民衆與學生已不宣言主戰。各地領袖人物，則在祈禱和平之中，不忘積極備戰。日本對於中國所提要求，原屬不勝枚舉，今已逐漸減少，足證日本對於中國之進步，亦已認識矣。至日本現所提出兩項基本條件，一爲共同防赤，一爲正式承認華北特殊地位。第一條須承認日軍得在中國各地與中國軍隊合作，此無異承認日軍駐華爲合法權利。至第二條實即破壞中國統一，均難承認。至緩遠形勢可謂一觸即發，日軍如向該省實行侵略，蔣委員長必以兵力相周旋。以言中俄關係，在某種情形下，雖屬利害相同，但中俄採取共同行動以

對日之說，中國當局已予否認。蔣委員長之深惡共產黨，及其不欲因此引起英美之反響，可以見之。惟若發生戰爭，則又當別論。抑又有進者，中國對於日本，已提出若干對等要求，可知中國對日外交，亦已採取攻勢。」

何懷德最後宣稱：

『余個人相信，日本將避免速戰，中國則正磨厲以待，不再退讓矣。』

第十九章 蔣介石之偉大

(一) 蔣介石與希特勒及莫索里尼

『蔣介石是偉大！』

『比起希特勒，墨索里尼，還要偉大！』

『的確是偉大！從東洋出了這樣人物，怎麼不叫人愉快呢！』

雖然在充滿着對於蔣氏，祇有責難，攻擊，甚至漫罵的日本，現在公平的有識人士，也會發出這樣的評價了。

「日本沒有什麼人物，而在中國那方面反出了這樣偉大的人物！」

他們一方面反省着自己，而又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從日本的立場看來，無疑的蔣氏是抗日的領袖，要收回滿洲失地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妨害日本進路的荆棘者！但是這種事實，如果從中國的立場看時，中日兩國的關係，既是在現在這樣情形之下，那麼抗日及收回滿洲國，以及妨害日本的進路，都是不得已的自然趨勢，而且其中無論放棄了那一件事，也都可以使蔣氏失掉做中國領袖的資格。所以要真想評論蔣氏，最好不從日本的立場，也不要從中國的立場，而從第三者的立場，不受任何過去關係或感情的支配，來下一個公平的判斷。

那麼蔣介石，希特勒，莫索里尼三個人，究竟誰最偉大呢？

在議論他們三個人之前，我們可先來看這三個人所領導的國家，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現在先看德國的情形。

終年苦於不合理的凡爾塞條約的束縛，及肩負着苛酷的賠款的德國國民，自從希特勒獲得政權之後，更一一的打開，而最後連環繞在德國周圍的鐵絲網，也都被剪斷。並且現在的德國，已經要向敵人的陣地開始反攻了。從前在德國有名的外交部長斯特萊茲曼，所不敢採取的那些斷然的處置，現在希特勒都已經着着實現，而且事實上也着着的成功。德國的國民對他的感激流涕，這是不當然是當然的結果呢？

不過現在的德國，已不是德法戰爭時代的德國，現在的德國，有統一的國家和優秀的民族。這優秀的民族，人人都能以不可抑制的魄力，擁護他們自己的國家，這若與從前俾斯麥時代，那樣祇知向分裂及離異的路上走的德國比較起來，無論何人，都可以發見其中有雲泥之差了。現在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就是這樣幸福的一個德國啊！

那麼意大利又怎樣呢？

「國家的生命是永久的，而人的生命祇是一時的。所以個人的目的，須得順從國家的目的。」這是莫索里尼的國家觀，他的對內政策，也是以這種哲學思想爲出發點的。

事實上，世界大戰後的意大利，無論其政治或經濟，皆已陷於絕境，而且乘着這種混亂，赤化的運動又愈趨猛烈，當時的莫索里尼，因爲自己覺得非起來改造國家不可，所以由於這種思想，他便開始集合若干有血氣的青年，組織一個法西斯團體，竭力的撲滅社會主義及共產黨。他的愛國心，他的胆量，以及他的熱烈的情緒，和滔滔的雄辯，無一不激動青年的熱血，果然他的法西斯運動，不久成功，而且自己也做了一個國家的宰相。

他自做了宰相之後，便着手徹底的改革司法，行政，和立法制度，因此不到數年工夫，國家的產業及土木事業，都漸漸的振興起來。而同時國民的國家觀念，也發達起來，於是意大利的各方面，都面目一新，這裏的情形，也與希特勒統制下的德國國民一樣，把以往的失望及悲觀，一掃而空，表

現出如今這樣的新興氣象。

許多人往往批評莫索里尼的外交爲法西斯外交，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因爲把他當作盲目好戰的人物，而纔發生這樣的誤解。其實，他對於外交，倒非常的慎重。他的爲人，在表面上，雖然像是剽悍犖猛，但實際上，他却非常的有遠見，而且還有政治的手腕，在他對於將來沒有把握的時候，是決不肯輕易的拔出劍來的。因爲他很知道這樣的戰爭結果，只有使意大利喪失一切，而不能有多大的收獲。照他這樣人，在意阿紛爭時候，居然拔出劍來，甚至還要表示不辭與英國一戰的態度，這自然不難想像，當時他已胸有成竹了。

意大利也與德國一樣，本來是有統制的國家。縱然國內發生猛烈的赤化，但也不致於使國家趨於四分五裂。在這一點上，莫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立場，都比較要好得多了。

所以在比較蔣介石，希特勒，莫索里尼他們三個人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留心到這一點。然而，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

說起蔣介石在中國所處的情形，可就不同了。在這一國家裏面，絲毫沒有統一，完全是四分五裂的，羣雄割據。並且中央的政令，不能出都門一步，甚至究竟有沒有中央政府，也簡直是一個疑問。因為這樣，所以在華盛頓會議席上，無怪乎法國的全權代表，會發出「何謂中國」的這樣異奇的問題出來。

況且世界各國又在中國霸占着許多的權利，如果處置得一步不適當，便立刻有化爲外國殖民地之危險。同時，中國無盡藏的富源，和廣大的市場，更容易引起貪欲無厭的外國虎視眈眈的在那裏伺候機會啊！

以上是蔣介初出來時候的中國情形。總而言之，那時蔣氏受着內憂外患的雙方壓迫，要解決這兩種問題，是非常的困難。

在這樣困難的境遇裏面，蔣氏當時是怎樣處置的呢？

他一到南京，便立刻起來打倒盤據武漢的極左派，而把俄國的勢力從中國驅逐出去。接着，又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的北方部隊，收歸己有。

於是，回轉頭來，更對於西南方面，使那無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都屬於最大的反蔣勢力屈服。蔣氏這樣的打破國內的反蔣陣線，大告成功之後，又開始把多年被稱爲不治的病根的共產黨驅逐到邊疆方面，而且現在討共的進行也非常順利。這些不能不說是蔣介石的功績。現在無論何人，祇要能拿冷靜的態度，來觀察蔣氏自率領北伐軍，從廣東出發以來的行動，恐怕沒有不對他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在軍事上政治上所發揮的非常手腕，感覺佩服的罷？

這種偉大的事業，也祇有蔣氏才可以做出。現在除蔣氏之外，無論在中國那方面去搜索，恐怕再也沒有一個能和他匹敵的人了。現在的中國，事實上是在蔣氏一個人的支配之下。看起來中國的統一，就要靠蔣氏完成了！實際上蔣氏的實力，是足以壓制國內一切的反動份子的。目前在中國本土之內，如果有人企圖反蔣的叛亂，那麼中央軍隊立刻就可以出動，來鎮壓叛軍，實行肅清。關於這種可能性，在不久以前，西南派叛亂的時候，已經有事實證明了。總之，中國已一步一步的走

上統一的道路。對於這種事實，無論怎樣的反蔣論者，恐怕也都得首肯罷！

但是這裏所說的，意思並不是指蔣氏現在已經把中國統一了。在統一的路上當然還有許多的難關，譬如表面上好像屈服了的西南派，將來一有機會，仍不難再舉。

就是南京政府本身，內部也分作歐美派與知日派，互相牽制着蔣氏的政策。現在站在他們上面的蔣氏，雖然還維持着不傾向任何一方的態度，但是如果將來其中的一方面，猛然的抬起頭來，甚至於反抗蔣氏，恐怕那時的統一，也就要發生動搖了。關於這種事實，我們應該相當的承認。不過，若是蔣氏的事業，仍然能够平坦的繼續下去，那麼蔣氏所懷抱的統一之夢，就決不會是夢想，而一定有實現的可能。這在任何人看來也都難加以否認罷！

中國將要靠蔣氏漸漸的統一，這是表示蔣氏偉大的一點理由之一。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是「非軍人」的政治家。但是蔣氏則是軍人而兼政治家。蔣氏一方面既通曉擊破敵軍的兵法，而同時又知道如何的做政治家。還有他的最巧妙的地方，便是使敵人不戰而屈

服的策略！

從來做軍人的都是貴乎簡明爽直，而不善於外交。明治大帝所以要用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維廉一世所以要依俾斯麥與摩爾特凱爲其左右手的原故，也就在此。但是蔣氏却不然，他一個人兼備軍事及政治家的才幹。他運用軍事，可以將敵人一個個的擊破；運用外交，可以使敵人不戰而屈服。

看他的兵法，他最得意的戰畧，就是將敵人一個個的擊破，同時他最得意的政略，就是將不戰而屈敵的那種孫子兵法比人應用得特別的巧妙。

日本人，大多不能理解孫子的兵法，往往對於孫子的「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這句話，硬要說這種理論非在中國不能實行，因爲近代的戰爭，已經根本的與從前不同，所以照那種理想的屈敵方法，是絕對不會實行的。而且現在甚至還有人把孫子的「兵者國家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句話，用詭辯的方法，曲解爲戰爭不可避免的意

思。這種見解，無非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什麼是外交的原故。如依照這樣半生不熟的兵法，將來的結果一定要造成一個四方八面受敵的局面，而蹈從前德國的覆轍啊！

試看英國的外交。他們在外交上是最善於運用不戰而屈敵的妙技。譬如往年在遠東方面，因為覺得英俄之間，將來不免衝突，所以首先與日本訂立同盟，使日本去與俄國戰爭，自己從傍觀望，而且借此來達到自己所欲達到的目的。

反之，動輒拔出刀劍，向敵人吶喊撕殺，在表面上看來，固然痛快，但是這種俠客式的外交，要讓孫子批評起來，那簡直是下之下策了。

我們日本人有許多地方，的確是要學蔣氏啊！

當然，他的對日外交，從日本的立場看來，有許多地方，應該資難，但是若從第三者的立場看來，他那種似乎屈服而實在並不容易為人屈服的外交，實足以表示他的偉大啊！這假如讓希特勒處在蔣氏的地位，他能夠做出比蔣氏更高明的事情來麼？又假如請莫索里尼處在蔣氏的地位，他的那

種大言壯語，能够完成祖國的統一麼。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疑問啊！

(二) 蔣介石的人物

現在許多人以為蔣氏獨裁，說是南京政權漸漸的變成以蔣氏一族為中心的毫無理想的權力集團，在向着那種以個人為中心的封建式的帝制化的道路上突進。然而事實果真是如此麼？我們却不能不有很大的疑問。

希特勒，莫索里尼及史丹林等人，當然是獨裁者，而且他們自己也是這樣承認。不過蔣介石氏，就是從中國歷史上考察起來，也可以相信他決不會有這樣的野心。大概依他的意思，與其自己當大總統，毋寧把這種位置來讓給別人，而自己仍然在政府的後面，保持着隱然的勢力。

依我們看來，他一定知道現在的中華民國，決不會容納像秦始皇那樣的人。所以真正為中國着想，最好是服從國民黨的意志，來替國家做事罷？

某日本人曾經問蔣氏說：

「先生對於貴國自古至今的人物，覺得誰最偉大？而且最崇拜的是誰？」

蔣氏回答他說：

「還是孫中山先生比較的最偉大！」

他原來是以繼承孫文的遺志，獻身於民族復興爲職志的。這樣看來，蔣介石氏如果要做獨裁者，那他可違反了孫文的意志了。所以我們也可以不要輕信關於他獨裁的傳說。

獨裁政治，與感化院倒很相似，這裏面雖然有和平的生活，但是各個人的行動，都要受嚴格的監督，同時，國民言論集會的自由，也要受到很大的壓迫，所以祇有權力者，纔可以在那裏有自由行動。照這樣的政治，究竟能否裨益於國民的幸福，這可不言而喻了。

蔣氏平常好聽別人的發言，而他自己對於一切却不願意表示贊成或反對，但是他每次聽完他人說話，一定要經過一番的思慮，然後才肯下決心。並且一旦下了決心以後，無論如何他也要實行到底。

他的性格，特別是以機敏與斷行兩點，爲最明顯。

他的戰術，好像是疾風迅雷，常常親自赴前綫指揮，對於敵人的弱點，發衝鋒的命令，絲毫沒有躊躇因循。

這些地方都是他的機敏和斷行的表現。他如果是要衝進對方的心臟部，不到使其屈伏或心服的時候，也決不肯中止。

他用這種手段，既破壞了反蔣的陣線，而又打破了紅軍。事實上對付他的機敏和斷行，簡直沒有那一個敵人有辦法。他對於西安的張學良，也曾用過這樣的手段。但是何以這次會遭失敗，而反被劫持了呢？這祇能說是偶然的一失，也可以說是人生道路上難免的天災。

在民國十五年的秋天，國民革命軍圍攻武昌的時候，革命軍的總司令部，設在趙李橋的火車上，而司令部設在南湖。

總司令蔣介石氏，在開始總攻擊的前一天的晚上忽然對人說：

「我就要到城牆旁邊，去對部下訓話。」

左右的人聽到這話，便都對他說：

「總司令！那太危險了。何必要冒這樣的危險呢？請就在這火車上指揮罷！」

但是蔣氏終歸不聽，結果仍到前線向圍攻部隊，高聲的訓話說：

「明天早晨，諸位要代我奪得武昌，如果攻不下來，那再不要來見我，而我也再不見諸位了。」

今天的夜裏，我什麼地方也不去，就在這裏等着！」

這都是表示他爲人機敏，而不怕犧牲的地方。

此外他還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紅軍跑到四川的時候，朱毛軍隊裏面的某外國顧問，對毛澤東說在四川可以放心的建設赤區，因爲他們當時想蔣氏決不會再來四川的。

但是蔣氏却不忍看着四川的人民在那裏遭受痛苦，所以即時的毅然西上督師，以致紅軍的赤化

計劃，因此完全失敗，使毛澤東氣得把那位外國顧問驅逐了。

這也無非是表示蔣氏的機敏與斷行的一個例子。

他本人原來是有主義的人，同時也是有人格的人。

他的主義是奉孫文的遺訓，求民族的復興。

「中正半身憂患，革命報國之志未遂百一，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十月三十一日蔣氏五十生日之感言）

「最近國內統一的完成，是表示國家劃時代的進步。中國今後有確定的自救策，而民族也有光明的前途。全國軍民都應該拿出自信心，對於前途抱樂觀的奮鬥。無論個人或者國家，成敗興亡，皆要看能否自強自立。我們的同胞同志，如果各人都求自強，那麼國家的復興一定的可以期待了。」（十一月一日在洛陽軍官學校分校的演講）

這就是代表他的主義和他的自信心。他爲這種主義，向來拿着十二分的自信，不斷的在那裏

往前途進！他平常爲人，不但是謹慎嚴肅，而且還對於中國國民，以身作則的來提倡「新生活運動」。就這一點看來，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固然也都是這樣，不過蔣氏比他們，還要顯著得多。他既不吃煙，亦不喝酒。他的宴會，除非很公式的時候，是決不會拿出酒來的。

有吉前任大使曾經說：

「蔣先生的宴會，實在不佳，桌上沒有酒，這真叫人難過。我想向張先生（外交部長）要一點酒，但是張先生回答說：沒有。這樣簡直是無論說起什麼，都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

張先生自己說他已經喝過了酒，所以面上還略微顯些紅色，但是那天却苦了我一晚上沒有喝酒啊！」

所以蔣氏的宴會，對於好喝酒的人，都是要先喝了酒再去，不然就要等到宴會散後，趕快的跑到酒館裏去了。

他完全是「自己找事情來做」的勤勉主義的人。所以從他的口中，從沒有說過因爲事情太多而

感覺太累的話。他訓導部下的時候，常常說：

「找出事情來做，不要等到有事情纔做！」

他一時一刻，都不肯將時間浪費，他是抱與其拿娛樂來混時間，倒不如拿點事情來做的這個人。

現在且就他的社會哲學思想，彙出兩三點來。

他說：

「學問是爲人生用的東西，哲學，科學，美術，以及一切知識技能的最後目的。都是爲改良人類社會生活的。凡離開這種中心原則的學問，都不是真正有價值的學問，當然這種學問不值得我研究。所以古人說「學以致用」。」

他又說精神須與物質並重，照他的說法是：

「最要緊的是增進我們自己的精神和能力。這樣我們拿來用在天下一切的事物上面，來解決各

種實際問題，以及改良我們國家民族的實際生活。」

據他說：

「精神離掉物質的時候，也就等於無用了。」

所以他說人應該拿自己的精神，利用物質來增進生活。他的革命人生觀是：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這裏還有一段插話：

蔣氏因為究竟是個軍人，所以他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是真理。

有一次，他因為要向中山先生問他對於這種所信的見解如何？所以請他寫了這樣一幅對聯。中國所謂「對聯」，是一種聯句對話，為文人詩人等所好用的文句。左聯與右聯的字數，一定要相同，並且內容還要對稱。

當時中山先生只點頭答應，並沒有說出什麼。但是這樣地過了幾個星期，仍然沒有回答。正在

等得不耐煩的時候，突然接到中山先生的招呼，交下來下面八個大字的一副對聯：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孫中山先生交對聯給蔣氏的時候，也並沒有說什麼，意思是要他自己去領會。於是，蔣氏左思右想，竭力研究這裏面的意義。

又過了幾個月之後，中山先生纔對蔣氏詳細的解釋這種意義，他在解釋「天下爲公」的時候說：

「王道（道術政治）與霸道（武斷政治）不同；民族主義（抗外自強）與帝國主義（侵略他國），也完全兩樣。」

蔣氏在修養方面所好讀的書籍，主要的是中山先生的遺教，與王陽明曾國藩等的著作。他對於這三個人的全集，自始至終，都讀的很熟。至於王陽明曾國藩二人，也是同中山先生一樣的，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而成就大事業的人。蔣氏每次遇到極困難的時候，便總是在心裏暗誦着他們三

個人的遺訓。

這次蔣氏雖被劫持，然而終竟從西安回來了。

西安事件的發生，反增高他的聲望，同時，中國國民對他的信仰，也愈加深刻。現在距他再執行南京政府的重要政務，盡瘁於國家統一及國民的指導的那一天，也是已經不遠了！

蔣介石氏實在是偉大！他不但是東洋的偉人，而且是世界的偉人啊！